



2010年第2期（总第21期）

夏天小语

炎热疏远、消解、阻断了闲情逸致，因而历代诗文中极少有夏天的影子。

但是，苏轼笔下的夏天景物亦不少，尤其是荷花，如“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阮郎归·初夏》）“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夜泛西湖五绝》）“清风乱荷叶，细雨出鱼儿。”（《道者院池上作》）因为炎热，常欣喜风雨骤至，如“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东坡八首》）“雨细方梅夏，风高已麦秋。”（《皇太妃阁五首》）因为炎热，常感觉时间漫长，如“况此夏日长，人间正炎毒。”（《寄周安孺茶》）“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司马君实独乐园》）因为炎热，常感觉蝉鸣盈耳，如“秘殿扶疏夏木深，雨余初有一蝉吟。”（《皇太后阁六首》）“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阮郎归·初夏》）

苏轼描写夏天风景，渗透的思绪与意念，静呈奥义：人生亦如此，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夏日炎炎，午宴的酒气在雕梁画栋的游船上氤氲、在一望无垠的西湖上恍惚、在变幻莫测的水云间踌躇。

忽而，厚重的黑云像泼墨似的倾泻、流布、扩展、蔓延，太阳的光芒已淹没于墨汁的风云际会；乌黑的云山像地震似的崩塌、滚落、呼啸、惊魂，群山的远影即将消逝于西湖的天昏水暗。

顷刻，急骤的雨点穿越白居易“大珠小珠落玉盘”寂寥的情感、穿透琵琶女“嘈嘈切切错杂弹”躁动的心绪、穿破宴席上“堪笑吴兴馋太守”喧嚣的氛围、穿过苏东坡“水枕能令山俯仰”惬意的梦寐，乱纷纷进入游船虚席以待。

狂风卷地而来，消散了墨云的浸染、白雨的气势、跳珠的温润、宴席的喧闹和昭庆寺午更悠长的钟声；弃船登岸，在望湖楼上凭栏远眺，风吹云散，水天一色，西湖的水面就像天空一样新鲜、清亮、平静、美丽。

雨后的蝉声在浓阴的屏障里回环曲折，在艳阳的斑斓里锋芒毕露，在苏轼的醉意里一尘不染。

在炎热的夏天，希望我们奉献给你的是一杯香茗。

蘇軾

研究 SUSHI YANJIU

2010年第2期（总第21期）



目 录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周成仕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特邀编辑:孙开中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金城三苏纪念馆三楼
邮编:620010 电话:(028)38299092
Http://www.3swh.com
E-mail: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03—006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6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谈东坡《南歌子》三阙的系年	郑秉谦/ 4
关于苏轼两首词的写作时间	李时英/8
苏轼与王蘧	谢 飞/10
张元干与苏轼兄弟	曹济平/12
青松与丝苓(下)	陈慧君/14
——苏轼与其门生的师友情	
未尝一念忘此心(下)	王琳祥/20
——解读苏东坡的道家情结	
苏洵、苏轼《太玄》学浅析	金生杨/26
论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	任永辉/29
苏轼与六位梦得的交谊	周云容/32
匆匆五日 风韵长存	曲树程 蔡玉臻/36
——论苏轼登州之任及其对登州风物的歌咏	
苏公祠考	臧伟腾/40
漫谈苏轼书法	杨江帆/42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靖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苏 灿
陈 弼 李显平 宋明刚
何家治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周成仕
周裕锴 蔡心华

□诗文鉴赏

君意谁人解
——苏轼《江城子·别徐州》赏析

熊朝东/44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五)
雷金贵/70
——荡涤刷新 民胞物与

□新书序评

《苏轼全集校注》前言 周裕锴执笔/46

□本期关注

利国文化复兴之路 孟昭全/78

□苏学专家

走近东坡五十年
——饶学刚先生的苏轼研究之路

□苏学动态

“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征稿启事 /80
《黄州寒食帖》让两岸文化牵手 易志超/80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三) 池泽兹子/68

谈东坡《南歌子》三阙的系年

郑秉谦

内容提要：本文追溯东坡三阙《南歌子》系年误判的历史积累与发展过程，以确凿的史料推断其为元丰五年农历三月七日清明节至同月中旬前期作于黄州、蕲水两地所属的沙湖、麻桥和兰溪一带。

关键词：东坡 南歌子 系年

一

苏轼流传至今的词，大约有 360 阕左右。其中有三阙《南歌子》，同词牌，同韵脚，内容相近，相互连属，后世印本大多将它们排在一起，其次序为：

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卵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其一

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乱山深处过清明，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

——其二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其三

这三阙《南歌子》，对于现代、当代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们常被现代、当代的宋词选家选入选本。举例说：现代词学专家龙沐勋的《唐宋名家词选》（1948），共选东坡词 28 首，其一、其二均选在内。当代的《唐宋词鉴赏辞典》选了其一；古典文学专家陈迩冬的《苏轼词选》，则选了其三。

正因为这三阙《南歌子》至今尚经常出现在世人眼前，因此确定它们的系年尤其显得急迫。可惜在这些选本中，或缺少对其系年的介绍，或虽有介绍但却在介绍中作了错误推定（如“鉴赏辞典”及陈选）。甚至于，在近年出版的苏词全集《东坡词编年笺证》及中华书局版《苏轼年谱》这样的专著中，也对系年作了误判。这种种情况，就不能不妨碍世人对三阙《南歌子》的欣赏和对东坡的了解。

二

对这三阙《南歌子》系年的误判，有个历史积累与发展的过程，可说“其来有自”。从东坡去世至今九百多年中，对此三词系年的推定，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从东坡在公元 1101 年去世后一百年，可说是第一时期。此时期东坡词刻本，在上述第二阙《南歌子·日出西山雨》的曲牌下，有题曰《送行甫赴余姚》，可是此词内容却同送别无关。按行甫名刘摠，是东坡在杭州结识的友人。这时他从家乡长兴赴官余姚，路过州城的湖州。东坡除为他写了《送刘寺丞赴余姚》诗之外，还在别筵上即席赋《南歌子·山雨潇潇过》，令官伎歌唱送行。在当时的刻本上，在这另一阙《南歌子》曲牌下，只题《湖州作》。但这才是真正的“送行甫去余姚”的词。但在这百年中，似无人公开对此质疑，作出正确说明，看来大家都“不求甚解”。

从南宋嘉泰（1201—1204）年间开始的七百年，可说是第二时期。这时由施元之父子与顾禧合注的东坡诗编年合注本在嘉泰年间盛行。这部书在提及东坡《送刘寺丞赴余姚》诗时，曾谈到相连三阙中的《南歌子·日出西山雨》题目《送行甫去余姚》，指出此题应移到另一首《南歌子·日出潇潇雨》上。

去，与其原题《湖州作》合并。他们的原话是：“今集中指他词为送行甫，而此词题云‘湖州作’，误也。”这个意见是对的，但七百年来却无人这么做；同样，也无人公开反对他们这一意见，看来大家对施元之等的意见都“默认于心”。

直到清朝宣统年间（1909—1911），开始了新的一百年，这是第三个时期。这时朱孝臧刻印东坡乐府，正式将这相连的三阙《南歌子·日出西山雨》上的“送行甫去余姚”拿掉，改置于确系送刘摵的《南歌子·山雨潇潇过》曲牌下。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画蛇添足地将后者原题“湖州作”，置换到前者的曲牌下。这样一来，便使人以为三阙相连的《南歌子》为湖州之作。当然，他这样做，当时也有他的道理，盖此前的毛氏汲古刻本东坡词，因为这三词的首句“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都描写晴雨变化；而乌台诗案是东坡的晴雨变化期，案发前他恰恰在湖州任上。于是毛本编者便在这三阙词前擅加了“寓意”二字。彊村据此便顺手将“湖州作”三字也改加到这三阙《南歌子》题上去了。因此在这以后的一百年中，大多数论者都将此三词系年湖州，如陈迩冬、孔凡礼。但有些更细心的专家，查知东坡在湖州任内未曾有清明节，便将时间往前推数月，判为东坡自徐州赴任湖州途上所作，如王双启。后来，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问世，更将此三词系年于嘉祐八年（1063），当时东坡在凤翔签判任上。这就错得更远了。据此，这最近一百年真够得上说是“众说纷纭”了。

三

那么，这脍炙人口的《南歌子》三词，究竟为东坡何时何地之作呢？

我以为它们都是作于东坡由湖州任上被捕，经乌台诗案而放逐于黄州期间，其系年应为元丰五年（1082），这是东坡抵达黄州的第三年，三词所描写的具体时间，应为农历三月七日清明节至同月中旬前期，所描写的具体地域则为黄州、蕲水两地所属的沙湖、麻桥、兰溪一带。

我作如此判断的根据有二，其一便是三词内容，合于东坡当时的行事出处与思想状态。

封建时代的儒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得意时，作“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状；失意时，则又高唱还乡或归隐。东坡未能免俗。仕宦初期，他一度同顶头上司、凤翔太守陈希亮关系紧张，曾作诗怨己“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不久，他回朝任职，曾一再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这种变法一是与民争利，剥夺平民，二是迅雷骤发，使平民无所措手足。他理想中的变法应是逐步渐进，以民为本，由先民富而后国强。这得罪了朝廷，他便下放杭州当通判。路过镇江时，他看见从他家乡眉山流下来的长江水，又向江神发誓，“有田不归如江水”。几经转任，他在徐州知州任上，为求雨下乡，见到田间美景，又不酒而醉，作词曰：“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艾蒿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但是，想还乡、归隐是一回事，真正着手买田置庄，如此三词所谓“求田问舍笑豪英”，又是一回事。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资料可以证实，东坡在任湖州知州及其以前，便已将购田置庄提上生活日程。

他真正起了购置田庄之念，是在流放黄州途中。此前的乌台诗案，他被抓往汴京御史台狱，身受“拉一太守如驱鸡犬”的待遇；狱中，某些“变法”派口口声声向神宗进言“苏轼当诛”，当时他自我形容其处境已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侥幸出狱后，他深感官场险恶，方始真正谋划归田。在去黄途中，路过麻城，曾向归隐的老友陈慥说想买田。陈慥随后带信至黄，说可帮他在对岸武昌（今鄂州）半价求田。他于四月中回信道：“示谕武昌一策，不劳营为。坐减半费，此真上策也；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那时黄州属淮南西路，武昌属荆湖北路，一个被明确规定“黄州居住，不得签署公事”的待罪之官，自然不宜去别路购置田产。次年，他在书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诗后跋云：“流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盖欲为彭泽而不得者。”当时他自然还在继续求田之中。

于是，第三年，即元丰五年，他便有了沙湖之行。清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实为一部比较完备的东坡年谱，上云：“（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东坡自己则在《游沙湖》一文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但一相之后，“以所看田不甚佳，且罢之”（与陈慥信）。交易未

成，他不禁感叹：“吾无求于世久矣，所需二顷田以充餧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黄州书田》）离沙湖后，他又往邻县蕲水麻桥庞安常处治疗臂疾；然后，由庞等陪游兰溪，接着还住进蕲水县传舍（官方招待所），并在那儿同当地士大夫交接往来。上述《南歌子》三阙，便是写此行途中的经历的。

《南歌子》其三有句云：“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是判断《南歌子》三阙作于此行的重要依据。这年东坡47岁，在古代已可称“老”；只是归隐之计未成，还得庸庸碌碌“求田问舍”，自忖难免为“好官我自为之”的“豪英”们所耻笑。他此行虽然求田未遂，但还是愈了臂疾，赏了风光，交了朋友，是非常乐于此行的。他在此三阙中，分别用了三句结语“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我是此间闲客此闲行”和“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来形容自己的愉悦心情。他好像在说：多么惬意啊，这不就是归田之乐吗？

当然，我也不得不说，东坡求田虽是为了归隐，但又不仅仅为了归隐。古代士大夫的归隐主要存在心上，写在诗里。上古真隐士决不买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嘛！东坡求田，一是为了生计。他在黄州所任“团练副使”，不过是个“不得签署公事”的虚衔，仅仅用来表示“从八品”的级别以领生活费而已；这生活费当然不能同过去当京官、任太守的俸禄食廪相比，不仅数目很少，并且现金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以官府用剩的物资（如压酒囊之类）充抵的，变卖之余，十仅得其三而已。为了解决“乏食”之困，自然非买田不可。其次，购置田庄也是为子孙的科举应试打算。古代士大夫的还乡、归隐，至多用于自己身上，而决不施之于子孙。东坡此时曾寄书堂哥不疑（子明），劝他离开家乡到交通方便的江淮购置田庄，“试思之，他日子孙应举、游宦皆便。弟亦欲如是”。第三，东坡求田的目的，当然也包括使自己有地可隐。一旦起复无望，自然只得以田庄作“终焉”之计。基于这三点，他当时不仅自己到沙湖求田，托陈慥在黄州附近买田，也托老上级杨绘在荆南打听田庄出售消息，“求田问舍笑豪英”，意在此焉。

四

我判断《南歌子》三阙作于元丰五年三月此行

的第二个根据，则是因为它们同东坡此行所作的另三阙词，内容一一相合。

所谓“另三阙词”，指的是《定风波》、《浣溪沙》和《西江月》。此三阙作于此行，是东坡自己在它们各自的题中一一写明了的，可谓铁板钉钉。《定风波》一阙的题为《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浣溪沙》一阙的题为《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西江月》一阙的题则为《春夜行蕲山中……乘月至一溪桥，解鞍曲肱醉卧》。

为便于同《南歌子》三阙对比，也录这另三阙词于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西江月

我们可将这《定风波》等三阙作为甲组，上述《南歌子》三阙作为乙组，加以比较：

1. 甲组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乙组则云“乱山深处过清明”。元丰五年清明节为三月七日，这天知州徐君猷一早给部下各官宅“分新火”，这是两天寒食之后的必有之举。东坡得新火后，曾作《谢徐使君分新火》诗回谢。然后他便骑马出城，趋“沙湖道中”。两组诗的时令完全相合。

2. 甲组记“道中遇雨”，乙组则记“带酒冲山雨”。东坡一行在途中曾遇雨，两组的气候相合。

3. 甲组记曰“莫听穿林打叶声”、“山头斜照却相迎”，乙组则云“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先雨后晴，两者相侔。

4. 甲组曰“照野弥弥浅浪”，乙组则云“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他们一行于山野中沿水而进，两者相侔。

5. 甲组曰“沙湖道中”，“松间沙路净无泥”，

乙组则云“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曾过湖边沙路，虽雨后而无泥泞，两者相侔。

6. 甲组记“障泥未解玉骢骄”，乙组则云“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此行以马代步，两者相侔。

7. 甲组记“我欲醉眠芳草”、“解鞍欹枕绿杨桥”，乙组则云“和衣睡晚晴”、“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途中东坡曾露天醉卧，两者相侔。

8. 甲组曰“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乙组则云“老去才都尽”。俱年长者口吻，两者相侔。

9. 甲组曰“何妨吟啸且徐行”。乙组则云“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东坡一行于途中从容而行。非趋程赶路，两者亦无不同。

这两组词，在气候、节令、行程、行事等等上是如此的相同，足证两组词（各三阙）所写的是同一次旅程。既然作者精确标明《定风波》等三阙，是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以及其后数天之作；那么，《南歌子》三阙自然也是这次旅行的产物。此行的起讫时间，根据“乱山深处过清明”和“可惜一溪明月”，则可判定始于三月七日，而终于三月中旬前期数日。

五

但问题还是有的。明眼人可以看出，两组词的风格并不尽相同。《定风波》等三阙中的《西江月》，同《南歌子》三阙的风格较近，潇洒豁达。而《浣溪沙》则直遂坦荡，《定风波》则豪迈沉郁，此二阙则与上述四阙不同。在同一短期中，譬如七天或十天，同一作者同一题材的词作在风格上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吗？

我以为这是可能的。这也须从东坡这时期的思想状态谈起。东坡在黄州共住四年有余，而元丰五年三月正处在中点。这时，诗案发生前那种富贵功业，在东坡自己看来已经“实如春梦了无痕”，而诗案当中那种“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恐惧感也消失了。他这时最想拥有的，便是上述《定风波》词中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田园生活，和同一词中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恬淡虚无的心境。这是他思想的主流。《南歌子》三阙与《西江月》的潇洒豁达，便是他这种心情的反映。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无法如司马光那样，下野后便在洛阳埋头著书，十余年不谈国事；也无法

做到如王安石那样退居金陵半山，言不及朝政。他在致刘沔的信中说，他很想“焚弃笔砚，为喑默人”，然而却“习气宿业，未能尽去”，尽管在流放之中，却仍然要指点朝政，臧否人物。就在这次清明之行前不久，他还借“鱼蛮子”（渔人）与“晏澑堆”（小鸟名），抨击“人间行路难，踏地出租赋”，讽刺希冀承旨以取富贵的投机分子，给饱受朝廷“理财”之苦的平头百姓打抱不平。在他眼中，那些以无限上纲、无中生有手法陷害他的“变法派”，不过是“好官我自为之”的投机取宠的“变戏法派”。他意积于中，猝与景遇，一腔悲愤喷薄而出。于是遇到暴雨淋头，便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遇到流水西行，便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便自然地使他此期间的词作，在潇洒豁达之余，也显出坦荡豪放的特色了。一个作家（特别像东坡那样的大师）的风格，可能每一时期有所差别，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主从不同。这是文学创作中普遍现象，并不足怪。

相反，也许正可以这样说：东坡以一次旅行而作六词，六词题材同一，风格则有同异，既统一而又多样，这恰恰显示了他的大师风范。

参考文献：

龙沐勋辑《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 1948 年印行。

陈迩冬选注《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王双启等撰稿《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2001 年 6 月 26 日初稿 2009 年 5 月改定

（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温州大学兼职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责任编辑：刘清泉）

关于苏轼两首词的写作时间

李时英

内容提要：本文对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和《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的写作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关键词：蝶恋花 临江仙 写作时间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
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
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

这首词作于何时何地，历来无定论。苏词注释者大都避开其写作时间和背景，只说它抒发了伤春之情，却又作豪迈之语，具有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并存的特色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并且都说到他被贬惠州时，曾叫朝云唱这首词，朝云唱着唱着，泪满衣襟。

笔者在长篇小说《苏东坡》中纳入了这阙《蝶恋花》，该把它置于何时何地，颇费踌躇。

有人认为它是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作，愚以为此说很难成立。

第一，此词所描绘的意境是：暮春时节，隐在词中的“我”一时因伤春失意而心中烦恼，一时又流露喜悦之情。喜悦和烦恼在心中交替出现：这是一个天真未凿少年常有的心态。而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六岁，出仕也已一十六年，且已初历仕途坎坷；他会像一个十七八岁尚未涉世的少年那样“一时风雨一时晴”么？我想不会。

第二，六年前，苏轼原配夫人王弗去世；三年后，他又与王弗的堂妹闰之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甚笃。我认为，此时的苏轼，不会对素不相识、闻声

而未见面的园里秋千架上的佳人如此“多情”，并且因少女们的“无情”而着“恼”。

第三，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其诗文书信从未透露过此种情绪。猝杭期间，他纵情山水，其乐融融，冲淡了仕途的种种不快；自然不会像某些轻薄子弟那样，见了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便想入非非。

第四，也许，隐于词中的“我”，并非作者本人，而是托“代人”之名的“戏作”。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那种词，大都是以“代人”之名，行抒己之实；且多有说明。如熙宁六年冬，苏轼（时任杭州通判）被两浙转运使派往常州、润州一带赈济灾民，第二年夏天才回到杭州。离家日久，不免思念家人，因而曾作“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那首《少年游》便有个“润州作，代人寄远”的小引。因此，可以肯定此词，决非托“代人”之作。

从词所表述的喜恼交错的心态以及句间的大幅跳跃来看，笔者认为，这首《蝶恋花》应作于苏轼结婚之前的少年时代，地点在眉山家中。

有资料记载：苏轼在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与王弗结婚。那年他十八岁。在做新郎之前不久，苏轼想，连面都没见过，光凭媒妁之言便结亲？不行！我得去看看。于是瞒着父母，偷偷给王弗写了一封信，约她在王家庄园外见面。不知是什么缘故，王弗未能应约。《蝶恋花》似应作于此时。未婚妻没来赴约，苏轼心中未免惆怅，这种惆怅与伤春之情合二而一。但是，暮春时节，不只有残红褪尽，给人以伤感；也有青杏着枝，芳草连天，令人感受到一种盎然的生趣。此种喜悦与烦恼的情愫交替出现，十分自然，不是什么怪事。

笔者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敬候专家批评。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一座上客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临江仙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将此词收入未编年卷中。

有人认为，这首词是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所作。理由是：词中“十载”与悼王弗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时间和情感都十分接近。

笔者觉得此说太牵强。

这首《临江仙》有个“送王缄”的副题。

王缄是何许人？有人说，王缄即王箴。我认为不对。

第一，“缄”“箴”二字除同根之外，音和义都不相同。

第二，王箴是王闰之的胞弟，王箴这个名字曾不止一次地在苏轼留下的文字中出现，每次都称“元直”而未称“王箴”或“王缄”。《苏东坡全集》中收苏轼赠王箴诗五首、书信两则，皆称“元直”，未称“王箴”或“王缄”。

第三，如果“王箴”即“王缄”，那么苏轼送王闰之的胞弟返川，因何要突然生出悼念王弗的极度哀伤之情？而且，身边有美丽温柔的妻子王闰之为伴，怎么会自称“孤客”？

有这三条，王缄即王箴之说很难成立。

看来，王缄另有其人。笔者认为，王缄极有可能是王弗的哥哥。

这首《临江仙》应作于治平二年（1065）王弗逝世后不久。

那年正月，苏轼自凤翔回到京城。早知苏轼文名的宋英宗赵曙想提拔他做翰林学士知制诰，但遭到宰相韩琦反对；赵曙退一步提出安排苏轼做起居舍人，韩琦还是摇头。韩宰相主张叫苏轼到史馆、秘阁即中央图书馆之类的地方去，多读点书；他还提出“入阁须经过考试”。赵曙说，苏轼已经过礼部和制科两次考试，大家公认他是难得的人才，怎么还要考？”韩琦说：“让苏轼再考一次，对他没什么坏处呀！”赵曙登基时间不长，不愿为此事与老臣争论，只好同意韩琦的意见，叫苏轼去史馆值事。这对苏轼“致君尧舜”的理想无疑是泼了一盆

冷水。八年前，苏轼怀着满腔热情和“致君尧舜”的理想进京应考，他的试卷得到主考官欧阳修很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宰相韩琦的偏见，虽是进士及第第二名，却只授予县主簿之职。这是第一次失意。参加制科试之前，他写了《进策》、《策林》各二十五篇，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策。制科试后，他被任命为凤翔府签判。在凤翔签判任期间，赵祯去世，赵曙继位。他又向登基不久的赵曙上了一道《思治论》的奏章，全面阐述自己革新朝政的主张，没想到回到京城皇上会叫他再次参加制科考试，继而又被分配去史馆工作。这是第二次失意。词中“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正是接连失意的反映。

有资料记载：治平二年正月，苏轼自凤翔回到京城，王弗的哥哥（未提名字）从四川“来京同住”，哥哥来看望妹妹和妹夫，恰遇王弗病故。待丧事已毕，他自然要回眉山去，苏轼作这首《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词送他。自至和元年（1054）冬与王弗结婚至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去世，正好十年零几个月。王弗去了，只留下一个八岁的儿子。此时，苏轼自称“孤客”，合情合理。

当然，这里也有个小小的存疑：王弗的父亲王方，是个读书人，曾举乡贡进士，他的儿子怎么会有名无字呢？

（作家、副编审）

（责任编辑：刘清泉）



大江东去（刘怀东篆刻）

苏轼与王蘧

谢飞

内容提要：以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和苏轼、苏辙诗文等文献资料为依据，论述苏轼与王蘧的交游，表现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情谊。

关键词：苏轼 王蘧 交游

王蘧，字子开，原名王迥，字子高。赵州临城人，王鬷之孙，王适、王遹之兄。王蘧生于北宋景祐四年（1037），卒于大观三年（1109），享年74岁，于政和元年（1111）归葬于临城县龙门乡两口村祖茔。

王蘧幼年聪颖不羁、青年时期入王安石门下，未考取功名。王鬷深爱此孙，奏授秘书省校书郎。一生“积十有七迁，累官至中奉大夫、勋上柱国、开国临城县、爵伯、食邑九百户、赐佩服三品”。

青年时期的王蘧，英俊、潇洒、好与名士交游，是颇受争议而影响较大的人物，甚至引起过神宗皇帝的注意。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载：“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时不甚持重，间为狎邪辈所诬，播入乐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丰中，蔡持正举之可任监司，神宗忽云：

‘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头谢罪。”所谓《六么》，指官本杂剧《王子高六么》，所本即王迥芙蓉城遇仙事。王迥遇仙，胡微之曾作《王子高芙蓉城传略》，苏轼又作《芙蓉城诗》，当时文人亦颇多吟咏，遂成为一则民间佳话。但神宗却并不以为然，而是认为王迥为人轻浮，不堪大任。

无论如何，王蘧在文坛还是做出不少贡献，具有较大的影响。他“平居喜图史，尤熟《三国志》，其两汉晋唐五代皆手自抄节，至老未尝释卷。工楷字，自成一家。其文有古律诗三百四十二首，《施州开边录》十卷。”文坛领袖苏轼对王蘧评价较高，称其“高才雅度”，并以“棠棣并为天下士，芙蓉

曾到海边郛”的诗句赞美他们兄弟三人。苏辙也留有“矫矫公孙才不贫，白驹衡雪喜新春”之诗句。贺铸则以“墨妙今初贵，诗名久已传”的诗句赞誉其文。在文献中，与王蘧相关的诗文数量不少，初步查阅有苏轼诗二首、文五篇，其中书札三、送别一、启一；苏辙诗一首；胡微之文一篇；贺铸诗五首；张耒诗三首。据载，元丰元年，王蘧在京城与苏轼会面，得苏轼《芙蓉城》诗后，依其“仙风锵然韵流铃，蘧蘧形开如酒醒”之句，将原名王迥、子高改为王蘧、字子开。但其墓志铭中则说：“初讳迥，字子高，犯外祖名，奏易今讳”。

是由于社会对他的评价不一，还是受苏门党争的影响，王蘧为官的历程几起几落，坎坷不平。王蘧知江阴期间，因背疮不愈，以疾致仕，在家养病。元祐七年，病情好转，遂乞从官。诏右朝请郎王蘧除知秀州。对此，御史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吴立礼、杨畏以王蘧初任通判，资序不够；在江阴娶富户女，素为士论所薄；致仕后复乞从官；系右丞苏辙婿王适之兄等缘由发难，诏改以王蘧知无为军。此事，不能不说与元祐年间激烈的党争有关，王蘧不能知秀州而知无为军，是受苏轼、苏辙的牵连。王蘧一生最大的政绩是崇宁二年的平叛之举。时施州安南寨部蛮向文疆寇边，王蘧受命监督官军捉杀招降，大获成功，“得生地幅员五百里，为寨二，为隘五，为铺十有三。”因此王蘧进官二级，徽宗有“施州拓土五百里不费朝廷一钱”的赞誉之词。

苏轼和王蘧并非师生关系，他们结识的时间比其二兄弟稍晚，首次会面当在元丰元年三月。当时，苏轼尚在徐州知州任上。可能是由于其胞弟王适、王遹从学于苏轼的缘故，此前，他们彼此还是非常了解，关系也是比较深厚的。因为，第一次见面，苏轼便为王蘧作了著名的《芙蓉城》诗：

世传王迥子高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

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乃作此诗，极其情而归之正，亦变《风》止乎礼义之意也。

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
珠帘玉案翡翠屏，霞舒云卷千娉婷。
中有一人长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
往来三世空练形，竟坐误读黄庭经。
天门夜开飞爽灵，无复白日乘云輶。
俗缘千劫磨不尽，翠被冷落凄余馨。
因过缑山朝帝廷，夜闻笙箫弭节听。
飘然而来谁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棂。
忽然而去不可执，寒衾虚幌风泠泠。
仙宫洞房本不扃，梦中同蹑凤凰翎。
径度万里如奔霆，玉楼浮空耸亭亭。
天书云篆谁所铭，绕楼飞步高伶俜。
仙风锵然韵流铃，蘧蘧形开如酒醒。
芳卿寄谢空丁宁，一朝覆水不返瓶。
罗巾别泪空荧荧，春风花开秋叶零。
世间罗绮纷膻腥，此身流浪随沧溟。
偶然相值两浮萍，愿君收视观三庭，
勿与嘉谷生蝗螟。

从渠一念三千龄，下作人间尹与邢。

王蘧梦寐中在芙蓉城遇鬼是一件奇事，也可看作是一种社会游戏，被广为传播。在苏轼作此诗之前，已有胡微之所作《芙蓉城传》传世，并被编为官本杂剧《王子高六么》。而当苏轼《芙蓉城》诗问世后，影响剧增。对此，王安石有和诗，诗首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万鬼驱六丁。”当有人为此问王安石时，回答是：“此戏耳，不可以为训。”苏轼、王安石对此事的态度，道出了人们对王蘧遇鬼一事的真实理解。

元祐二年（1087），苏轼在京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王蘧也在京师，任朝请郎。正月八日晚，苏轼与王蘧共饮，朋友相见，故事重提。苏轼作《正月八日招子高饮》诗云：

屋雪号风苦战贫，纸窗迎日稍知春。
正如薈蔚林中坐，更对芙蓉城里人。
昨想玉堂空冷彻，谁分银榼送清醇。
海山知有东南角，正看归鸿作小颦。

除诗作外，在苏轼文集中还保存有他给王蘧的书札三封，这些信件显示出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

某启。多懒少便，久不奉状。儿子自北还，辱手书，且审起居佳安为慰。游刃一邑，风谣

之美，即自闻上，翘俟殊擢，以塞众望。会合未涯，伏冀倍万自爱。区区之祷。不宣。

——其一

某惊闻大郎监簿遽弃左右，伏惟悲悼痛裂，酸苦难堪，奈何！奈何！逝者已矣，空复追念，痛苦何益，但有损尔。窃望以明识照之，纵不能无念，随念随拂，勿使久留胸中。子高高才雅度，此去当一日千里，以发久滞。愿深自爱，以慰亲友之望。无由面慰，临书哽塞。

不一一。

——其二

率而乱道，何足上石，有书可劝令罢也。
若更刻却二红饭一帖，遂传作一世界笑矣。

——其三

苏轼的第一简约作于元祐四年，此时苏轼知杭州，长子苏迈酸棘尉任满回杭，过江阴，与知县王蘧会面，蘧有手书致苏轼，因此，该简当为复函。苏轼在信简中希望王蘧“游刃一邑，风谣之美，即自闻上，翘俟殊擢，以塞众望”。苏轼第二简不知作于何时，主要对王蘧之大郎王育去世表示哀悼，劝慰其节哀保重，“愿深自爱，以慰亲友之望。”同时，苏轼对王蘧的赞誉之语“高才雅度”即出自此简。

苏轼文集中有《书别子开》一文，而在《东坡志林》中，此文被列为送别的第一首，即是《别子开》，文曰：

子开将往河北，想度河宁。以冬至前一日被旨，过节遂行。仆以节日来贺，且别之，留饮数盏，颓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纸，故为作草，露书数纸。迟其北还，则又春矣，当为我置酒、蟹、山药、桃、杏，是时当复从公饮也。

此文虽然简短，所记述的事情也颇为单调，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感情，约定王蘧返回时再饮酒接风，显示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苏轼的《别子开》当作于元祐初年在朝期间。

元祐八年九月，苏轼除知定州，十月到任。次年（绍圣元年），被贬知英州，四月离开定州，开始了一贬再贬的坎坷之路。绍圣四年闰二月，苏轼又被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三月，苏轼作《求婚启》，为次孙苏符求婚于王蘧。文云：

结缡早岁，已联昆弟之姻亲；垂白南荒，尚念子孙之嫁娶。敢凭良妁，往疑高閨。

（下转第13页）

张元干与苏轼兄弟

曹济平

内容提要：张元干是南宋前期的爱国词人，著有《芦川归来集》。书中收录题跋北宋大文豪苏轼兄弟的墨迹数篇，还明确记载政和二年他谒识苏辙的事迹，这不仅表现了他对苏氏兄弟的崇敬，而且具有可贵的文献资料价值。此外，本文指出《四库全书·芦川归来集提要》误以苏黄门为苏轼及其沿讹，对读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张元干 苏轼 苏黄门辙

张元干（1091—1161），字仲宗，自号真隐山人、芦川居士。福建永福县（今永泰县）人。他是北宋末南宋初的爱国词人。在靖康元年金兵围攻汴京时，他为亲征行营使李纲的属官，辅佐李纲，登陴拒敌，浴血奋战。汴京解围后，李纲被主和权奸排挤出朝，旋因兵败被谪。元干也因而获罪。南渡后战乱动荡，他历经避难漂泊之苦，在绍兴元年（1131）辞官还乡。张元干回到故乡后，仍然关注国事，始终不忘中原生地，先后写下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诗词，其中给李纲和胡铨的两篇《贺新郎》词作，气势豪放，慷慨激烈，开创了南宋一代爱国词风的先河。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下谓“张元干仲宗，善词翰，以送胡邦衡（铨）、赠李伯纪（纲）两词出名，其刚风劲节，人所共仰”。

从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来看，其主要创作活动在南宋前期，与北宋大文豪苏轼兄弟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似乎是不搭界的。但是，他所写有关苏轼兄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苏轼、苏辙兄弟的崇敬之情，而且具有十分可贵的文献资料价值。现予以分别叙述。

一、张元干与苏轼

张元干生于哲宗元祐六年（1091）。是年苏轼

已56岁，任杭州知府。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卒于常州。此时张元干11岁，孩童时的张元干是不是见过苏轼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予晚生，虽不及见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而少时在江西，实从东湖徐公（俯）师川授以句法。”（《芦川归来集》卷九《亦乐居士集序》）而《四库全书·芦川归来集提要》却说：“元干及识苏轼，见所作《苏黄门帖跋》。”但是我们翻检《跋苏黄门帖》，发现元干认识苏黄门的时间在政和二年（1112），此时苏轼已去世11年，可见此苏黄门并非苏轼。宋徐度《却扫篇》卷下：“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又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五有“苏黄门辙”。由于《提要》编者把苏黄门误作苏轼，以致《南宋文苑·作者考》和《大清一统志》卷一七三“许州流寓”等书均沿讹作苏轼。详见拙文《苏黄门非苏轼》，刊于中华书局《文史》第九期，此不赘述。

张元干虽然没有见过苏轼，但在他的心目中，苏轼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敬心态倾注在他题跋苏轼的墨迹中，先后写有《跋东坡木石》、《跋东坡枯木》、《跋东坡墨帖》、《跋野次孤峰图》等诗文。例如：

玉局老仙天下人，平生爱与石传神。

长江绝岛风涛里，千古常令墨色新。

——《芦川归来集》卷四《跋东坡木石》

盘根错节，无藤萝之蔓衍，而深根固柢，
非霜雪之凋枯。类婆娑之桂影，或扶疏之珊瑚，
岂陋人者能为此图！

——《芦川归来集》卷九《跋东坡枯木》

盖自玉局老仙作枯槎怪石，后人宗师之，
至有真赝莫辨者，此为庶几。

——《芦川归来集》卷九《跋野次孤峰图》

苏轼是北宋大文豪，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绘画

家，善于画枯木、怪石，自成一体。可惜他的画作由于遭元祐党禁毁损，流传极少，现存仅《枯木竹石图卷》和《木石图》等少数画作，但并不影响他在宋代绘画史上的地位。苏轼不仅自己喜爱作画，还多方鼓吹，带动了一批文人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两宋文坛上留下不少有关苏轼画品的题跋。如黄庭坚《题子瞻〈枯木〉》：“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五）此类题跋甚多，不列举。而张元干的《跋野次孤峰图》实为罕见。此外如东坡为焦山纶老作《木石》，却书招隐一段因缘在纸尾，张元干题赞称“虽然信手拈来，自是胸襟流出”，别具只眼。又如他在《跋东坡墨帖》中说：“往在东都时，见王丈（萃）乐道出示汝阴所藏欧阳文忠公杂书盈轴，多用片纸问事于宋景文（祁）诸公，不以前辈自居而耻于下问，此其为儒宗也。观东坡先生帖尾所质谢幼槃取官稿事，谆复尤审。乃知三苏游文忠公门，同一关键，可为后生文字轻脱妄发之戒！”此跋结末一句，写得何等深刻，如今读来犹能发人深省。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张元干的这些题跋，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二、张元干与苏辙

张元干在政和二年拜见过苏辙。他在《跋苏黄门帖》中说：

苏黄门顷自海康归许下，安居云久，政和二年，晚生犹及识之。衣冠俨古，语简而色庄，真元祐巨公也。已而与其外孙文骥德称相遇澶渊，出书帖富甚。今观史侯所藏数幅，盖中年笔札也。兵火之余，岂易得哉？是宜什袭，遗诸子孙。不妨模以墨本，流传于世。

据《宋史·苏辙传》载：苏辙“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大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颖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又，宋徐度《却扫编》卷一〇：“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这里所写苏辙晚年“不复与人相见”和“多杜门不通宾客”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那么青年晚辈张元干又怎样能见到这位“元祐巨公”呢？因为政和二年，张元干在东都为太学上舍生，与苏辙的外孙文骥（字德称）相识。文骥乃文同（字

与可）的孙子。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张元干能到许州（今河南许昌）拜见苏辙。一年后，元干出仕澶渊，又与文骥德称相遇。此时文骥任开德府（即澶渊，今河南濮阳县）主簿。元干至交陈与义亦在澶渊任开德府教授，与文骥也相识。陈与义在开德府作有《次韵谢文骥主簿兼示刘宣叔》诗一首。白敦仁著《陈与义年谱》卷一谓：“元干此时在开德，《跋》中所称文骥当即谢文骥，则文骥乃苏辙外孙也。”这里把陈与义感谢文骥主簿的题意，理解为姓谢，名文骥，确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回头再看张元干的这篇《跋》文，虽然没有写明具体日期，但曾枣庄《苏辙年谱》中说，政和二年十月三日，苏辙卒于许昌，可知元干拜见苏辙当在十月之前。元干能在苏辙生前识见，感到非常荣幸，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当他南渡后在史侯处观看其所藏苏辙书帖数幅时，不仅心往神驰，回忆起苏辙晚年“衣冠俨古，语简而色庄，真元祐巨公也”的庄严形象，并发出了“不妨模以墨本，流传于世”的呼声。字里行间，充分表露出他对前辈苏辙的无比崇敬的心情。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清泉）

（上接第11页）

轼长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资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风绵邈，庶几弓冶之余。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辈之爱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门，教成家庙。中郎坟典之付，岂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复见今日。仰缘夙契，祇听俞音。

此启是苏轼屡遭贬谪，流落他乡，在“垂白南荒”的境况下写成的。“已联昆弟之姻亲”是指王蘧之弟王适与苏辙次女之婚姻；“第十四小娘子”则指王适之女。如此，两家联姻纽带更加紧密，亲上加亲。苏符系苏轼爱孙，苏迈次子。苏符，字仲虎，随侍苏轼十五年。在苏门中，系苏辙、苏轼之后官级最高，成就最大的家庭成员。政和二年苏辙去世后，恩授入官。南宋绍兴五年赐进士出身，除中书舍人等职，绍兴十年权礼部尚书。其间，曾充贺金正旦使，携陷金子侄苏峤、苏峴归宋。绍兴十六年后还蜀，从此再未出川，于二十六年辞世，享年70岁，赠左中奉大夫。有制诰表章十卷，文集二十卷。

（河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

（责任编辑：刘清泉）

青松与丝苓（下）

——苏轼与其门生的师友情

陈慧君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苏轼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等门生相识（道德文章，相映生辉）、相交（元祐唱和，师友欢聚）和相连（朋党之祸，患难与共）的事迹，表现了他们志同道合、情深谊重的师友关系。

关键词：苏轼门生 苏门四学士 苏门六君子

元祐唱和 师友欢聚

元丰八年，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司马光为相，苏轼兄弟以及其他所谓旧派大臣也纷纷被召进京。元祐期间，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同任馆阁之职，都在京城供职，为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陈师道和李廌也先后进京。大约三年左右的短暂时光，苏轼兄弟与门生常常聚集一堂，诗词酬唱，评书作画，其乐融融，史称“元祐唱和”，又称“苏门酬唱”。

后人评：“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元祐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居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以来未有也”（惠洪：《跋三学士帖》）。

由大书法家米芾书写、知名画家李伯时作画的《西园雅集图记》，描绘了当时文人雅士、书画名家云集驸马王晋卿的花园——西园的情景。这是一次北宋文化界的最高盛会。苏轼、苏辙兄弟与苏门四学士则是此次文会的中心人物：“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

茧衣，手秉焦扇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而侧听者，为秦少游……自东坡以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才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由此足见，当时苏氏兄弟及其苏门弟子在宋朝文化界崇高的地位。

公余之时，弟子们常到苏轼府邸聚会，苏轼总是以特殊的规格接待他们。一般官场上的客人来访，苏轼出乐伎招待，而对门生则由爱妾王朝云亲自沏密云龙茶接待。这是由于官场上的人来访，苏轼同他们无话可谈，又不得不应酬，于是按当时官场的规矩请乐伎奏乐唱曲，终席无须交谈，客人还很满意，认为主人招待得很隆重；而跟弟子们无须做这些表面文章，大家在一起切磋诗文，谈天说地，有许多知心话要说。有时，王朝云还亲自为他们表演歌舞，这是苏轼对门生规格最高的接待。王朝云的美妙舞姿令众人倾倒。秦观对歌舞的鉴赏眼光是很高的，为之赋词《南歌子》：“蔼蔼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他把朝云比作巫山神女，苏轼比作楚襄王，赞美她像宋玉《高唐赋》里的神女。苏轼乘兴也赋词一首作酬答。由此显示了，苏轼与弟子们的关系是多么融洽，多么不拘一格。

师生们相聚一起或吟咏诗词，或评论文章，或切磋书画，内容丰富，趣味无穷。

一次，张耒赋诗评论师友们的文章特色：“长

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藻舒桃李，晁论峥嵘走金玉。六公文字满人间，君欲高飞附鸿鹄。”人们称赞他以诗评文有子瞻之风。黄庭坚接着补充：“行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把“肥仙”张耒比喻为布袋和尚，令众人笑倒，张耒自己也哈哈大笑。

苏轼《书黄泥板词后》回忆：“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三门生为了得到先生的宝墨，竟然翻箱倒柜，毫无顾忌。最后，此珍贵的手稿为“肥仙”所得，当然，这也是师兄们大度谦让之结果。

在苏轼门下，民主风气很浓。苏轼待弟子如朋友，从不摆老师资格。因此，师生之间相互赞赏，相互鼓励，也不客气地相互批评指点。后人评：“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黄庭坚评苏文：“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之作，汉、唐诸公莫及。”苏轼作诗则虚心地学“黄庭坚体”。后人评：“苏门六君子，无不掉鞅①词场，凌躐流辈②。而坡公于山谷则数效其体，前哲虚怀，往往如是。”（田同之《古欢堂集·杂著》卷二）与此同时，苏轼对黄庭坚的诗也指出其不足：“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③，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批评其诗过于追求精美。黄庭坚比较超脱政治，提醒苏轼说：“先生诗文妙极一世，然多怨刺。”苏轼答：出于诗人之义，托物以讽，希望能有补于国。

苏轼与黄庭坚还常在一起切磋书法。黄庭坚评苏轼墨迹：“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跋东坡墨迹》）他将东坡书法同唐朝的书法名家徐浩、柳公权、颜真卿、杨凝式、李邕等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东坡博采众家之长，从而形成“笔圆而韵胜”的独特风格。并且指出，书

法并非单纯的笔墨技巧，还跟文学修养、气质禀赋密切相关。此评论非常中肯确切，也由此显示了黄庭坚高超的书画鉴赏能力。有时，两人也相互指出对方书法的短处。苏轼诙谐地指出：“鲁直之字固然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如同树梢挂蛇。”黄庭坚也不客气地指出：“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架褊浅，甚似石压蛤蟆。”两人大笑，都认为对方道出了自己书写之短处。

苏门弟子之间也相互观摩评品。黄庭坚在《与秦少游书》中自谦地说：“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词，似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至于议论文字，今日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秦观也非常推崇黄庭坚的诗文，自觉不及，曾云：“其《敝帚》、《焦尾》两篇，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汉之风”，所谓“珠玉在旁，觉人形秽”（《与黄鲁直简》）。秦观好为营妓赋词，当时风行的有《水龙吟》，寄营妓娄婉（字东玉），又赋《南歌子》赠陶心儿。苏轼曾诮之，批评他“学柳七作词”。黄庭坚也劝告他要少写青楼方面的题材。苏轼论晁补之词时，以为诗词不可务为怪奇，当以“平和”为先。“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避讳，恐伤其迈往④之气……”有赞扬，也有批评。

苏轼与门生还常在一起作画题诗，相互切磋观摩，情趣相投，其乐融融。

苏轼知贡举，黄庭坚为属官。在休闲时，苏轼画了小山枯木，黄庭坚为之题诗：“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称赞苏轼的学说自成一家，在儒家与墨家之间纵横驰骋，所向无敌；其书法可与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和杨凝式媲美；其枯木山丘画得入神，是由于胸有丘壑之故。苏轼善于把书法的用笔和结构运用到山水画中，可谓“文人画”的翘楚。黄庭坚以诗评画，确实精到。

一次聚会，苏轼画了一幅丛竹怪石图。李公麟随即在画的前坡上添上一个骑牛牧童。黄庭坚在画的一侧题诗：“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椎，御此老觳觫⑤。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题竹石牧牛图》）黄庭坚把两人的画融汇在一首诗里，并抒发了对这幅画的喜爱之情。真是诗画绝配！

晁补之喜欢收藏名画，常请恩师在上面题词。苏轼作《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戏用晁补之韵》，《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等。

陈师道在京城逗留时与苏轼、黄庭坚唱和最多。其论诗简明而精确：“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韵语秋阳》中有一段文字，写苏轼为礼部尚书兼侍读之时，陈师道赋诗劝他及早抽身退出官场。后来苏轼知定州，陈师道又作诗提醒他勿忘当年的决定：“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无违具一舟。”当年苏轼知杭州时作《八声甘州》赠诗僧参寥子云：“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有人说苏轼不听劝告，因此此诗句成谶语。其实，当时即使苏轼及时抽身归田，也已经不可免祸。且不说许多早已致仕的老臣如吕公著、范纯仁等也被流放岭南，甚至连已经作古的司马光，章惇还要开棺鞭尸。再说，明哲保身决不是苏轼的性格。不过，由此说明，陈师道是有先见之明的，而且表现了他对老师的深切关怀。陈师道的诗以黄庭坚为师，由于两人在诗学上见解切合，人品高洁，友谊始终如一。在《与鲁直书》中，陈师道关于自己与黄庭坚的交往与情谊记载甚详细。在陈师道的酬作中，最早的有《和豫章公黄梅二首》，此系元祐元年冬黄庭坚所作《戏咏腊梅二首》的和诗。此外，还有《寄豫章公三首》、《赠鲁直》等赠答诗。

师生之间也相互馈赠礼物，主要是笔墨等文房四宝和茶叶。如鲁直赠苏轼江西家乡的名茶“双井茶”，自己珍藏的“有筋无骨”徐偃笔。李廌赠送老师麝香墨等。这些赠礼，不仅是物质上的关心，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交流。

苏轼非常关心弟子的前程，希望他们个个能学有所用，尽己所能帮助他们、提挈他们。他奉调进京后，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在朝廷上比较有发言权。根据司马光“十科取士”招募人才的政策（其中一科，布衣只要品德好，精通经术，可备讲读科，当学官），苏轼与傅尧俞、孙觉联名保举陈师道：“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过壮未仕，实为遗才。”于是，陈师道被任命为徐州州学教授。时陈师道35岁，才入仕途。苏轼除翰林学士知制诰（俗称内翰）时，再三推辞，而举荐黄庭坚代己，奏曰：“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如此肚量！

对李廌这名特殊的门生，可以说苏轼尽的心最多、出的力最大。他非常欣赏李廌的文章，又常常教诲其为人之道。元祐初，李廌给苏轼寄《忠

谏书》、《忠厚论》，及二万字论西方边事的《兵鉴》。苏轼回信称赞：“承示新文，如子骏行状，丰富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常力所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完，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之乃信尔”（《与李方叔十二首》之一）。同时指出其不足：“足下之文，过人之处不少，如《李氏墓志》及《子骏行状》数诗，笔势翩翩，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主持礼部贡举，黄庭坚、张耒为僚属。李廌携文进京谒苏轼。苏轼阅李廌文大有进步，称赞他：“张耒、秦观之流！”留住东斋准备应试。遗憾的是李廌在此次贡举中竟然落榜了。《鹤林玉露·甲编》卷五《李方叔》中云：苏轼在贡院出题后，在锁院前将试题用书简传出来想透给李廌，没想到无意中被章惇之子章援拿到了，结果考了头名状元，而李廌没看到而落榜了。这纯粹无稽之谈。苏轼最厌恶此类营私舞弊之举，不可能干这种勾当。何况，苏轼等对李廌的才学评价很高，对他中榜很有信心。再则，章援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举子，苏轼也承认他的文章比其父亲写得好。如果确有其事，章援也不至于自我暴光舞弊，往自己脸上抹灰。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否则，那些虎视眈眈地盯着苏轼的政敌，岂会放弃弹劾苏轼的机会？李廌的学问才气众所公认，估计他闭门造车，不了解时事，导致策论闪失的原因。苏轼同范祖禹认为，李廌是奇才，弃于路隅太可惜，于是，两人准备一起向朝廷推荐李廌，但不久苏轼被排挤出朝廷只得作罢。

苏轼对李廌非常爱护，尽己所能帮助他。元祐四年四月苏轼出知杭州，将行，以朝廷所赐马赠之，并亲自书写赐马券。《赠李方叔赐马券》：“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出公据。”苏轼想得非常周到，李廌贫穷，可能要卖马换钱，但说得很委婉。黄庭坚也在赐马券上题跋：“翰林苏子瞻，所得天厩马，其所从来甚宠，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苏轼又附文曰：“丈夫功名在晚节者甚多，如国手棋，不须大段用意，终局便须胜也。”其意在勉励李廌再接再厉。方叔感动万分，

也作诗《次韵奉和》致谢。

李廌在《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自己检讨：“廌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自丙寅年，东坡尝诲之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⑥也。’尔后常以为戒。”

苏轼对自己的门生非常自豪，认为能最先发现这些人才，是自己坎坷生涯中的一大安慰。苏轼《答李昭玘书》：“轼蒙庇粗遭，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然此数子者，挟其有余之资，而骜于无涯之知，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则亦将安所归宿哉！”苏轼又说：“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甚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答李方叔十六首》）苏轼认为门生虽然不遇于时，而他们的才学必显于后世。

苏轼对弟子们寄托了继往开来的厚望。他对张耒说：“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答张文潜县丞书》）他又语重心长地嘱咐弟子们：“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付任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某也。”（李廌《师友谈记》）

当然，此时朝中并非风平浪静。一些人拉帮结派，有所谓洛党、朔党和蜀党之派别。“洛党”以程颐及其门生朱光庭、贾易等理学派为主，并拉拢了居住于洛阳的一些老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朔党主要指刘挚、王岩叟等出身北方的大臣；蜀党指以苏轼兄弟为首的四川籍官员，包括苏门弟子，主要是四学士、六君子。其实，这完全是指加于苏轼兄弟的，他们从来不愿意也不会拉帮结派。理学家程颐和老臣刘挚也是正人君子，只是与苏轼有不同观点而已。最主要的是朱光庭和贾易，此二人是苏轼同科及第的同年，完全是出于对苏轼的嫉妒。尤其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御科策中，苏轼获得了最高等，此乃大宋开国以来第

三个获此殊荣，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而且，仁宗皇帝将苏轼兄弟视为未来宰相的人才。此殊荣既给苏轼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给他埋下了祸根。对苏轼攻击最凶、迫害最狠的正是他的同年们，他们都惟恐苏轼登上相位。元祐时期，特别是司马光去世之后，朱光庭和贾易，见苏轼受到重用，且门下弟子兴盛，更是妒恨交加，不遗余力地攻击、排挤苏轼。朋党之谗，使苏轼不安于朝。若不是摄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庇护，恐怕苏轼早就被整下来了。

“苏门”弟子本由于文学而连结在一起的，而非政治派别，但在党同伐异的状况下，他们都成了“蜀党”而惨遭牵连。元祐初，苏轼以贤良方正保荐秦观参加制科考试，为嫉妒者所中伤而未果。后来由于范纯仁保荐，方才任太学博士。司马光去世不久，苏轼为了避祸自请外任，出知杭州。不到两年，苏轼被召回朝廷，朱光庭和贾易又拉拢御史杨畏、赵挺之，连章弹劾苏轼，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甚至将疏浚西湖造福黎民的大好事，也冠以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罪名。于是苏轼又自请外任，出知颍州、扬州。不满一年又被召回，任吏部尚书（后为礼部尚书）。此时，苏辙已任门下侍郎，政敌们揣度苏轼可能任宰相，更是不遗余力攻击他，抓不住他政务中的纰漏，竟把元祐初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贬谪诰词翻出来，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恶意中伤，强加予“诋毁先帝”罪名。

可悲的是，在哲宗亲政之后，此三派均被冠以“元祐奸党”而备受迫害，无一幸免。

“朋党”之祸 患难与共

元祐八年，宋王朝风云突变。哲宗成年之后开始亲政，不久高太后又逝世，朝廷很快启用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新党章惇、蔡卞等当政。他们将司马光时代的朝廷官员称之为“元祐党人”，并加以排挤和迫害。司马光欣赏的苏轼首当其冲，以“诋毁先帝”的罪名第一个被贬谪到岭南，并且一贬再贬，最后被流放至当时最蛮荒之地海南儋州。紧接着，苏辙和苏门弟子也都开始了不断贬谪的遭际。

黄庭坚性格澹泊，无意介入朝廷党争。但他

任地方官时，出于对百姓的责任感，对有损百姓利益的新法，也有抵制。更主要的是，他同苏轼过从甚密，因此，也被牵涉到元祐党祸之中。监察御史赵挺之弹劾苏轼，乘机连带黄庭坚：“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薄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本来，范祖禹和黄庭坚等撰写的《神宗实录》，公认“史实翔实，文采粲然，被誉为‘元祐史笔’”。当权者却诬陷《实录》不实，摘录千余条命前史官验证，结果绝大部分皆有依据。他们不甘心，又找出黄庭坚写的一条，内容是神宗年间“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在审讯时黄庭坚坦然回答：我当时在北京任职，曾亲眼所见，确实如同儿戏。许多人听了称赞他刚直。然而，最后还是无中生有地以“类多附会奸言，诋熙宁以来政事”的罪名将他和范祖禹等史官贬谪出京。黄庭坚先贬为涪州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又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等蛮荒之地。

监察御史刘拯参苏轼对先帝不臣，又连带秦观：“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苏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于是，秦观出任杭州通判，后又以书写佛书罪，再贬监处州、郴州、横州、雷州等地。

紧接着，晁补之同样以坐修《神宗实录》失实罪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州、信州酒税。张耒以同样罪名迁徙宣州，贬谪黄州监酒税、竟陵郡监酒税。陈师道以“进非科第，罢归”，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家境之中。只有李廌没有官职，未受大的影响。

这些苏门弟子不论处境如何艰难，没有一个背弃恩师的，甚至没有一个为此对苏轼有怨言的。而且，尽管师生们天各一方，无法探访，仍然相互关心，相互勉励。这种在患难之时显示出来的情谊更是感人至深。

张耒以直龙图阁知润州时，苏轼贬谪英州，途径润州，师生最后一次会晤。张耒派遣兵卒护送苏轼南行。他被贬宣州后，还特地派遣使者带了药物至惠州看望恩师。苏轼无钱买礼物，回赠了一根桄榔方杖，并写信安慰他：“瘴疠虽薄有，然不恶，与小儿不曾病也。”还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实际上，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就是死于当地的瘴疠，但苏轼尽量淡化自己的艰难，

以安抚弟子之牵挂。

秦观性格风流倜傥，但又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比较低落，不过，苏轼依然是他倾吐心曲的知友。他将自己贬谪郴州途中所作的词《踏莎行》寄给苏轼：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上半阙描绘了一幅夜雾弥漫、月色朦胧的画面，抒写了自己被流放偏远之地时的孤独、迷惘处境。下半阙抒发对亲友的思念之情。词人本渴望从远方的书信中获得慰藉，然而得到的却是师友们同样不断遭贬逐的坏消息，从而加重了他心中的无限怅恨。此情此恨，如同围绕着郴山的郴江水一样，一直流向远方……苏轼非常欣赏此词，尤其是结尾两句。秦观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的境遇中，曾自作挽词：“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有人认为他悲观绝望。苏轼最了解他，为之辩护：“予以谓少游齐生死，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哉。”苏轼流放海南前，秦观正巧贬谪海康，两人终于得以相聚。由此一别，再也没能相见。

苏轼与黄庭坚在贬谪时，于彭蠡湖上巧遇，相聚了三天。黄庭坚出示一个铜雀台砚，请苏轼为之写铭文：“人亡台废，得反天宅。”不胜感慨。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聚会。

陈师道写了不少怀念苏轼的诗。其中《怀远》可见一斑：

海外三年谪，天南万里行。
生前只为累，身后更须名。
未得平安报，空怀故旧情。
斯人有如此，无复涕纵横。

此诗抒写了苏轼贬谪之地之远、时间之长，表现了对恩师无限的思念之情。

苏轼被流放到岭南，宰相章惇仍不放过他，派遣酷吏南下以巡视为名，企图继续加害于他。尽管身处险境，苏轼依然故我，还兴趣盎然地大作和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曾在彭泽当过县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苏轼对他非常敬佩，而且认为自己不如他。黄庭坚看到苏轼的和陶诗之后，立即回应，写了一首《跋子瞻和陶诗》：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他赞扬东坡如同陶渊明，虽然一个归隐，一个出世，但忧国爱民的精神是相通的，同样是流芳百世的贤士。

哲宗死后，徽宗登基，向太后摄政，大赦天下，元祐党人纷纷被召回。

黄庭坚于建中靖国元年出峡，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后被任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又召重修《神宗实录》……张耒起用为黄州通判，召任太常少卿，不久复出历知兖州、颍州、汝州等。晁补之任吏部郎中，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等。秦观复宣德郎内迁。陈师道也复官学之职，后召进京，除秘书省正字，但家境依然贫困潦倒。

苏轼在获赦北归时与秦观相约于廉州见面，不料秦观在北归途中卒于滕州。苏轼惊悉噩耗，哀伤不已，在自己的扇子上题写了秦观的《踏莎行》末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后又写道，“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

苏轼回到中原，得知众门生皆因自己而获罪，怅恨自责：“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长途跋涉劳累不堪，在返途中即病倒了，加以常年病毒侵袭，体质衰弱，回到中原不久，即病逝于常州，享年 66 岁。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弟子们得闻噩耗，个个悲痛不已。张耒闻苏轼卒，在贬所颍州出己俸禄，于荐福禅院请高僧为苏轼做法事，缟素而哭。在京师任职的晁补之在家中设恩师牌位，晨昏哭祭。黄庭坚在荆州，闻苏轼过世的噩耗，士人往吊唁，他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邵氏闻见后录》卷 21 记载，有人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黄庭坚《寄苏子由》第二书悲愤地写道：“端明二丈⑦，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谓遂至于此，何胜殄瘁⑧之悲。”

苏轼逝世的同年，陈师道也在贫病交加之中谢世。亳州有句老话：“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陈师道身体力行。此年冬天十二月，朝廷举行郊祀，陈师道当扈从。当时天气异常寒冷，他连一件棉衣都没有。妻子从其连襟赵挺之家拿来了一件新棉衣。由于赵挺之是迫害苏轼的奸臣，陈师

道坚决不穿，结果，郊祀时染了风寒，不久便谢世了，享年 49 岁。此事并非杜撰，《宋史》有记载。后世没见到他悼念恩师的诗文。但是他平时写的一首诗，足以表明他对苏轼的评价：“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

李廌的家乡华州离苏辙归隐地许昌比较近，因而最先得到恩师去世的噩耗。他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为苏轼灵柩的安葬到处奔走选墓地。他的祭文写得最有气势：“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载英灵之气。”这气壮山河的悼词，完全符合苏轼的禀赋节操及其毕生作为。恩师的下场，使李廌终于看透了官场，从此终生不仕。

宋徽宗崇宁元年，苏轼去世仅一年之后，向太后去世，蔡京兄弟专权，元祐大臣重遭党祸，还在皇宫前立“元祐奸党”碑，公布于天下。执政以司马光为首，包括苏辙在内；侍从官以苏轼为首，余官以苏门四学士为首。并诏令禁毁苏氏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的所有诗文。于是，幸存的苏门弟子再一次卷入党祸之中。

张耒由于隆重祭祀苏轼之举而再次被贬谪至黄州。黄庭坚又被贬谪洪州，崇宁二年末黄庭坚又被“除名、羁管宜州”，两年后即去世。黄庭坚途经鄂州时，曾到黄州去拜访张耒。两人重游东坡故地，哀悼恩师。黄庭坚作诗《次韵文潜》：“年来鬼祟覆三豪，词林根柢颇摇荡。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象……经行东坡眠食地，拂拭宝墨生楚怆。水清石见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三豪指苏轼、秦观和陈师道，他们三人同年谢世。文坛失去三人，损失不可估量。李白曾说，天生我才必有用。然而，上天降生了苏轼等这样的奇才，却在生前得不到重用，只能于身后让人们膜拜他们的图象，多么可悲。“眠食地”指苏轼在此地的故居，“秘密藏”佛家语，《圆觉经》：“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令诸大众深悟轮回。”最后两句表明自己与张耒清白无辜，即使屡遭劫难，也无愧于心。

晁补之也贬出朝廷，出知河中府等地，最后病卒于泗州任上，享年 58 岁。晁补之与张耒年相仿，前者年长一岁，感情尤其投合，平生交游最密。张耒闻补之病卒，为其写了墓志铭和祭文。

《晁补之墓志铭》，详述了晁补之生平，高度赞扬其卓绝才学与优秀品德。（下转第 67 页）

未尝一念忘此心（下）

——解读苏东坡的道家情结

王琳祥

内容提要：大量的原始资料表明，苏东坡自小好道，本不欲婚宦，只因父母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但至老“未尝一念忘此心”。就苏东坡看来，人世间的虚名与微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惟有修道得道，才是“死时将得去”者。

关键词：苏东坡 道家情结 解读

当得知苏东坡迁入白鹤观新居的喜讯，邓守安道士与一位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特从罗浮山赶到惠州，三更叩门，饮酒于合江楼下。仙人临去，又以《真一法》与《修养九事》相赠。视其书末有“九霞仙人李靖书”七字。手握仙人所授秘籍，苏东坡神情恍然……

谪居惠州，苏东坡又像谪居黄州一样，每日一早起床，要么招客会晤，要么出门访客。所交游者，不择高下。谈谐放荡，无话不谈。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人辞无有，则命其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如果某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病。

元符元年（1098）九月底，苏东坡独游儋州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欲知余生之祸福。其词说：“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相离，寿命已得延。”就苏东坡看来，信道与法智，二者不可相离。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守法而不智，则为死法。以信合道则道疑，以智先法则法活。道疑而法合，即可度世，亦可延长寿命。否则，一切反是。苏东坡从签词中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故书而藏之，以不忘信道、法智二者不可分离之意。

在儋州，苏东坡鉴于儋耳米贵，有绝粮之忧，拟与儿子苏过炼《龟息法》，旨在共度难关。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卒。苏东坡因徽宗登极恩量移廉州安置。四月二十一日，又以徽宗喜得皇子之恩，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弃家修道的吴复古获此喜讯，再度渡海，以此相告。苏东坡鉴于吴复古与李士宁、兰乔这些得道高人自由自在的交往，发出了“马迹车轮满四方，若为闭著小茅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痴疾还同顾长康”的感叹。

当年，苏东坡在惠州获南迁儋州之命，子孙痛哭于江边，以为死别。他在与王敏仲的书信中无望地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当苏东坡有幸从海南岛北归，为答谢海神庇护之恩，作文刻碑说：“轼以罪谪儋州三年，今乃获还海北，往返皆顺风。念无以答神贶者，乃碑而铭之。铭曰：至险莫测海与风，至幽不仁此鱼龙。至信可恃汉两公，寄命一叶万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抚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穷达常正忠。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

当苏东坡抵达容州之日，意处地与都峤山道士邵彦肃再次相逢。邵道士自容州送苏东坡十日，这是一位颇重情义的有道之士。当离别之日，苏东坡作诗相赠，诗中高度地赞扬邵道士：“乞得纷纷扰扰身，结茅都峤与仙邻。少而寡欲颜常好，老不求名语益真。许迈有妻还学道，陶潜无酒亦从人。相随十日还归去，万劫清游结此因。”

当苏东坡经过广州之时，专程到天庆观看望崇道大师何德顺道士，观其所作众妙堂。因羡慕其清

净的道家生活，故作诗抒怀：“道人晨起开东轩，趺坐一醉扶桑暾。余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温。”

十一月一日，诏授苏轼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十五日，吴复古、何德顺等闻讯自番禺追践至清远峡，同游广庆寺。

提举成都府玉局观，是苏轼多年的夙愿。当苏东坡在英州获得诰命之后，他在《过岭》一诗中欣慰地写道：“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

苏东坡在英州，惊悉吴复古病卒。回首多年的友情，加之吴复古在几天之前不吃不喝还为自己送行，苏东坡于悲伤中作祭文一篇，高度评价其“有似子微，或似壶子……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卒老于行，终不自非。送我北归，中道弊衣。有疾不药，但却甘肥。问以后事，一笑而麾。飘然脱去，去散露晞。我独何为，感叹嘘唏。一酌告诀，逝舟东飞。”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下旬，苏东坡抵达虔州，偶与术士谢晋臣相会。谢晋臣精通算命之术，说过去与未来让苏东坡心服口服，苏东坡作诗相赠。诗中说：“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死后人传戒定慧，生时宿直斗牛箕。凭君为算行年看，便教生时到死时。”卢行者，指的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韩退之，唐代文学家韩愈。

据《瑞桂堂暇录》记载，苏东坡从海外归，有人问其迁谪艰苦，苏东坡说：“此骨相所招。小时入京师，有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名世，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悉符其语。”这个记载想必与谢晋臣有所关联。

四月初四，苏东坡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于岸侧得一古石弩矢，因左右传阅失手又落水中。苏东坡虔城祈祷顺济龙王，许愿将此稀贵之物留在庙中以为镇庙之宝。祈祷完毕，苏东坡令人下水探寻，竟失而复得。有感于顺济龙王的灵异，苏东坡作《顺济王庙新获石弩记》，以彰其德。

当月，苏东坡与刘安世同入庐山，再会玉涧道人崔闲。当离开庐山之时，九江天庆观道士胡洞微负笈相从数百里。苏东坡在感慨万分中作《答胡道师》一篇，述第二次游览庐山的感受：“再过庐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栖贤、开先之胜，殆亡其半。幻景虚妄，理固当然。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道士又不远数

百里负笈相从，秉烛相对，恍如梦寐。秋声宿云，了然在吾目前矣。幸甚！幸甚！”

五月，苏东坡与程之元（德孺）、钱世雄（济明）聚会金山，登妙高台烹茶，因壁间有苏东坡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所绘苏东坡之像，苏东坡于感慨万分中为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总结：“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三、事皆前定，何须说短论长

（一）苏东坡与玉局观的因缘难分难解

苏东坡的道家情结浓郁深厚，在苏东坡留下的大量诗词文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的信息。归结起来，一是先天的禀赋，二是后天的陶冶。

苏东坡来到人间，与其父亲苏洵求子于成都玉局观密切相关。

成都玉局观，位于成都市南，这是一座富有神秘色彩的道家宫观。据道书记载，东汉永寿元年（155），道家始祖太上老君与张道陵到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坐，为张道陵说《南斗北经》，既去而床隐，地中因成洞穴，故名玉局化。北宋于此置玉局观。

天圣八年（1030），22岁的苏洵因长女生下不久夭折，当他独自苦闷于成都玉局观时，无意中见到了无碍子卦肆中张仙的画像，无碍子“此乃张仙也，有求必应”的一句话，正好言中了苏洵欲求后嗣承继香火的心事。苏洵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祖传的玉环换得了张仙的画像。自此，每日一早焚香礼拜，其精诚足以使金石为开。几年后，苏洵如愿，苏东坡来到人间。

苏东坡的出生与成都玉局观密切相关，苏东坡仕途的结局亦与成都玉局观连在了一起。

谪居儋州的苏东坡从海南岛北归之日，在英州得到了以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诰命。提举成都玉局观，苏东坡梦寐已久，他曾在《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的诗中，以期盼的口吻说自己“玉局他年第几人”。人世间的万象皆有因缘，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灵操控。即将撒手人寰的苏东坡在常州上表，请以“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的官衔致仕，其仕途在此划上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句号。

（二）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

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冥冥之中就像有神灵在精心的安排操控。

当苏东坡降生人间之时，彭老山上的草木迅速枯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异的天象。

当苏东坡在天庆观读书之时，道士李伯祥一见即大惊叹：“此郎君，贵人也。”

当李士宁第一次看到苏东坡时，脱口而出：“子甚贵，当策举首。”

当苏东坡第一次来到京城之时，看相者给他一个结论：“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名世，然有迁徙不测之祸。”

（三）神异的二十七与七月二十八日

综观苏东坡的一生，我们惊异地发现，他与他的亲人皆被“二十七”这个数字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众所周知，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年少喜欢游荡，不好读书，但在二十七岁的那一年，幡然醒悟，发愤苦读，终成一代大儒。《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即指此事。

苏东坡来到人间之时，他的母亲程氏正好是二十七岁。

苏东坡的爱妻王弗离开人世时，年仅二十七岁。

苏东坡的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在家中的昵称是二十七娘。

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与苏东坡的年龄相差整整二十七岁。王朝云进入苏家之年，王闰之刚好二十七岁。王朝云的儿子干儿，出生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七日。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小号“九三郎”，九三二十七，这其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因缘。苏辙与王弗同年，王弗病逝之年，苏辙也刚好二十七岁。

苏东坡自己与二十七的关系也很密切。初入仕途，他在凤翔签判任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就是二十七岁；他开始涉猎佛书之时，年龄也刚好是二十七岁。

苏东坡二十七岁时，他的二伯父苏涣在提点利州刑狱任上无疾而终。

苏东坡的大儿子苏迈二十七岁时，其伯父苏不

疑（子明）在眉山病逝。

苏东坡的二儿子苏迨二十七岁时，王朝云在惠州撒手人寰。

……

“二十七”与苏东坡家族的关系如此紧密，是巧合还是天意，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苏东坡的一生中，除了二十七这个数字与他关系密切之外，七月二十八日可以说是他的灾难之日。

元丰二年（1079）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湖州遭到逮捕，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的一天。

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的爱子苏遁（干儿）夭折于他流寓江淮的途中，干儿的母亲王朝云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最让苏东坡刻骨铭心。

两次不堪回首的痛苦事件，虽然都发生在七月二十八日，但对于四十九岁的苏东坡来说，也许他会感觉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此时的苏东坡绝不会想到他将在十七年后的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与世长辞。

四、苏东坡道家情结浓郁的深层原因

综观苏东坡一生的道家情结，明显存在着几个不同的阶段。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这一段发自内心的表白，是苏东坡谪居惠州时，于绍圣二年（1095）六月写给隐居湖州三茅山刘宜翁的一封书信中的原话。苏东坡当年已是六十花甲的老人。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段话，那就是我苏轼从小喜好道术，不想结婚做官，只因父兄所逼，难以如愿。既走上了仕途，则身不由己。虽然如此，几十年来自己从未将修道之事忘怀。

苏东坡的启蒙老师是眉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从张易简的名字即可看到这个道士具有高深的道行。古人有大道至简至易的说法。

青少年时代，苏东坡的道家情结基本上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当踏上仕途之后，逐渐趋于理性。这个时段的转折点，是在凤翔签判任上于上清太平宫系统地阅读道藏之后。

但是，就在苏东坡的道家情结日益浓郁之时，

苏东坡在凤翔签判任上对佛家典籍也开始有了接触，这样一来，或多或少冲淡了苏东坡昔日专恋道家的情趣。

当苏东坡离开凤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与道家高人的接触明显低于与佛家高僧的交往，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任职京师与杭州的时候，特别是杭州寺院众多，高僧如云，道家的宫观及高人与其相比，显得不成比例。但是我们也看到其根本的原因，正如苏东坡与刘宜翁的书信中所说：“一落世网，不能自逭。”也就是说人一旦走上仕途，进入官场，就自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束缚。

那个时候的苏东坡毕竟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他有一个报效祖国的大志，还想成就一番经世的伟业，且有拼搏上进的襟怀。这种情态在他从杭州通判晋升为密州太守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苏东坡离开杭州时，杭州的富道人热心地将祖传的秘方与自己炼得之丹药馈赠给苏东坡，然而苏东坡推辞不受，他在给富道人的书信中说出了如下一段话来：“承蒙示秘方及寄遗药，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无以遣日，聊用适意可也。若恃以为生，则为造物者所恶矣。仆方苟禄出仕，岂暇为此。谨却驰纳，且寄之左右，或异日归田却咨询。感慨之至，千万悉之，不一一。”

林下，指高士退隐之所。苏东坡的观点十分明确，他刚刚在仕途上走上正轨，没有精力再去修道炼丹了，而修道炼丹那是林下之士无以遣日，聊用适意之所为。造物者是不喜欢人以此为生计的。

往下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密州、徐州、湖州太守任上，苏东坡与道家修炼者的交往不是很多。当人们询问身为徐州太守的苏东坡为何与云龙山人张天骥的关系如此亲密之时，苏东坡的回答是：“装铺席耳。”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记述此事，说有人问苏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苏东坡笑着说：“装铺席耳。”邵氏批评说：“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聰、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

装铺席，即装饰铺席之物。属于点缀之物。如果此事属实，苏东坡与张天骥的交往，其用意是可以窥测的。

然而，历经了“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的人生态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逃过了那场生死之劫，眼

见身边的亲人相继离世，体悟到修身养性对自身的至关重要。他在给秦观的书信中，强调“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这里面包涵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多因素。

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全身心地投入到炼丹与修养身心两件事上。他斋居天庆观四十九天，与朋友书信的内容大多涉及修炼之事，他向朋友访求修炼方法，求取丹砂，并将自己所知道的修炼方法和炼丹秘方告诉给相知友好，目的就是让相识者都注重修炼。就苏东坡看来，只有这一件事情才是属于自己的事情，因为它生得来，死得去，至于蜗头虚名、蝇头微利之事，皆为身外之物，如同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然而，人世间就是这样考验人，修炼的路上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道家得道的高人在道书中屡见不鲜，如秦汉时代的安期生，晋代的葛洪、单道开、许逊、许迈等得道升仙都有明确的记载，但现实中享有盛名的那些有道之士为什么一个一个的都像平常人一样的死去呢？初到黄州的苏东坡耳听得光州道人朱元经活了百余岁，世人皆传其道术高超，能黄白之术，炼有很多丹药和金银，但死时却是中风搐搦，与常人无异。百思不得其解的苏东坡曾作文一篇，直接以《异人有无》为题。文中以怀疑的口吻说道：“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就在苏东坡对道家异人有无这一件事上心存疑念的时候，眉州陆惟忠道士从四川来黄州看望苏东坡，交谈中，陆道士告诉苏东坡眉山陈太初道士得道升天之事。据说陈太初得道升天之时的景象，汉州很多人都亲眼目睹。陈太初是苏东坡在眉山天庆观读书的同学，他们的启蒙老师张易简道士最欣赏的两个学生，除了苏东坡之外，另一个就是陈太初。苏东坡从迷茫中惊醒过来，原来道书中说的都是真实的。苏东坡满怀激情，记下了这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异事：“予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卒。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

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无独有偶，筠州丐者赵吉，自言有一百二十七岁，敝衣蓬发，特好饮酒，醉辄殴詈其市人。与人相遇，虽未尝识，却能道其宿疾与其平生善恶。赵吉两目皆翳，视物不明，然而不时脱翳，其瞳子为碧色。自脐以下，骨如龟壳，自心以下，骨如锋刀。两骨相值，其间约有一指宽不合。赵吉在筠州听说苏东坡谪居黄州，带着苏辙的书信前来相会。因与苏东坡投缘，在黄州一住就是大半年。时逢苏东坡量移汝州，苏东坡将赵吉托付给兴国军太守杨绘。赵吉喜欢豢养禽鸟六畜，常以一物相随，寝食皆在一起。一日，赵吉被所蓄骏骡踢伤致死，杨绘于悲伤中用棺木将赵吉埋葬了。谁料一年后，四川僧人法震到京师拜谒苏东坡兄弟俩，言在云安的旅馆中见到一位年老的乞丐，自言姓赵，与苏东坡相识，请法震转致问候。苏东坡听到这样的奇事，自然是惊异得不得了。兴国军新任太守朱彦博的儿子恰好在其场，听说此事后，将此告诉了父亲。朱彦博即遣人打开了赵吉的棺木，棺内真的不见尸首！唯有一根拐杖及两只人的小腿。

赵吉尸解的事实，再一次使苏东坡明白了道书中得道者不死的真实内涵，道书中所说的白日飞升与尸解完全是真实可信的。

从此，苏东坡对道家修炼的理解有了实质的变化，他与道家高人的交往由形交上升到了神交。

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苏东坡与道士杨世昌等一起乘着月色泛舟于赤壁之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杨道士有感于三国赤壁之战于此发生，昔日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知其所终。明月在天上高挂，长江之水在无休无止地东流，而自己的生命显得是那么短促，实在是令人伤感，于是借助箫声，旨在把自己的心里话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苏东坡面对杨世昌道士的伤感，利用道家的理念，借助大自然的变化，如江水的流逝，月亮的圆缺以及风声月色来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无常的。变与不变就看你站的基点如何。如果以自身变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天地之间一眨眼就有变化；如果以自身不变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万事万物又都是永恒的。变，万物都在变；不变，万物都不变，那么世界上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再说这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假如不是自己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要拿。只有这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

成为色彩，你想享用它，没有谁来阻拦禁止你，你想享用尽管享用，它永远不会穷竭。

苏东坡的话富有哲理，杨世昌道士听了之后高兴极了。于是倒上酒，主客在舟中重新对饮起来。

根据这一次月夜泛舟于赤壁之下的韵事，苏东坡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这就是千古绝唱《赤壁赋》。

时隔三个月，苏东坡又与杨世昌道士月夜泛舟于赤壁之下。时夜将半，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舟而西。苏东坡与杨道士皆不知其为何祥。是夜，东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东坡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有感于此，苏东坡又写出一篇绝妙的文章，这就是世人熟知的《后赤壁赋》。

元祐六年（1091）七月，苏东坡应诏撰写《上清储祥宫碑》，在碑文中，他第一次鲜明地高度地概括了他对道家修炼的理解：“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

清净，指心地洁净，不受外物干扰。无为，道家指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老子》原文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淮南子·原道》说：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虚明，即为空明。应物，适应事物的变化。慈俭，仁慈谦逊。仁者静寿，是说仁者安静，故多长寿。《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时人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为妙理。程伊川即程颐，北宋理学创立者，与苏东坡的关系并不亲密友善。

苏东坡对道家修炼的认识还可以从他与韩维的女婿王寔及王宁的谈话中略见一斑。

韩维于元祐二年罢门下侍郎，知邓州，后改汝州，致仕后常对人说：“吾已癃老，且将声乐酒色以娱年，不尔无以度日。”苏东坡叫王寔带口信给韩维，强调人到晚年，更不能沉迷声乐酒色。苏东坡给王寔、王宁讲了一个老人临终前给他儿子们的终告：“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老人的儿子不懂“勾当自家事”的

意义，老人解释说：“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将，是带的意思。老人强调说：“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苏东坡请王寔、王宁带信给韩维，要他注重勾当自家事。人世间的虚名与微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与其劳心声酒，不如为死时可以带得去的东西多考虑一些。

道家修炼以清净无为为主旨，修性养性可以使人心空明，也可以使人仁慈谦逊。仁者静，仁者寿。如此说来，苏东坡浓郁的道家情结，说到底就是建立在修道得道、“勾当自家事”这一基点之上。

苏东坡在黄州曾填《满庭芳》一词，世人以为“功名竞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词中说：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东坡谪居惠州，作《行香子·述怀》词，略话自己的道家情结，亦可作为本篇小结：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参考文献：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孔凡礼撰《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孔凡礼撰《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82年版。

清·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颜中其编著《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

年版。

宋·苏洵著《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著《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33-34·宋辽金·苏轼卷》，荣宝斋1991年版。

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东方龙吟著《万古风流苏东坡》，吉林文史出版社。

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梅大圣选评《苏轼黄州诗文评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复印，1980年版。

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版。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

宋·洪迈著，鲁同群、刘宏起校注《容斋随笔》，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

（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刘清泉）



人生如梦（刘怀东篆刻）

苏洵、苏轼《太玄》学浅析

金生杨

内容提要：苏洵、苏轼对扬雄所作《太玄》都有论说，直接影响到扬雄历史地位的升降。他们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易，并不懂得圣人之道，在历数、著法、占法等方面也多有失误。不过，苏洵总结《太玄》之例，改造《太玄》以归于无罪，不仅体现出他深精象数，而且也反映出他对这位乡贤前辈仍有深厚的推重之意。

关键词：太玄 苏洵 苏轼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豪，苏洵、苏轼父子的《太玄》学影响很大。苏洵对《太玄》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著有《太玄论》三篇、《太玄总例》一卷，收录入《嘉祐集》中。苏轼对《太玄》虽没有专论性文章和著作，但也发表过具有重要影响的言论。

一、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易

元丰七年（1084），扬雄被宋廷晋封为伯，从祀孔子^①，历史地位达到鼎峰。也正在此时，扬雄及其《太玄》受到强烈批判，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最终由盛入衰。王安石是提升扬雄地位的主导者，而苏洵、苏轼父子则是批判扬雄，使其地位转衰的重要学者^②。

苏洵认为扬雄“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其言而为书”，与“圣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参”者大不相同。其《太玄》更是“雄之所以自附于夫

子，而无得于心者也”。经过分析考察，苏洵得出扬雄《太玄》“为道不足取”、“为数不足考”，有“求《易》之过”^③。苏洵的重要观点是：“盖雄者好奇而务深，故辞多夸大，而可观者鲜。”他还进一步作《太玄总例》，“凡雄之法与夫先儒之论，其可取者皆在”，而“《总例》之外无观焉”^④。

苏轼在苏洵考论的基础上，对《太玄》作出了“以艰深文浅易”的著名论断。他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⑤

程颐说：“扬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⑥苏洵、苏轼之论与程颐之说相呼应，共同批评扬雄不知儒家大道。至南宋时，朱熹继承程氏之论，著《资治通鉴纲目》，大书“莽大夫扬雄死”，而“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⑦。

二、批评《太玄》历数有偏差

苏洵认为《太玄》极九九之数而成八十一首，与《周易》极八八之数而为六十四卦相似，合乎圣人自然之道而无所增损。但他对《太玄》于八十一首之末增加《踦》、《羸》两赞则大为不满。八十一

^① 脱脱等《宋史》卷 16《神宗纪三》，第 312 页。

^② 按：葛立方《韵语阳秋》（丛书集成初编本）卷 8 称王安石极赞许扬雄，而“东坡谓雄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与公矛盾矣”，是苏洵、苏轼或有与王安石立异的成份。

^③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 7《太玄论》，第 171、180 页。

^④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 7《太玄总例》，第 184 页。

^⑤ 苏轼《苏轼文集》卷 49《与谢民师推官书》，第 1418 页。

^⑥ 程颐、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25，《二程集》第 325 页。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91《法言集注提要》。

首，一首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两赞当一日，得 $364\frac{1}{2}$ 日，与 $365\frac{1}{4}$ 日还相差了 $\frac{3}{4}$ 日。苏洵推寻增加《踦》、

《羸》的用意，以为扬雄在于合历数、置闰余。不过，苏洵认为扬雄如此安置是“强为之辞”，与《玄莹》“不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之意不相吻合。苏洵说：“今也，重不足于历，而轻以其书加焉，是不为《太玄》也，为《太初历》也。圣人之所略，扬雄之所详，圣人之所重，扬雄之所忽，是其为道不足取也。”^①扬雄《太玄》重数而轻道，与圣人之意不合，成为苏洵批判《太玄》的重要依据之一。

苏洵更用意于批评《太玄》历数之差。他认为扬雄《太玄》以七百三十一赞以合一年之 $365\frac{1}{4}$ 日，“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多增加了 $\frac{1}{4}$ 日。如此一来，历数之差，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他说：“历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载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岁而加一日也。率四岁而加之，千载之后，吾恐大冬之为大夏也。”^②历数之差，有冬而为夏之误，自然不可忽视。

此外，《太玄》配首赞以星次。苏洵认为增加《踦》与《羸》两赞后，其星次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同时，《太玄》不书月，也不合于历法。《玄告》称：“《玄》日书、斗书，而月不书。”《太玄》只将七百三十一赞与日躔宿度、北斗所指方位会合在一起，却不与月行情况相结合。苏洵认为此法与历法不合。他说：“苟月而不书，则夫历法之可见于《玄》者，止于一期。而此五尽也，雄之所强存而已。”^③也就是说，《太玄》不书月，则其历法可见者只有一年的周期，与历法推算一元之期，找出上元“章、会、统、元与月蚀俱没”的历法起点就不可能了。

《玄图》却又有此历法之陈述，是《太玄》本身不合于历法，而扬雄强存其辞于《玄图》之中。

为改变《太玄》加《踦》、《羸》之不当，苏洵依据汉儒卦气说，将《太玄》的首赞日数加以改变。按卦气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代表二十四节气，以其余六十卦平分一年 $365\frac{1}{4}$ 日，故一卦得六日七分，即 $\frac{7}{60}$ 。苏洵以为《太玄》拟《易》，也当以

此法为之，无须增加《踦》、《羸》两赞。他以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合一年 $365\frac{1}{4}$ 日，一首得 $\frac{1}{4}$ 又 $\frac{1}{108}$ 日，即在扬雄两赞为一日，一首 $\frac{1}{4}$ 日外，又增加了 $\frac{1}{108}$ 日。苏洵由此说：“加分而其数定，去《踦》、《羸》而其道胜，吾无憾焉耳。”^④

苏洵批判《太玄》于历数、星度不合，而依据汉儒卦气说来改造《太玄》，其法确乎很妙。不过，他将汉儒卦气说当作《周易》本身所有，则未免有误。至于他欲去《踦》、《羸》而加分数于首赞，大有改造《太玄》之原文，未免变乱之嫌。而诸儒均以《踦》代表半日，《羸》代表四分之一日，并不以《羸》亦代表半日，甚至以《踦》、《羸》拟《易》之《乾》、《坤》用九、用六，故不取苏洵之论。

三、批评《太玄》蓍法、占法之陋

对于《太玄》蓍法，苏洵批评扬雄既说“三六”，又说“二九”、“倍天之数”、“地虚三以劫天三”，此“皆求《易》之过”^⑤。

苏洵认为“《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谬，意传之失也”，故质疑王涯所言的《太玄》筮法。他说：“王涯之说，一劫之后而三三数之，三七之余而一一数之，及八以为二，及九以为三。不及八，不及九，从三三之数而以三七为一，是苟以牵合乎一劫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须挂一劫三而后成，而劫终不可以三也。”^⑥王涯以三策一组，数一劫之后的蓍草，除去三乘七之二十一策之后，策数便在十及十以下了，得八为二，得九为三，不为八和九，则为十，即三加七，此即为一。苏洵认为其中的八数需要有“挂一”（即“别一”）和“劫三”。如果中分后的两份均搜之以三，则左余一，右必一；左余二，右必为三；左余三，右必二，不可能有“劫三”的出现。因此苏洵认为王涯“是苟以牵合乎一劫之言”，而八数无法通过其揲法得出。其实，苏洵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将《周易》中的“再劫而后挂”移植到了王涯的《太玄》筮法中，认为《太玄》“一劫”当为“再劫”，而王涯的一劫指两份都要经过“搜三”，故凿枘而不通。实质上，王涯所言，

^①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论上》，第171页

^②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论上》，第171页。

^③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总例·历法》，第195页。

^④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论中》，第177页。

^⑤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论下》，第180页。

^⑥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总例·揲法》，第193页。

“搜三”只针对“中分”后的其中一份而言。黄宗羲赞同苏洵之论，也认为王涯有失，对苏洵之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左右一揲之余，其挂扱之数不三即六。三者得三十策，三七之余为九。六者得二十七策，三七之余为六。更无得二十九策可以为八也。然王氏虽谬，不以余策而论，犹为未失其传也。”^①朱熹说：“老苏尝非《太玄》之数，亦说得是。”^②

对于《太玄》占法，苏洵亦不满意。他认为卜筮本应当是不可逆知之事，而《太玄》的占筮却与占筮的时间关系紧密。以旦筮占，“不为大体，则为大咎”，而以日中、夜中、夕筮占，则“大体大咎终不可得而遇”^③。苏洵的主张是，《太玄》的筮占不考虑其数，只用其辞就能避免可以逆知之误。

四、概括《太玄》之例

苏洵其实对《太玄》还有一定的赞许之意。他改造《太玄》以归于“无罪”，又作《太玄总例》以释其例而详其意，就是最好的说明。

唐王涯著《说玄》五篇，借鉴王弼《周易略例》，立明宗、立例、揲法、占法、辩首五例，颇有发明《玄》例之功。王应麟说：“前世多诋《太玄》，自王涯著《说》，发明渊奥，其学遂盛。”^④南宋张演则说：“唐王涯五论，颇为《玄》学所宗，然特明其事例之可言者与揲蓍之法而已，不足以尽《玄》也。”^⑤苏洵著《太玄总例》进一步发挥王涯立例之法，分四位、九策、八十一首、揲法、占法、推玄算、求表之策、历法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对《太玄》之例作了总结，成为通晓《太玄》学的重要桥梁之一，功不可没。刘韶军先生说，苏洵《太玄总例》“是对《太玄》一书的总体评价及相关体例的说明”^⑥。

苏洵、苏轼的《太玄》论引起后世的广泛关注。林希逸说：“博书著文千载，而上有若扬子云者，

吾当敛衽矣；读书摘疑千载，而下有若苏老泉者，子云当敛衽矣。”^⑦韩滉也说：“老苏论《太玄》，最中其病。”^⑧陈藻则称：“《太玄》之书，当时后世有非之者，亦有好之者。诸家训释，岂无可观，而老苏之论二篇，与夫所谓《总例》者，吾特爱焉。”^⑨他肯定了苏洵有关蓍法、占法的论辩，但不赞同其历数之论，以为《太玄》增《踦》、《羸》两策似《易》之用九、九六，《羸》止为四分之一日，《太玄》书日则月在其中。李如篪虽认为苏洵批驳《太玄》历数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又认为苏氏“不知自有黄道之运”^⑩。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孙开中）



把酒问青天（刘怀东篆刻）

^①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4。

^②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7。

^③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7《太玄论下》，第180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36。

^⑤ 张演《太玄索隐序》，解缙等《永乐大典》卷4936，第8276页。

^⑥ 刘韶军《〈太玄〉版本考述》，董恩林主编《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

^⑦ 林希逸《竹溪齋十一稿续集》卷8《太玄》。

^⑧ 韩滉《涧泉日记》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陈藻《乐轩集》卷6《太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

任永辉

内容提要：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不仅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其艺术成就也较高，为其接受前代散文家的写作经验，发挥个人天才，树其文风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苏轼 凤翔 散文创作

凤翔，是苏轼踏上漫长而坎坷仕途的第一站。苏轼在凤翔任职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里拟就其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略作论述。

—

苏轼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宋之文莫盛于苏氏”（宋濂《文原》）之称，其散文文学成就集中于论、策、赋、记、书、题跋、札记中。苏轼在凤翔的散文创作，就题材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亭台楼记、政议奏启、青词祝文、书札题跋四类，计30余篇，其中以“三记”及《思治论》成就最高。

（一）亭台楼记

以《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驿记》最为著名，被收入《古文观止》，《喜雨亭记》还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外阅读》（第二册）中。

苏轼在凤翔任上，自然灾害一直比较严重，上任之初，时值关中大旱，数月不雨，“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各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代宋选奏启封太白山神状》）。嘉祐七年，苏轼在凤翔府公堂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以作为休憩之所。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到了三月才开始下小雨，最初雨小，“民以为未足”，接着就下了三天大雨，于是“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喜雨亭记》），为庆贺天雨，他将亭子起名为“喜雨亭”，“亭以雨名，志喜也”，并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

嘉祐八年（1063），凤翔府太守陈希亮“于后圃筑凌虚台以望南山，属公为记”，（《苏轼总案》卷四）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凌虚台记》。苏轼借给“凌虚台”作记，说明“废兴成毁”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苏轼曾两次到凤翔府的“凤鸣驿馆”，一次是赴京赶考时途经，一次是作为凤翔府的地方官前去拜会一位客人，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凤鸣驿记》，叙驿舍之修治，赞美一位不计个人升沉得失，安于职守，乐于一些琐细的为人民造福的好官吏（时任凤翔太守宋选）。

（二）政论奏议

苏轼在凤翔任上，关心民疾，体察民情，一上任，就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讲到：“编木伐竹，东下渭河；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发之防，贩物有不益蜀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之后，又针对改革衙前之役、以官榷与民、免除积欠等多次上书，写下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欠书》等著名的奏议文章。

凤翔时期苏轼所著政论文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作于嘉祐八年（1063）的《思治论》。《思治论》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在《进策》中所提出的革新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今世有三患，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革新治理的措施，最后得出要富国振邦，就必须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结论。

（三）青词祝文

苏轼任职凤翔期间，关中大旱，数月不雨，苏轼多次祈天祷雨：“兹用即于斋宫为坛位，以与百姓请命。”（《凤翔醮土火星青词》）这类文章主要有《祷雨蟠溪祝文》、《告封太白山明应公祝文》、《代宋选奏启封太白山神状》、《凤翔醮土火星青词》、《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祭勾芒神祝文》、《祷泷水祝文》等。

（四）书札题跋

苏轼在凤翔期间还写了不少的书札题跋，如《题凤翔东院王画壁》、《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与杨济甫十首》、《记西邸诗》、《书太宗皇帝急就章》、《书所作字后》、《记子美逸诗》、《李西平画赞》等，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如《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所作字后》指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及为得之。”

二

综观苏轼在凤翔的散文创作，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在凤翔活动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可以看出他此时此地的心理状况，亦能窥见其散文创作的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

苏轼签判凤翔时期散文创作的思想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指陈政弊、申言革新的改革精神

苏轼科举得志，成为其以身许国的开始。面对赵宋王朝立国以来的严重流弊以及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他指陈政弊，申言革新。

他在嘉祐八年（1063）写的《思治论》中，严肃指出：“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不知其所以不成就，罪在于不立也。今立而成矣。”然后明确提出当今之世的“三患”：“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赵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并提出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二是反对“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他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出了革新弊政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尊奉的是始终如一的强兵、丰财、择吏的治国之道。

苏轼不仅从国家大局出发积极要求改革，而且在其任上勇于实践，兴利除弊。

一是改革“衙前之役”。“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代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并要包赔损失。这一带每年要砍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运到京城，“衙前之役”每年使得很多服役之人倾家荡产。他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说：“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指出衙前之役“荡民产业，忽如春冰”，自己深感“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后来他“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从此“衙前之害减半”。（《宋史本传·苏轼》）

二是主张“以官榷与民”。宋朝建立后制定了商税条例，对人民生活中的一些必需品如茶、盐、酒、矾，实行官卖，又叫官榷。苏轼早在《进策》中就反对“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反对“天下之利，（朝廷）莫不尽取”。在签判凤翔时，他明确主张把官榷“尽以予民”，并指出“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

虑也。”（《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可见苏轼仍在主张改革。

三是主张免除积欠。当时凤翔府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欠官府的债务而被关押，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掌管理欠，经常鞭笞小民，却只能收回很少一点积欠。他说：“彼实侵盜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挞无愧，然其间有甚觉悲者。”（《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因此，苏轼上书主管部门，要求“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以便这些欠债之人“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改革“衙前之役”、“以官榷与民”、免除积欠等主张和建议，无不反映出苏轼在实践中积极改革的精神。

（二）关心民生、同情黎民的民本思想

北宋仁宗嘉祐年间，凤翔府地区民贫役重，生产凋敝，苏轼到任之后，经常深入属县，了解民情，访询疾苦，为民祈雨，浚修水利，体现出“民为贵”的儒家民本思想。

嘉祐七年（1062）初，苏轼在府廨修葺园亭，适值连雨三日，解除大旱，于是他以“喜雨”名其亭，并写成散文《喜雨亭记》，表达他与农民忧乐与共的感情。“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就因为作者时时刻刻想到“民”，才会把一篇看似无趣的文字写得生机盎然，千古流传。如果没有济世安民的思想，无论才思多么敏捷，眼光多么远大，也难以想象出万民春旱盼雨的焦急心情，苏轼将个人的喜忧与农民的喜忧联系起来，忧民之忧，喜民之喜，忧喜系与民生。

清道光年间凤翔知府白维清在《重修东湖碑记》中记载：“距郡城而东有湖焉，固凤凰泉注水之瀦也。宋嘉祐中，苏文忠公以一代伟人，签判是郡。公余巾杖来观，相度地形，以斯湖可浚而成也。引泉水由西北折而之东，延袤数十里，注之于湖。水多则蓄之，以防涨溢；干旱则泄之，以润田畴。湖成而民利普焉。”苏轼本人亦曾有《东湖》一诗记之，从其诗中可以看出，东湖在当时已初具规模，既为休憩园林，又可灌溉农田。“湖似郎官好，名因学士传。”（王士禛《东湖》），苏轼离开凤翔虽已近千年，但在凤翔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与东湖同在，东湖成了凤翔人民缅怀这位“良吏”的最好去处。

三

苏轼在凤翔的散文创作不仅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其艺术成就也是比较高的。他的散文纵横捭

阖，舒卷自如，才情横溢，确实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综观他在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我们明显感到以下一些艺术特色较为突出：

（一）议论风生

苏轼善于把一些平常的题材内容加以引申，触物兴感，借题发挥，使其散文意味更加深长。如《凌虚台记》，本是太守陈希亮筑一亭台，请苏轼记文以给后人留念，殊不知苏轼有他自己的想法：“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苏轼的这通议论，显然是对陈希亮的讽刺，不管多大的官，多高的职务，只有竭力为国效力，为民操劳，政绩卓著，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否则将被历史遗弃。

《凤鸣驿记》从“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入手，从百姓的“安乐”想到“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最后发出议论：“夫修佳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则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从叙驿舍之修治，赞美不计个人得失、安于职守的凤翔太守宋选。

《思治论》是苏轼议论事实较有特色的一篇文章，作者抓住时弊，围绕中心，逐次深入，结构严密，层次分明，论理透彻，时而用典，时而引喻，时而旁征博引，时而细思慢析，堪称苏轼论说文中的佳作。

（二）随物赋形

苏轼《文说》自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的观点是，作文应因意生文，以文传意，像行云流水那样随物赋形，出于自然，富于变化。他在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确实体现了这一点。一是树立与主题有关的对立面，边破边立，层层深入，如《喜雨亭记》，以不雨之忧反衬雨之可喜，以功之无所归见名亭之得宜。二是用对照、对比的方法安排记叙，如《凤鸣驿记》以两次亲自所见对照，引起对宋选为人的注意。三是运用抒情笔调，使散文情景交融，意味深长。如《喜雨亭记》整篇记叙轻松婉转，使人感到雨露滋润的喜悦。四是善于使用设问等手法来行文说理，如《喜雨亭记》设为与客相问答，从反面证明雨之可喜；《凤翔酬土火星青词》、《祷雨蟠溪祝文》设为神人问答，表明了其关心民生、体察民疾之情。

其他如《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

欠书》、《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等，尽管是奏启祝文，但都能无遗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或寄希望于明公大臣，或建议朝廷改革弊政，或祈求上苍降雨救民，有声有色，如云经天，如水行地，堪称妙哉！

（三）语畅辞达

苏轼散文在语言上的成就较高，他善于大笔勾勒，语言有很高的概括性，往往只用简单几笔，就把事物的面目表现出来了。如《凤鸣驿记》叙太守的政绩，只“视其兀臬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梳理之”两句；《思治论》中将天下之病概括为“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其次，他的语言十分形象、生动，如《凌虚台记》中“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发髻也”，“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描写筑台前后看山的两种不同感觉。此外，他还善于运用排比句式，如用“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三例来证明以喜雨名亭是名正言顺，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本文从题材内容、思想特征及艺术成就方面，对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做了一些简要的论述。学术界每论及其散文创作，多推杭州、密州、徐州、黄州等时期，对其早期散文创作论述不多。苏轼是唐宋古文运动中一个带总结性的人物，其早期散文创作是他接受前代散文家的写作经验，发挥个人天才，树其文风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参考文献：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任永辉《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语文学刊》2005年第11期。

任永辉、熊裕民《论苏轼凤翔时期的政治思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责任编辑：刘清泉）

苏轼与六位梦得的交谊

周云容

内容提要：苏轼一生交游广泛。苏轼在世时，与其有直接交往或书简往来的梦得至少有六人：马梦得、张梦得、赵梦得、范梦得、高梦得、吕梦得。本文试图通过苏轼与这几位梦得的交游，向读者展示苏轼与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可从中领略苏轼追随者的仰慕之情。

关键词：苏轼 梦得 交谊

苏轼作为一代伟人，为“一世所尊尚”，门庭阔大，门生、友人及其追随者不计其数。苏轼待人犹如赤子，诚挚天真，交游广泛，相投便为朋友，亦不分高低贵贱，乃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提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苏轼在世时，至少有八位同字“梦得”的人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①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此八位“梦得”中，与苏轼有直接交往或书简往来的至少就有六人。在这六人中，有甘贫守志者，有萍水相逢者，也有官居显位者。本文试图通过苏轼与这几位梦得的交游，向读者展示苏轼与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可从中领略苏轼追随者的仰慕之情。

一、清苦有气节的马梦得

马梦得即马正卿。马正卿，字梦得（古人字“梦得”，一般取“母亲在怀孕前曾梦中得到儿子”之意），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与苏轼同年同月生，小苏轼八日。苏轼与马梦得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嘉祐五年（1060）。嘉祐五年，苏轼服母丧期满，回到汴京，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未赴任，寓居怀远驿习制科。怀远驿在汴京丽景门河南岸，是都城四馆驿之一。这时候的马梦得在太学担任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②苏洵此时寓居雍丘。雍丘属京畿之地，在京东八十七里。苏轼可能在看望父亲之际，去拜访马梦得，梦得正好外出。苏轼一时兴起，在马梦得书斋的墙壁上挥毫书写了一首杜子美的《秋雨叹》。杜甫的《秋雨叹》共有三首，苏轼文中没有说明他书的是其中的哪一首。但从内容看，苏轼所书的应是这首：“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

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③杜甫作此诗，是针对现实的：因秋雨而起，百草烂死，惟决明（一种草药，可明目）著叶满枝，花开无数，但因秋雨恐难独存。堂上书生白头空老，面对秋风再三闻到决明的芳香不禁感伤哭泣。此诗杜甫假物寓意，叹自己老大无成。书者无意，看者有心。性情耿直的马梦得看到墙上的题诗，读到“堂上书生空白头”一句，心中颇有感慨，“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④苏轼在晚年时作的《马正卿守节》一文对此事作了记载。

嘉祐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判官。十一月赴任，马梦得与之同行。此后马梦得一直追随苏轼，辗转长达二十余年。

元丰二年（1079）三月，御史李定、舒亶等摘《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和以前苏轼所作诗词，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经多方营救，十二月结案，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初到黄州，俸禄减少，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是“日以困匮”。元丰三年（1080），苏轼在与秦观简中叙及自己节俭的生活：“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⑤马梦得目睹“先生穷到骨”的生活，很是心酸，于是向黄州太守徐君猷请求将城东的数十亩废弃营地拨给苏轼耕种。苏轼得以躬耕其中，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苏轼自此自号东坡居士。此后“苏东坡”的名号响彻寰宇。人们一旦提起苏东坡“躬耕东坡”的经历，必然也会提及是好友马梦得为其请得东坡一事。

在诸友的协助下，苏轼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元丰四年（1081）躬耕的东坡终于有所收获。苏轼十分高兴，为答谢诸友，作了著名的《东坡八首》。其中第八首就是专颂马梦得的高贵品格的：“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茲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⑥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马梦得对苏轼极为仰慕。元丰四年十二月，苏轼与马梦得饮酒于

东禅庄院，醉后，吟诵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诗。孟郊此人也是一生穷愁潦倒，当苏轼与马梦得诵到“我亦不笑原宪贫”一句时，不觉哑然失笑。原宪，孔子的弟子，家境十分贫穷。“东野何缘笑得原宪”，“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⑦于是苏轼作小品文《书孟东野诗》以赠马梦得，借以赞颂梦得之清贫气节。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离黄赴汝。可能亦在此时，马梦得辞别子瞻回雍丘归老了。在元祐年间，苏轼往来于京官与地方官任上，马梦得也往来于京师、雍丘之间。苏轼、米芾、马梦得的交往颇为密切。苏轼在与米芾第六、七简中都叙及与米芾、马梦得的交往。苏轼亲切地称马梦得为“马髯”，可见其亲密关系。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过雍丘，苏轼作《初贬英州过杞赠马梦得》以别马氏。苏轼与马氏梦得文字联系记载止于此。

苏轼与马梦得相交甚久，前后长达三十余年，马梦得可谓是苏轼忠实的追随者。而且苏轼也认为他与马梦得都是同病相怜的苦命人：“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⑧他们的感情笃厚，至死不渝，难能可贵。

二、佳士张梦得

张梦得即张怀民，字梦得，又字偓佺，清河（今河北清河）人。苏轼与张梦得的交往应在元丰六年前后。据《苏诗总案》载：“据公夜访承天院及子由为作快哉亭记，皆元丰六年癸丑冬后事，盖梦得以是年谪黄也。”⑨此时，张梦得亦贬谪黄州，初寓居承天寺。虽是萍水相逢，但同是贬谪之人，相同的处境，苏轼与张梦得一见如故，交情甚笃。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苏轼“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于是两人“相与步于中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慨：“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⑩苏轼将此事记载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这篇散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小品文佳作。在这“月色入户”，让人毫无睡意的深夜，苏轼友人众多，他为何独“寻怀民”，从中可以看出苏轼与张梦得之间的亲密无间。

张梦得曾将其珍藏的二枚墨赠予苏轼，其阳云：“清烟煤法墨”，其阴云“道卿既黑而光”，此二墨“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⑪苏轼视若珍宝，作《书怀民所遗墨》以谢之。

张梦得曾在其庐之西南建亭一座，苏轼借古先

贤善养浩然之气，能享快哉之风之意，将其亭命名为“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相赠。在词中借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之语句赞颂快哉亭那种朦胧如同山水画一样的美丽景色，而且将快哉亭比作“壮丽为淮南第一”的平山堂。平山堂，位于江苏扬州，是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词中特别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一句成为常诵不衰的名句。快哉亭及其词名扬后世！苏辙也为张梦得的快哉亭作有《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苏轼还书写旧作《昆阳城赋》以赠张梦得。张梦得曾拿出所珍藏的北宋初山水画家郭忠恕的《楼居仙图》，请苏轼鉴赏，苏轼作《郭忠恕画赞》，赞其画为：“长松换天，苍壁插水，凭栏飞观，缥缈谁子。空蒙寂历，烟雨灭没。”⑫

苏轼在《赌书字》中记载与张梦得间的一件趣事：“张梦得与张昌言围棋，赌仆书字一纸。胜者得此，负者出钱五百足，作饭会以饭仆”。并且还起誓道：“社鬼听之，若不赛者，俾坠其师，无克复国。”⑬这足可看出苏轼与张梦得的亲密关系。

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八日，苏轼饮于张梦得小阁，终岁怀旧，作《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张怀民小阁》词相赠，词中既希张梦得“闲驾彩鸾归去，趁新年”，又望张梦得莫忘“他时一醉画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边”⑭的故旧深情。

苏轼与张梦得萍水相逢，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可谓是苏轼的密友。苏轼对张梦得极其欣赏，在与友人滕达道的书简中曾有“张梦得尝见之，佳士！佳士！”⑮之评价。

三、南海义士赵梦得

赵梦得，儋州（一说广西）人，宋绍圣元符年间寓居海南澄迈。苏轼称赵梦得为赵先辈。先辈，是对文人的敬称（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唐宋官长称秀才曰先辈”）。赵梦得仕履待考。

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惠州。绍圣四年四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六月下旬，苏轼泊舟登岛后在澄迈作短暂逗留时，与赵氏梦得结识。对此，南宋周必大（1126-1204）的《二老堂诗话·记赵梦得事》有详细记载：“广西有赵梦得，处于海上，东坡谪儋耳时，为致中州家问。坡尝题其澄迈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录陶渊明、杜子美诗，及旧作数十纸与之。梦得以绫绢求，东坡答云：‘币帛不为服章，而以书字，上帝所禁’。”⑯苏轼还曾“大书姓字”以赠赵梦得。苏轼也曾为赵梦得作《送人泛海北归兼寄

诸兄弟》诗。

周必大提及的赵梦得肯为苏轼“致中州家问”一事，在《苏轼文集》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元符二年（1100），赵梦得不远千里为苏轼送书简至许州与苏迨，还送至京师与苏轼侄孙苏元老。苏轼在《与侄孙元老》书简中讲道：“赵先辈，僕人，此中凡百可问而知也。乡里出百药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赵还时可附也。”^⑩周必大在《跋东坡与赵梦得帖》云：“南海上有义士，曰赵梦得，方苏文忠公谪居时，肯为致中州家问，其贤可知。”^⑪

苏轼曾给赵梦得书简，邀请赵梦得来共同品尝“旧藏龙焙”，并说：“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⑫可见，苏轼与赵梦得的友情之深，可谓相知！

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北归，六月路过澄迈，本欲再访老朋友，可适逢赵梦得远出未归，很遗憾，于是六月十三日写下《致梦得秘校》（也曰《渡海》）一文以示话别，盼望能在渡海后相见，“不尔，未知后会之期也”。苏轼叮嘱梦得“宜倍万自爱”，^⑬可谓是情真意切！

苏轼与赵梦得之间相识虽晚，但友情相当的真挚。在苏轼最艰难的时候，赵梦得不仅给了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据赵德麟《侯鲭录》载，赵梦得深知苏轼居琼处境，还顺便给子瞻捎带了一些书籍物品，其人之贤，其心之细，由此可知一斑。赵梦得对贬谪海南的苏轼关怀备至，这份友情足以让苏轼感怀。

四、经筵讲官第一的范梦得

范梦得，即范祖禹（1041-1098），字纯父（一曰纯夫、淳甫、淳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是范锴长子、范百禄长兄范百祉的儿子，范镇的侄孙。少孤，由范镇抚养长大。嘉祐八年（1063）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开始，跟随司马光先后在汴梁和洛阳修《资治通鉴》，长达十五年。元丰七年（1080）十二月，《资治通鉴》修成，范梦得由奉议郎除为秘书正字。元祐更化期间，得到朝廷重用，历官著作郎兼侍讲，右谏议大夫兼修神宗实录检讨官，给事中，礼部侍郎，翰林侍讲学士兼知国史院。元祐七年（1092）为翰林学士。绍圣年间，范梦得以“所修《实录》诋斥先帝，又附会司马光变更熙、丰法及妄论乳媪，离间两宫事”^⑭的罪名，一再遭贬。元符元年（1098）十月谪死于广州化州，年仅五十八岁。

苏轼与范梦得的交往应该较早，苏轼之父苏洵与范梦得的叔祖范镇在嘉祐年间同修《六家谥法》，并且往来就已频繁，关系亲密。按此推断，苏轼与范梦得的结识可能在嘉祐年间。但苏轼与范梦得往来书简中看，最早一封书信作于熙宁五年（1072），

时苏轼倅杭，简中叙及监试得闲，“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并“有诗数首寄之，以发一笑”。^⑮在元祐年间，苏轼往来于京城与地方官任上，其间苏轼与范梦得书信往来频繁，多达十余封。在书信中，苏轼一再叮嘱范梦得“千万以时自重”、“乍远，千万为道自爱”等，苏轼对范梦得的关爱可见一斑。苏轼与范梦得之间除唱酬诗词之外，往来书简共二十余封。苏轼与范梦得往来的最后两封书信作于苏轼贬谪惠州期间，书信一改以往悠闲快适，书信一开头就讲：“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金之良药”^⑯，而在简末叮嘱梦得“多难畏人，此诗慎勿示人也”^⑰，其亲密关系可想而知。

苏轼与范梦得不仅是文字之交，还有姻亲关系。苏轼家族与华阳范氏家族数代联姻，其家族关系渊源。最早在元丰二年（1079），范镇之孙、范百嘉之女许配给苏轼之子苏过。之后，又有苏轼之孙，苏迨之子苏箇曾娶范氏；苏轼孙女苏迈之女许配与范百禄之孙范潩，范梦得孙范仲芑是苏轼孙苏符的侄婿。

晁说之《晁氏客语》有则材料亦可见苏轼与范梦得之笃厚友谊：“纯夫元祐末与东坡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一疏上之。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复自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纯夫，旧行第十三也。”^⑱从“纯夫必戒之”一句可以看出范梦得经常善意规劝苏轼，唯恐他祸从口出。从材料中也可窥出苏轼对范梦得是相当的敬重。苏轼曾言：“公之文可以经世，皆不刊之说，如某但涉猎为文耳。”^⑲还说：“范淳夫讲书，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书三昧也。”^⑳而范梦得也称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

元符元年（1098），范梦得死于贬所化州，苏轼是悲痛欲绝。在此期间，苏轼不顾自己“飘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㉑的艰难处境，频繁地给范梦得的儿子范冲（字元长）书简，对范梦得的逝世表达了悲痛之情，也为自己未能亲往吊唁深深自责。苏轼在给范冲的第一封书简中这样讲：

“先公内翰，遽捐官舍，闻讣恸绝。天之丧予，一至于是，生意尽矣”。接着又说：“何辜于天，罹此祸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毁日深，奈何！奈何！某谪籍所拘，莫由往吊，永望长号，此怀难谕。”^㉒此外，苏轼在与多位友人的书简中都叙及对范梦得之逝的悲痛心情。在与友人苏伯固书简中说：“同贬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纯父及少游，当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㉓在与李方叔书简中也说，范祖禹、秦观“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㉔悲愤不能自抑。

从苏轼与范梦得的交游，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出他们之间的那种浓烈、庄重的深厚感情，这份感情中有乡情、有友情，也有割舍不下的姻亲之情。

除以上所述与苏轼往来密切的马梦得、张梦得、赵梦得、范梦得之外，与苏轼有文字联系的还有高梦得、吕梦得。

此高梦得的仕履已无法考证。苏轼与高梦得的文字联系，也仅系于苏轼贬谪黄州时与高梦得的一封书简。高梦得在苏轼贬谪黄州时，曾给苏轼来信。高梦得在信中对苏轼是极其赞誉。苏轼在《与高梦得一首》的回信中称：“开谕累幅，足见相属之厚。”在书简中苏轼向高梦得坦言了自己之艰难处境：

“新阙尤增咏叹，然柏舟之讽，何敢当此诸事，幸且慎默于事，既无补，益增嫉尔。”又说：“既忝相知，惟当教语其所不逮，反更称誉如此，是重不肖之罪也。”^①苏轼与高梦得的友谊也略见一斑。在段书伟、李之亮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苏轼全集》中还收录有另一封《与高梦得一首》书简，兹录如下：“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继见，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怅仰不可言。经宿，伏维台侯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②从此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苏轼与此高梦得的关系之不一般，否则在简中就不会有“游门下久矣”，“已别，怅仰不可言”之语。但在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三苏全书》中未见收录有此书简。此高梦得与苏轼在黄州时交往的那个高梦得是否为同一人，待考。

吕梦得，即吕倚。《苏轼诗集》“王注”引《潘子真诗话·补遗》中记载说：“吕倚梦得，维扬人。少有场屋声，善属对，喜收书画。蹭蹬不偶，老，始以恩补虔州瑞金簿，致仕，贫无以归。年八十余，惟有一女，嫁赣人，因居焉。”^③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遇赦北归过虔州时，在慈云寺，吕梦得拿出一轴古今书帖，请苏轼鉴赏。苏轼作诗《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一诗相赠。吕梦得与苏轼的文字联系也仅于此。

苏轼在世时，与其有间接之联系的“梦得”还有《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叶梦得出生时，苏轼其时已四十二岁，叶梦得的母舅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叶梦得没有机会与苏轼亲晤，他们之间也未见文字之联系。但叶梦得与苏轼的后人、友人及其追随者关系密切，“或与之交游酬唱，或为其实集作序，或在著述中引述称道”。^④《叶梦得与苏轼》的作者潘淑闲先生认为，叶梦得是在苏轼的名人光环照耀下成长的，苏轼是他的人生偶像。

至于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提及与苏轼同时代的有八位“梦得”，在此仅录七位，还有一位究竟是何人，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暂时无法考证，

孔凡礼先生所编著的《三苏年谱》也没提及，待考。

论文注释

^①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②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册第64页《马正卿守节》、第15册第64页《马正卿守节》、第12册第476页《答秦太虚（四）》、第8册第90页《东坡八首》、第13册第519页《书孟东野诗》、第15册第65页《马梦得穷》、第14册第592页《记承天寺游》、第14册第554页《书怀民所遗墨》、第15册第238页《郭忠恕画赞》、第15册第551页《赌书字》、第10册第344页《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张怀民小阁》、第12册第422页《与滕达道（二十九）》、第13册第309页《与侄孙元老（四）》、第13册第450页《与梦得书》、第13册第162-163页《与范梦得（一）》、第13册第396页《答范纯夫（十）》、第13册397页《答范纯夫（十一）》、第12册第401页《与范元长（十）》、第12册第398页《与范元长（一）》、第13册第207页《答苏伯固（四）》、第12册第524页《答李方叔（十七）》、第13册第213页《与高梦得一首》。

^③ 《秋雨叹（三首）》，张志烈主编《杜诗全集》，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⑤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2卷第2页。

^⑥ 转引自孔凡礼编著《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1页。

^⑦ 《跋东坡与赵梦得帖》、《晁氏客语》、《晁氏客语》，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9、181、182页。

^⑧ 、^⑨段书伟、李之亮等主编《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2页《与赵梦得一首》、第4242页《与高梦得一首》。

^⑩ 《名臣碑传琬琰集》，转引自吴雪涛、吴剑琴辑录《苏轼文游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

^⑪ 、^⑫潘淑闲著《叶梦得与苏轼》，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326页《师友谈记》、第194页。

^⑬ 《潘子真诗话·补遗》，转引自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49页。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责任编辑：孙开中）

匆匆五日 风韵长存

——论苏轼登州之任及其对登州风物的歌咏

曲树程 蔡玉臻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论述了苏轼登州之任的有关情节和政治作为，着重论述介绍了苏轼对登州风物的爱悦歌咏。

关键词：登州 风物 海市 球石 鲔鱼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议而不容于朝，自请外任。先任杭州通判，继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在湖州任上，被人指控写诗讽刺新法，突遭逮捕，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四年后平调汝州。在赴任途中到达泗州的时候，全家二十余口皆病，幼子遁儿病死，资用罄竭，饥寒交迫。于是上表请求离职居住常州。满以为从此能彻底退出险恶的官场，依靠常州的薄田安身度日，终老此生。可是不久又受命复职，出任登州知州。

原来这年三月，支持新法的宋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为相。新法推行期间被贬斥的人物重受重用，苏轼亦在其列。元丰八年六月苏轼知登州。这次复职，在苏轼坎坷曲折的人生旅途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标志。不过苏轼当时未意识到，故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抱多少希望。但是，对于登州这个“山海名邦”，他却表现了十分的向往。途中他写诗送友人穆珣去越州（绍兴）赴任，抒发自己的喜悦情怀：“蹲前俱是蓬莱守（越州、登州皆有蓬莱阁，故云），莫放高楼雪月闲。”八月底经过扬州石塔寺，与无择长老分别时，他在诗中更明白地表露隐逸登州的思想：“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任所蓬莱。在《登州谢两府启》中，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表示了对登州山川形胜的赞赏：

眷此东州，下临北徼，俗习齐鲁之厚，

迹皆秦汉之陈。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顾静乐之难名，笑妄庸之窃据。

总之，他对登州之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如果苏轼真能在此地安下身来，长期任职，不仅会免除他以后的一系列厄运，而且凭着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的经验、作风，一定会做出卓越的政绩，给登州父老带来一定的福利。可惜他到任仅仅五日，便接到还朝的调令，升任礼部郎中。

苏轼初到登州，“入境问农，首见父老”^①，深入地了解民情地情，回朝后一连向皇帝提出两项治理登州的建议。一是针对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的险要形势，建议加强海防，反对当时轻易抽调兵力差往别处屯驻的麻痹轻敌作法^②。二是鉴于登州及邻地登州近海偏僻、地瘠民贫的特殊情况，实行一律的榷盐政策，不独加重了百姓的贫苦，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害无益，因此提议“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③。这两项建议，无疑是积极的、利国利民的切实之议。特别是关于榷盐问题，他确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现行政策的修正。这个修议一直实行到清代。据清道光时重修《蓬莱县志》：“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④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这两份奏议，写在他已经离开登州，升迁还朝之后。这既反映出他一贯的关心国忧民瘼的政治品质，又表现了他对登州的特殊感情。登州父老没有亏待苏轼，以衷心的惋惜怀念之情报答了他。《登州府志》叙曰：“（苏轼）在郡虽未久，然士薰其化，民安其政，恨其去之速。”^⑤

登州之任，匆匆五日，苏轼不可能有更显著的建树。但是，他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登州的深

情厚爱，对登州名胜古迹山川风物的歌颂咏赞，却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丹崖耸峙的蓬莱阁，那阁下与天相际的大海，那蓬莱仙境海市蜃楼，以及海边的万斛珠玑，岛上的海珍饣鱼，……经过苏轼的歌咏而身价倍增，名声大著；而苏轼这些歌咏登州的作品，也成为祖国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具有永恒的欣赏价值。

苏轼接到还朝的调令没有立即动身。据他在登州写的著名题跋《书吴道子画后》所记的时间，他在登州至少住到十一月七日。这期间他几次登游蓬莱阁，“眷恋山海之胜，与同僚饮酒日宾楼上”^⑥，尽情欣赏蓬莱阁上的风光，兴之所至，挥笔作文，写下了别有情味的《蓬莱阁记所见》：

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
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
不一炊久，已至阁下。

大海的辽阔无边、水平如镜，海舶的飘逸迅速、自由无拘，不正是作者旷达的胸襟、豪放的情怀的形象写照吗？全文仅三十八字，堪称苏文中最为小巧别致的了。

苏轼离开登州之前，有幸看到了稀世奇观——海市，喜兴之余，写下了著名的七言古诗《登州海市》：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
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廩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
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
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
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诗人以兴奋的心情记叙了观看海市的全过程和感想。诗前有序云：

予闻登州海市旧（久）矣。父老云：尝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此诗。

序文说明他对登州海市的无限神往，和岁晚得见海市的神助之幸，苏轼对登州海市何以如此动情

呢？所谓海市，实际是海上的大气层中，由于光线的折射，将远方物象映现出来的幻景。这是一种复杂的光学现象，至今我们也难掌握它的出现规律。古人以为是蜃（海中大蛤）吐气而成，故又称蜃气、蜃市、蜃楼。与苏轼同时而稍早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登州海市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气。”这些记叙，为海市蜃楼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平时很少出现，不易见到，所以愈使它神奇诱人。苏轼来登州之前，已表示过对登州海市的向往想象。如他在徐州时写的题画诗《虔州八境图》八首其七：

云烟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
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之罘”即当时登州境内的之罘山（在今烟台市北芝罘岛）。诗人望着画中烟云缥缈的郁孤台，立即想象到登州海市，可以看出他对这世外仙境，是怎样的朝思暮盼，如今既来登州未见而去，怎能不深感遗憾？他接到调令而迟迟不去，恐怕也是怀着对海市出现的一线希望吧。在海市不易出现的季节，苏轼居然幸运地见到，这又怎能不使它欣喜若狂、挥笔抒怀呢？不过序中说他是得到了海神的祐助恩赐，却是故弄玄虚之谈，是有意把事物的偶然巧合加以神秘化罢了。

苏轼《登州海市》的手迹刻石，至今完好地保存在蓬莱阁卧碑亭内。此诗作为古今鉴赏的名篇，历代不乏注释赏析的文字。它的内容和艺术，勿庸赘叙。这里仅就近年来论及此诗时否认苏轼见到海市的问题，略抒管见。否认者唯一的根据，就是诗末注明的写作时间“元丰八年十月晦”，认为这个季节是不可能出现海市的，从而断定苏轼的诗，其实是虚构幻想的产物，或讽之为信笔画鬼。这实在是致命的问题。这样一来，不仅《海市》诗的艺术价值大为降低，而且对苏轼的人格也是一种贬抑。《海市》诗属于咏物写景记游之作，这类作品的写作，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作者笔下的所经、所见、所感，必须是真实的。苏轼游金山寺，咏百步洪，写有美堂暴雨，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景，实有其物的。我们很难设想，名重诗坛文坛的苏轼，没见海市却硬是说“明日见焉，乃作此诗”，并且在诗中大言不惭地声称“心知所见皆幻影”、“重楼翠阜出霜晓”。假如说诗人因为海市难见，为了表示自己时运不凡，本来没见却谎称见了，这种欺世

盗名的作法，不但违背起码的创作原则，也瞒不过当时登州父老，对后世读者来说更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自言正直”的一代名贤苏轼，岂能做出这等蠢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数日还朝后写给同乡诗友王庆源的信⑦。其中写道：

登州下临涨海，枕簟之下，天水相连，蓬莱三山，仿佛可见。春夏间常见海市，状如烟云，为楼观人物之象。数日前偶见之，有一诗录呈为笑也。史三儒长老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因见，乞道区区，《海市》诗可转呈也。

信中不但再次描绘了海市景象，而且特别说明是“数日前偶见之”，为此而写了《海市》一诗。原诗末题注“书呈全叔承议”。全叔即《书吴道子画后》中提到的史全叔。诗原是写给他的，数日后又抄寄王庆源，并请王转呈史三儒长老。可见其对此诗的爱赏。从这些实录和苏轼一贯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看，这诗决非虚拟戏作！如果说人们对十月出现海市不免有些疑点的话，那末对苏轼信中所说的“偶见之”，当是不会存疑的吧？当然，十月初冬，毕竟不是海市正常出现的季节。但是自然现象的反常性和特异性难道人们见得还少吗？近年来所闻夏季飞雪的事实，便是很好的例证。其实，早在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笔下，就已承认苏轼是见到了海市的，他在《海市赋》的序文中写道：

“东坡在登州，以岁晚得为奇，然霜晓雾后，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泥于春夏也。”这最后一句，分明是针对《海市诗》序文“父老云尝出于春夏”而言。当代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他在鉴赏苏轼此诗的时候，从季节的不同形成海市景象的差异着想，作了这样的解释：“原来海市常见于春夏，景象最美，到岁晚时出现的海市大为逊色，所看到的只有‘重楼翠阜’，所以只用一句来写，这正是写实”。⑧承认苏轼见到海市，肯定诗人是写实的，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这是《登州海市》诗的艺术价值的根基，是此诗传世九百年之久并将继续流传的生命保证。

蓬莱阁坐落的丹崖山北麓，下临大海，石壁巉绝，时有碎裂。碎石落入海中，受海浪冲淘，年深岁久，成弹丸之状，珠圆玉润，光洁璀璨，美丽可爱，俗称球石、卵石。因海岸宽广，积蓄丰厚，被誉为“万斛珠玑”，为蓬莱十大景观之一。苏轼嗜爱美石，在黄州时，经常到江边拾取，曾挑选“红

黄白色，其纹如人指上螺，光明可爱”者二百九十八枚，赠送给好友佛印禅师。⑨黄州江边的美石，以形状之奇、色泽纹理之美取胜，但不如登州球石天工磨制之圆润规则，这自然要引起苏轼特殊的喜爱。苏诗中咏赞登州球石的诗有两首，其一为《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数升，如芡实，可作枕。闻梅丈嗜石，故以遗其子子明学士，子明有诗，次韵》；其二为《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丈，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此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二诗写于苏轼还朝后又出任杭州知州时，诗题长达数十字，是以题代序。其一诗中将球石喻为零落的珊瑚、玭珠（珍珠），诗末“愿子聚为江夏枕，不劳挥扇自宁亲”。用江夏孝童黄香的故事，赞美球石枕的散热宁人之效。其二诗的前半写珠琲般的球石的形成过程：

蓬莱海上峰，玉立色不改。
孤根捍滔天，云骨有破碎。
阳侯杀廉角，阴火发光彩。
累累弹丸间，琐细成珠琲。

以“孤根”、“云骨”形容山崖之陡峭，以水神阳侯砍杀巨石棱角形容海浪的威力，以波涛的阴冷闪光“阴火”形容球石在水中的光彩，写得奇警动人。诗的后半用想象笔法抒写对球石的爱悦，和由它的产地来源而引起的对登州山海的眷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已成为古今读者游人吟诵欣赏的名句。

这里需要顺便释疑的一个问题是，苏轼二诗分明是咏赞登州蓬莱阁下的海边球石，为何诗题称“文登海上”、“文登蓬莱阁下”？原来文登作为县名，始于北齐，唐初于文登县地建置登州，治所在牟平县，唐神龙年间移迁蓬莱，此后文登作为登州的属县，但其名称却较登州为古。由于具有这种地理沿革关系，苏轼诗文中有时求其古雅，或灵活变换称呼，故将登州称作文登。事实上文登县无蓬莱阁，苏轼在登州仅二十几日，也未曾去过文登。

苏轼视登州球石为珍品而以赠友，他自己也珍藏了一批，不论居官何处，皆随身携带。元祐七年（1092）出知扬州，友人赠送他一绿一白两块美石，他浸置在一只来自高丽的大铜盆中，石根特用七年前从登州带来的球石围簇着，使其锦上添花，视为“希代之宝”。后来苏轼还朝，为此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僚友王晋卿得知苏轼藏有此物，要求借观，

实则想久借不还。苏轼不好拒绝，却又爱而不舍，终于想出一个推脱的办法，提出要王用所珍藏的唐代名画家韩干的一幅马画交换，结果使王知难而罢。苏轼为此事共写了三首诗。⑩由此也看出苏轼对登州球石是如何的珍爱了。元祐八年苏轼在定州，又作《北海十二石记》，文中深怀感情地忆赞登州美石：“登州下临大海……多美石，五彩斑斓，或作金色。”僧友吴子野从登州得到十二块“秀色粲然”的美石带往南方潮州，苏轼为其“取北海而置南海”故作此记。文中所咏美石，不一定是圆润的球石，但俱是登州海石之珍，令苏公倾心致爱。

登州蓬莱阁下的球石，近年来由于保护不善，加以游人众多，恣意拾取，已濒于绝迹，是很可惜的！值得欣慰的是，仙阁对面的长山岛月牙湾，至今聚有丰富的球石，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万斛珠玑”了。已故叶剑英元帅1979年游长山岛，曾作有《月牙湾》七绝一首咏之。⑪

知登州期间，苏轼还作有歌行体长诗《鮆鱼行》一首，对登州特产海珍鮆鱼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咏赞。鮆鱼俗称鲍鱼，属蚌蛤类，其壳坚厚，生于深海礁石上，不易捕获。其肉鲜食、干制皆可，味极鲜美，今与海参、对虾、嘉吉鱼，合称蓬莱四大海珍品，为高级宴席不可或缺。鮆鱼壳外表粗糙，而内里色彩光泽，是有名的眼科中药材石决明，又是贝雕工艺的最佳材料。早在东汉时期，鮆鱼即被作为贵重食用海味和馈赠进献的礼品。古代我国沿海之地，均有鮆鱼出产，而唯“登州所出，其味珍绝。”⑫苏轼在登州期间，曾特意将三百枚鮆鱼作为土特产寄赠在京卧病的僚友滕达道。⑬他自己也为有幸享受到这一口福而写了《鮆鱼行》一诗。

《鮆鱼行》七言三十六句，比《海市》诗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诗从王莽、曹操嗜食鮆鱼写起，以戏谑之笔，写二雄虽然嗜食，但今日自己却每食对之叹息，因为想起了有人贪吃疮痂以取其鮆鱼之味的恶心事。接着写因交通阻隔，致使鮆鱼昂贵，

“一枚何啻千金直”，从而招引倭人捕获贩进。诗中写有登州海中驼暮岛（又作鼍矶岛）捕获鮆鱼的惊险情景：

君不闻蓬莱阁下驼暮岛，八月边风备胡
獠，舶船跋浪鼋鼍震，长镵铲处崖谷倒。

这是说每年八月海风劲吹，防边备虏的季节，岛民乘船入海，用铁鍔铲取，其艰难用力之状，几乎要把岩礁震倒了。据说鮆鱼附着在深海石上，只

有潜入水中乘其不备方易剥捉，否则它紧踞石壁，铲取极难。诗以下大意是写登州鮆鱼鲜食之味美无比和干制后的药用价值，最后说自己将鮆鱼赠送友人，希望对方收纳食用。诗人以广博的知识，熟练的诗笔，信手写来，看似散漫无章，实则所写皆切扣诗题。与《海市》相比，略嫌用典繁深隐曲，稍欠明畅，但全诗歌颂赞赏登州鮆鱼的主题，是鲜明突出的。诗中描写铲取鮆鱼的情景，也极生动。

以上本文简要论述了苏轼登州之任的有关情节和政治作为，着重论述介绍了苏轼对登州风物的爱悦歌咏。明代文学家、“前七子”之一边贡，在他的一篇称颂苏轼《海市》诗的文章中，曾引用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句名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⑭是的，登州的山川风物是优秀美丽的。但是若没有苏轼和历代名贤雅士墨客骚人的赏识爱悦和咏赞，它的优秀美丽便难以充分展现出来，便不会像现在的闻名天下，吸引着四方游客。苏轼对登州的这一文化贡献，在今天改革开放、旅游盛行的时代，尤其值得称扬。苏轼离开登州时写的《留别登州举人》中有一句自谦意味的诗：“莫嫌五日匆匆守”。我们正好借用这句诗来表达登州人民对苏轼的爱戴和敬仰：一点不嫌。不仅不嫌，而且对他在这这么短暂的任期内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作为和文化贡献，给以高度的评价和永久的纪念。

论文注释：

①、②、③苏轼《登州谢上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

④、⑤清道光《蓬莱县志》卷五《食货志·盐法》、卷十一《宦迹》。

⑥《东坡志林》卷六。

⑦、⑨、⑩《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五十九、卷六十四《怪石供》、卷五十一《尺牍·与滕达道》。

⑪《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⑫、⑬《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三十六、卷二十六《鮆鱼行》冯应榴注。

⑭1979年12月19日《烟台日报》。

⑮《蓬莱阁诗文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曲树程：山东省烟台教育学院教授，蔡玉臻：山东省蓬莱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刘清泉）

苏公祠考

臧伟腾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考证苏公祠建于何年，以《东坡苏公像记》中的“兵道”、“戊寅”为契机，结合官称和系年的有关文献，特别是清顺治和明泰昌《登州府志》中的《备倭城图》断定苏公祠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距今已371年。

关键词：苏公祠 兵道 戊寅 备倭城图

众所周知，位于蓬莱阁东侧三清殿后的苏公祠是为纪念北宋名臣、一代文豪苏轼治登而建的一幢古祠，在景区诸多的景物中，它独树一帜，以其特有的精神和文化魅力面对世人。凡登阁游览之人，必访苏公祠，人们在此或争相拍照留念，或屏神凝思，流连忘返，成为景区内一道靓丽的风景。

但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眼前的这座苏公祠历史并不长，它是清代同治年间登州知府豫山重修蓬莱阁时从阁前旧址上移建过来的，距今才一百三十多年，在此之前，蓬莱阁已有一个苏公祠（苏文忠祠）存在，位置在大阁前面偏西处，“以苏公旧祠狭隘也，北移到三清殿后”^①。那么此次重修前就早已存在的苏公祠，始建于何年，又是何人所建呢？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团，由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1995年版《蓬莱县志》特意在苏公祠条下注明：“祠原在蓬莱阁前，始建时间不详”。

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笔者从1994年起在参与《蓬莱县志》后期编纂工作及其后几年时间里，对前人的研究史料重新进行梳理，查阅了现存全部版本的《登州府志》和《蓬莱县志》并与有关方面专家反复论证，断定苏公祠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距今已371年。本文非敢自专，意在抛砖引玉，贡献一家之言，求诸方家教正。

一篇《东坡苏公像记》的启示

《东坡苏公像记》这是一篇专门记叙建造苏公祠有关内容的文章，作者张万宪。文章见于清道光《蓬莱县志》艺文志卷中。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查找所有资料，作者情况一片空白，这是其一；其二，文章主要内容是叙述苏公祠建成后为供人瞻仰，如何为苏轼绘图造像，其余内容则只是点到为止，使人读后只知其表，难寻其源。但正是这篇唯一见到的文章使我们豁然开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首先，文中点明，此前蓬莱阁上没有苏公祠，人们凭吊之余“止付一欣慕而已，曾未有议创祠像而祀之者”。其次“兵道周公”是建苏公祠的首倡者，并且是他捐俸建之，而受命负责筹划管理并组织施工者，正是作者本人。再次，建祠时间为“戊寅”秋，而工程“两月告峻”。

这里，“兵道”和“戊寅”两个词语至为关键。先说“兵道”，查史料得知，这是一个只在明、清两代才有的官称。明弘治年间始于各省军事要冲遍置整饬兵备之“道员”，称为兵备道。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此官由按察副使或按察佥事充任，是分巡道的一种，清代沿置^②。又光绪《登州府志》记，登莱本分巡道，弘治十二年改为兵备道驻莱州，明嘉靖三十四年兼海防副使陶大年始即在登州南门内丰仓旧址建公署以备巡历，四十一年（1562）专设海防道于登州^③，据此可知张万宪文中的兵道实即为海防道。

再说“戊寅”。这是古代干支纪年的一种表示形式。张文记，苏公祠建于戊寅年，查明清两朝共有戊寅年九个之多，除去光绪四年^④，尚有八个戊寅。这其中明代五个，清代三个。此时刻于1660年的清顺治《登州府志》帮了大忙，这部志书中的《备倭城图》清清楚楚标明了苏公祠在蓬莱阁的建筑位置。由此可以断定，苏公祠建筑年代只能在此之前的某个“戊寅”而不是此后，又因为1660年前的第一个戊寅年为1638年，即明崇祯十一年，从而导致清代的三个“戊寅”都被排除在外，于是问题渐渐的明晰起来了。这样由“兵道”使我们把时间首先断定在明、清两代，而依据这幅《备倭城图》，我们又把清代完全排除掉，从而锁定在明代，而且时间不会晚于1638年。剩下的事情是如何用新的材料最终确定明代的哪一个“戊寅”年了。

两幅《备倭城图》对照解谜团

两幅《备倭城图》，一是指上面谈到的清顺治《登州府志》中的《备倭城图》，一是指明泰昌《登州府志》中的《备倭城图》。

这里先简要谈一下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这是登州府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明泰昌年间登州知府徐应元纂修，刻于泰昌元年（1621），全书10

册 18 卷，约 35 万字。现仅见于河南省图书馆有藏残本（缺七、八卷），极其珍贵。今年夏天，为进一步收集和论证古登州有关史料，我专程赶赴郑州方才见到这套志书影印资料片（此书已为孤本，原本从不轻示于人）。是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突出地方特色，尤以蓬莱阁记述甚详。另外，该志书图极其详备，几乎一应俱全，计有《府总图》、

《府城图》、《府境图》、《备倭城图》、《海运图》等二十二幅之多，另有《海山景图》十三幅，确实使人大开眼界，而正是在这部志书的《备倭城图》中让我意外的发现，蓬莱阁前建筑物没有苏公祠（蓬莱阁旧在备倭城内，历代志书的《备倭城图》都将蓬莱阁内景物标点得一清二楚。而更深入下去，在全书中查找也没有发现有关苏公祠的任何文字记载。但苏轼祀名宦祠、三贤祠的史实都记录甚详。这与清代的所有版本《登州府志》完全不同，清代的《登州府志》中都有苏公祠的文字记载。

上面谈到，苏公祠建于明代已成定论，但建于明代何年我们却需要用新的史料来证明，而不能仅靠主观臆想来下结论，但现在情况变得进一步的明朗了，把这幅《备倭城图》和清顺治《登州府志》的《备倭城图》一对照。答案不言自明，苏公祠的建造时间应在 1621 年之后，1660 年之前。如果建于 1621 年之前，那么知府徐应元编纂的志书中不会疏漏到从图到文字都了无痕迹；如果是在 1660 年之后，清顺治《登州府志》不会无中生有提前写上。而在 1621 年至 1660 年之间，只有一个“戊寅”年，这就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公祠只能是建于这一年，而不是其它任何一年。

或问：此说是否过于武断了一些，还应有其它材料来支持这一结论吗？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事实上我已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力求从更多方面寻找新的资料和事实给以佐证。避免稍有不慎而造成违背史实的错误结论出现。这一努力并没有白费，张万宪文中的“兵道周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支持这一结论的成立，兵道者，官也，周公者，人也。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张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告诉我们这位姓周的兵道大人，在苏公祠建成后，不日即升迁而去，尽管没说清周公之名，也没告诉升任何职，但以兵道官职言，这个周公应在志书职官卷中有名可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之训，黄岗人，进士，海防道。……选将练兵，严毅有法，精理学，尤善地舆”^⑤。“周之训，黄岗人，进士，副使，（崇祯）九年任，陞参政”^⑥。遍查登州府自设海防道以来，除周之训之外，再无一个周姓之人任过此职，而其任职时间恰恰从崇祯九年到十一年，其接任者为任栋，任职时间始于崇祯十二年。如此看来，张文中的周公与这个周之训当属一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更加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结语

论证苏公祠建于何年，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似乎已并不重要，但事情的意义往往超出事情本身。回顾唐宋以来直至于清，蓬莱久为州府治所和海防重镇，在此任职的州郡长官和其他军政大员林林总总，至少当以千数计，这其中不乏多有建树，佼佼于世人者，不少人物也因卓有政绩，被历代供奉于当地名宦祠，生前或身后配享祭祀之礼，但是随着历史风雨的剥蚀，加之兵祸战乱，改朝换代，政息人亡，人去物非，许多人已渐渐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而苏轼则不然，他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方得一遇的天才，一生忧国忧民，历尽磨难不改其志，道德文章更是一代宗师，独领风骚，普天之下谁人不敬。登州任上“在郡未一月即内召，士民感化，深惜其去之速也，后立祠（三贤祠）祀之，并祀名宦祠”^⑦。而苏公一首《登州海市》诗，更留下千古之绝唱，使蓬莱山海增色，仙境誉满九州。蓬莱阁一方胜迹，本为神仙聚居之地，独苏公祠赫然其中，千年以下人世间至今享此殊荣的只有苏轼一人。大千世界，何为永恒？这正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古祠无言著青史，丹崖有幸留苏公。祠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创造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愿蓬莱阁永存，愿苏公祠永存。

作于癸未年夏

附录：

东坡苏公像记

张万宪

自苏公于岁晚获见海市也，人称奇观，其啸咏韵和镌石于斯者，脍炙绣口，不知凡几千百。

然凭吊之余，止付一欣慕而已，曾未有议创祠像而祀之者。迄戊寅秋八月既望，兵道周公以祀海登临，余亦从事左右，慨然捐俸，命余董建厥祠，一若苏公之灵，有以默启之者。故庀材鸠工，两月告竣，而独难其像，繇是玩其诗，译其文尚论其世，而遐想其形，凝思郁结者浃旬。忽假寐中一人，峨冠博带，拱余而言曰：“人之形骸尚属浮寄，况寄外之寄，何求逼真？吾之像仿佛可也，周公且不日有佳兆矣。”余既觉悟，告于周公，犹未之信。迨余绘梦所见状，授之匠研，工人之巧酷肖所梦，真耶？似耶？固不遑辨，而周公果已乔迁矣。余于是信畴昔之梦为苏公也。

由此观之，擅艺精者灵不昧，树业不朽者神必传。公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首倡盛举，慨然捐俸者，周公也；奉命董役恍然亲炙者，余也。孰知非周公也，亦非余也，总皆苏公灵爽有以默相而启之者也。余故摭述其始终。（下转第 43 页）

漫谈苏轼书法

杨江帆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苏轼“尚意”书风的形成和影响，并对“尚意”理论的美学意义进行了提炼。

关键词：苏轼 书法 尚意

苏轼的书法，名列宋四家之首，其代表作《黄州寒食帖》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他开创了有宋一代“尚意”书风，为宋代书法注入新的发展契机，影响中国书法千年。

一直想将对苏轼书法的认识行诸文字，以什么思路来写呢？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以一种法帖为支点，解析其美学思想和艺术特点；也可从其书风由姿媚到丰肥的变化探究其书风形成的历程；还可从苏字“左秀右枯”的笔法、“左低又高”的字法、“大小相间”的章法、“浓重丰肥”的墨法入手，从技法系统解析苏轼书法……

苏轼书法研究，说到底还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因此，还是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明变、求因和评判。由明变而厘清苏轼之前书法艺术的流变；由求因而找出“尚意”书风形成的历史必然；由评判而总结出苏轼书法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为今天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苏轼“尚意”书风的形成

盛唐是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高峰，在繁荣昌盛的时代背景下，中唐书法彻底摆脱了二王以来的模式，开创了截然不同的豪放浑厚的时代书风，代表人物是李北海和颜真卿。对于他们的变法，苏轼评价极高：“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到了晚唐和五代，由于国运衰落，人才凋敝，书法艺术逐步走向了衰落。但在衰落的大背景下，五代杨凝式仍能一变盛唐的豪放浑厚为细致精美，异峰突起，成为时代的高标，苏轼评及晚唐、五代书法时曾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

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汨没者。”苏轼早岁学二王，中年后主要取法李北海、颜鲁公和杨凝式，李、颜、杨对二王的取舍与变法，直接影响到了苏轼的书法，对其书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书法发展到北宋初年，更趋于僵化。淳化三年，宋太宗出密阁所藏历代书法，刻成《淳化阁帖》十卷，分发大臣，以后辗转翻刻，风行天下。

《淳化阁帖》选本一半以上为二王法书，其中掺有不少摹本和伪迹，再加上辗转翻刻，漫漶失真，以这样的法帖学书，书风容易僵化和媚弱。时人“趋时贵书”，凡想靠科举进身的人都得认认真真临摹学习，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加蔓延和助长了媚弱的书风，宋初书法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欧阳修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历史发展到此，需要不世出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苏轼的出现，改变了宋代书法的发展轨迹。

宋初书法积习成弊，如何解脱？宋代禅宗盛行，文人士大夫多与禅师关系密切，苏轼更是深谙禅理，慧海禅师曾这样阐述“解脱”：“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事事”（《大珠禅师语录》）。禅理显然影响到了苏轼的书法实践，苏轼在论及自己书法时说“吾书不甚佳，然自出己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有了这样的方向，苏轼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迥异古人的理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守烦推求”，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任何束缚。然而，从苏轼以及历代书法大师的学书经历来看，“意造”应该是指在深刻理解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的主观处理，自觉追求自我意识的表达。试将苏轼《黄州寒食帖》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比较，这三件行书手卷，都是抒情写意的代表作。《兰亭序》是应请为诗集作序，《祭侄稿》是为亡侄做祭文，两者都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典范，而《黄州寒食帖》则是将得意的诗作，书写成书法艺术的形式，纯为创作而作，始终存在着“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创作自觉，用经意的手段追求不经意的效果，用意造构想的方法去达

到天然的化境，这是其间最大的不同。

苏轼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在他的思想引导下，黄庭坚、米芾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紧紧追随，在创作实践中，反对唐楷的“大小一伦”和“字做正局”美学主张，开始有意识地夸张变形，点画不求平直匀称，强调提按顿挫的起伏变化，结体不求平稳工整，追求欹侧变化，后人称宋代书法“尚意”，从方法论上说，就是指这种主观意识处理下的变形，即“意造”。

二、苏轼“尚意”书风的影响

以苏轼为代表的书法革新运动，一开始还是受到了种种责难，但是，宋初的书法已到了靡弱不堪的地步，改革是时代的选择。“尚意”书风不久就得到社会承认，赢得普遍声誉。再加上受苏轼影响的黄庭坚、米芾等都是时代精英，“尚意”书风所向披靡，到了“天下翕然学苏、黄、米”（马宗霍《书林藻鉴》）的地步，在众多的学书者中，有的专学一家，有的兼学三家。整个两宋书坛形成了苏、黄、米三家鼎足天下的局面。

学苏字的，北宋有苏辙、王巩、赵令畴、霍端友、汪藻、李纲等人，南宋有苏过、范纯、张征等人。尤其在南宋，苏轼书法的影响更是辐射到北方金国，“金人尊苏与尊孔并重，故学其书风皆类似”，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蔡松年、蔡珪、施宜生等人。除此之外，只学苏轼创作思想，不拘泥于形质，靠丰富的学养融汇各家的有范成大、陆游等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历史规律，苏轼书法也难逃这样的规律，到了南宋末期，“尚意”书风毁在了一大批孝子贤孙手里，他们要么只求形式而精神萎顿，要么变本加厉而怪力乱神，“尚意”书风已陷入狂怪和僵化，失去了生命活力。

到了元代，人们对南宋书坛的乱象进行反思，归罪于苏、黄、米的革新，矫枉过正而全面否定“尚意”书风。一直到明朝中晚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风的价值才重新得到肯定，明代学苏字比较有成就的有吴宽和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清代，帖学大坏，碑学兴起，苏轼书法影响逐渐式微。当代，帖学回归，苏轼书法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再次证明了苏轼书法的永恒魅力。

三、苏轼“尚意”理论的意义

苏轼书法“尚意”理论的建立，对后世影响巨大，首先标志着书法从追求技巧的时代跨入了

超越技巧的时代，“书为心画”开始成为书家的自觉追求。在追求技巧的时代，人们视技巧为书法美的首要因素，因而着眼于创作对象的客体，将汉字的点画和结体锤炼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超越技巧的时代，人们注重主观意识的表达，自我的审美意识可以主动反映到字体的结构和点画之中，特别强调创作主体即书法家本身的情感表达。多读书，提高修养的要求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苏轼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终不能见妙。”

其次，标志着打破了美和丑的极端对立，以个性的多元表现代替唯美标准。苏轼有这样的论述：“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他的追随者黄庭坚、米芾分别也有“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和“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的相同论述。这些观点发展到明末清初，由于现实的黑暗，人们体会到现实中的残缺与血泪同样或者更加能够表现生命本质的时候，便发展为对“丑怪”的赞美——正如西方美学的“悲剧之美”，傅山的“四宁四毋”，刘熙载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都是“尚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书法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觉，应该说是始于苏轼为代表的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不仅影响了宋代的书法发展，也影响了中国书法千年。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清泉）

（上接第41页）以俟后之同志崇祀不替云。

——本篇录自清道光《蓬莱县志·艺文卷》。张万宪，明代人，生卒年不详。

论文注释：

①豫山《重修蓬莱阁记》。

②汪兴明等主编《中国历史官称辞典》。

③、⑦光绪《登州府志》卷二十五《文秩》、卷十二《职官》。

④即1878年为戊寅年，此系豫山重修之后。

⑤、⑥顺治《登州府志》卷十一《宦迹》、卷十二《职官》。

（山东省蓬莱市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蓬莱市高级职业学校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刘清泉）

君意谁人解

——苏轼《江城子·别徐州》赏析

熊朝东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江城子·别徐州》

东坡词最易感人处，语意深沉，精敏而富于思辨，发人幽思而触类旁通；耐人玩味处，寓情喻意丰富之极，借此而言彼，指东而言西，望北而意南，寄情言志抒怀，不亦是乎，与《花间》、《尊前》无同日而语矣。故，这首《江城子·别徐州》虽属苏轼友谊词一类，然却非一般寓意。看似写男女伤情别离之苦，实则有意为词，借题而作，另有所言。

这首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途中。诗人曾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调知徐州，五月到任，算来不到两年，今又匆匆离去。所以，诗人词题小记为“别徐州”，又曰“恨别”，而不记“别××”人，此已道出寓意有指了。接着诗人直接以感慨起句，尽道胸臆，感怀身世，其情深沉而悲痛。“天涯流落思无穷！”非常形象，完整而含蓄地画出诗人一段人生旅程的历史概貌。诗人从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入仕以来，真正在朝廷做官的时间有二年多点，而后被局势所逼迫外放则达八年之久，从通判杭州到知密州，又知徐州，今又移知湖州，他日还不知又移往何处？这“人生到处萍飘泊”的凄苦何时为终？从这句“天涯流落思无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因猝然调离徐州而萌生感慨，将他那凝结久远于胸中的怨愤和牢骚之情，竭肺腑之力，冲咽而出，所以起句笔势凌厉、沉重。使人自然联想到诗人的身世，而不牵强附会，曲解词意，厚诬古人。

“既相逢，却匆匆。”这里虽然包含着诗人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相处，因时间短促而匆匆相别的那种惋惜之情。但根据起句之慨叹，当是诗人追念当年京城制科考试及以后的情景。那笔力犀利，思辨缜密，宏篇巨论之治国韬略，被仁宗皇帝倍加赞赏，曾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苏辙）矣。”既知遇明主，必展大志。岂知明主仁宗不久便归天。但新主英宗，继而神宗，皆是十分器重苏轼，对其政治主张和对朝政的议论也很重视。如对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苏轼直言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道：“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宋史·苏轼传》）然而相知有日，远离无期，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自己已年届四十，至今不但无见用之意，且常有小人诽谤自己于圣上，真是人世沧桑，来去匆匆啊！

因此，紧接下句“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很富深意。诗人在那里不写与徐州达官显贵和别的友人的盛大宴别场面，而是攫取一个两人场面。这个场面很特别，夕阳余辉，杨柳依依，诗人面对送别的佳人，携手相望，暗自伤悲，自己的命运不正是同眼前这位流落风尘的歌伎的命运一样吗？只有命运相同的人才会心灵相互融通，相互理解。其情其景，泪和残红照，泪犹残红，残红溅泪，睹物伤怀，情意绸缪，极尽其“天涯同是伤沦落”之悲慨。如此幽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于是诗人发出“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的呼喊。即使东风依然，春光仍驻，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诗人这里借写离徐后的孤单寂寞，来抒发自己想回朝廷而又怕难以容身，以及不被当今圣上所理解而流落天涯的那种复杂的矛盾痛苦，其笔触一步三折，试问实答，更显情感

深沉，抑郁婉转，寓意幽深。

《蕙风词话》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这首词皆俱“情”、“景”二者之“真”也。“情真”，上阙极尽也。“景真”，下阙不但极尽，且景中有情，情缘上阙未了之情，情景交融，更见其真，其妙，其实，其深也。故为千古佳作，吟咏不衰。

词上阙主要是诗人对自己的身世感怀，倾吐胸中忧愤之情。下阙则通过对沿途景物的真实描写，倾谈对徐州的依恋之情，隐露对前途的忧虑。

“隋堤三月水溶溶。”隋开通济渠，分东西二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西引谷（穀）、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故道，至汴京开封府别汴水而东南流，是沟通京师与江淮的重要水道。沿河筑堤，世称隋堤。苏轼是走汴河水路离开徐州的：“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因此，沿途景物尽收眼底，诗人将那暮春三月，柳絮飘飞，绿水溶溶之景融于笔端，景源于情，情生于景，情景相融，一片纯真而引出“背归鸿，去吴中”之情景，且意极沉痛。《法言·问明》云：“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鸿雁高飞，北归故居而避祸患，而诗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非归故里，乃离开徐州热土，南去陌生的吴中湖州。苏轼在这里自叹不如归鸿，实有忧祸突降之虑。他心中十分清楚明白，现时朝廷争权夺利，排斥打击异己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王安石早已二度罢相，执掌朝政者皆属与自己为仇之“新进勇锐之人”，一场牵涉自己的政治旋风恐将不远矣。果不其然，诗人于四月二十九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就突然被朝廷派人逮捕入京问罪。

“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彭城即徐州，诗人由“背归鸿，去吴中”所引发出对徐州的依恋来，这依恋使得诗人一路远去一路回首相望。然徐州早已隐没于视野之外，惟见那清清泗水，微波荡漾，由西北而逶迤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流水去而不返，自己已将无还徐州之望了。“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既然无还徐州之望，只好托泗水把千点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怎奈楚江（泗水）东流，相思难寄，怎不令诗人怅然若失！这里包含着诗人两种思想感情：一种是对徐州的真情实感。诗人在徐州任上时间虽短，但

与徐州和徐州人民结下了患难生死之情，这种情感诗人是永远不会忘却的。诗人移知徐州的当年中秋过后不久，徐州便遭洪灾，城外茫茫巨浪，房屋冲毁了，“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树木之上”。（苏轼《黄楼赋序》）面对危在旦夕的徐州城，诗人镇定自如，亲率军民奋力抗洪保城，终于化险为夷。为防止来年水之再至，诗人增筑了徐州城堤，他说：“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黥髡。”（《答吕梁仲屯田》）长堤筑成后并建一楼，名曰黄楼。“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送郑户曹》）“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苏轼离开徐州时，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写道：“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春雨涨微波，一夜到彭城。过我黄楼下，朱栏照飞甍”。可见苏轼对黄楼有着深厚的感情。诗人对黄楼的这种感情就是对徐州的感情，对徐州人民的感情。他曾组织人民开发徐州煤矿，“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炼玉流金自精悍”（《石炭》），揭开了徐州煤矿史的第一页。他还对徐州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作过详细的调查，从内心爱上了这个南北要冲、古多豪杰的地方，并在元丰元年十月，向神宗上书，提出了治理徐州的种种措施。苏轼热爱徐州人民，人民更热爱他，爱戴他这位人品高洁，政绩卓著，和蔼可亲，文章盖天下的父母官，不管男女老幼都喜欢和他交游攀谈。“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这是一群农村少女争看这位“使君”的热闹场面。“老幼扶携收麦社，鸟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这是和乡民共庆丰收的赛神景象。（《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在他离开徐州之际，满城人民攀辕挽留，哭声填巷。送行父老无不感激地说：“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这第二种感情便是延接词首“天涯流落思无穷”慨叹之情，不但使词句首尾相照，且寓意相通联了。表露了苏轼对既遇明主，则未能终任，却又匆匆离去的困惑和不甘心。想要表述自己一腔忠君爱国之志，可惜没有机会。

因此，诗人有对徐州恋恋不舍的深厚感情和对流落天涯的怨愤之情，触景生悲，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惆怅；托淮泗以寄相思之泪，情真意厚，极尽“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哀叹。

（下转第 64 页）

《苏轼全集校注》前言

中国古代社会运行到北宋中叶，进入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王国维曾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①陈寅恪更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在这一时代里，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几乎同时出现光耀史册的伟大人物。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苏轼则是巨人中的巨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1037），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按旧时计法，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布衣，但到了他父亲一代，家族中开始有人做官。当时，四川地区的经济状况相当良好，教育事业也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③。苏轼的伯父苏涣进士及第，给家族带来荣誉，也给苏轼父子树立了“学而优则仕”的榜样。苏洵从青年时代起，发愤学习，“大究六经百家之说”^④，最终成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就以父亲为师，接受了丰富的文化教养和熏陶。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自少年时起，他就“奋厉有当世志”^⑤，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由此而有意识地储备能施之于政治的各种知识，“学通经史”，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

^⑥。同时，少年的苏轼也受到儒家优秀政治品格的熏陶，特别是东汉的义烈之士范滂、孔融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强权的威胁下决不屈服，保持独立的人格，成为指导苏轼一生进退出处的基本原则。

自古以来出生于四川的学者就有“观奇书”的特点，即在正统的儒家经书之外，阅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苏轼的文化教育里，无疑也有这样的内容。正如南宋人所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于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⑦广泛博杂的阅读，培养出苏轼开阔的视野和通达的襟怀，使得他的思想中别具一种打通各门学科、融会各家思想的博大精神。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了礼部进士考试。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议论自然流畅，一反“时文之诡异”，受到当时文坛领袖知贡举欧阳修及其助手梅尧臣的高度赞赏，同时也引起了元老重臣文彦博、富弼、韩琦的重视。母亲程夫人去世，苏轼随父苏洵和弟苏辙回蜀奔丧，丁母忧三年。终丧回朝。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举荐苏轼对制策，应仁宗直言极谏策问，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轼从此进入仕途，开始了四十年的宦海沉浮。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由凤翔签判任还朝，差判登闻鼓院。英宗爱其才，甚至想直接将他召入翰林，为宰相所劝止。于是苏轼依近例召试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二论，又入三等，获得直史馆的荣耀馆职。但

^①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苏轼《谢范舍人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 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⑤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⑥ 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⑦ 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四部丛刊》本。

就在这一年，妻子王弗病故，接着第二年，父亲苏洵也病故。苏轼再次回蜀丁父忧，而这一次终丧还朝，便再也没有回过眉山，蜀中山水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梦忆。

苏轼重回朝廷已是熙宁二年（1069），朝廷早已换新君。年轻的神宗皇帝雄才大略，力图改革弊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依其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作为变法的主持机关。新法的主要内容为理财与整军，其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堵塞“利孔”，将商品经济的利润收归朝廷。苏轼早在对制策时已发表了一系列的改革弊政的言论，但他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却有重大的分歧。王安石深刻认识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政治经济的危机非通过变法理财来根治不可。苏轼却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①，因而主张在不变法度的基础上，实行“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等措施。简言之，王安石坚持激进的改革祖宗法度的剧变，苏轼则主张温和的遵循祖宗法度的渐变。王安石向来知道苏轼的议论异于自己，所以把还朝后的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的身份抑置判官告院。后来王安石进一步感到来自苏轼的威胁，又让他权充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省得他来议政。不料苏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②，而且推出好几篇反对新法的重头文章。

总之，由于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与守旧的元老重臣关系密切，再加上王安石的故意排挤，苏轼逐渐卷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反对“新法”的浪潮，并以其卓越的才华俨然成为旧党的代言人。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认定“国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强与弱”、“富与贫”^③，这种观点反对富国强兵，也否定了自己过去在对制策时倡导改革的观点。然而，在王安石的以“生天下之财”为改革唯一目的，以“争利”为社会的唯一价值取向的形势下，苏轼关于社会道德风俗的重要性的论述，无疑具有纠偏治弊的针砭作用，对于如何构建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和顽固的守旧派不同，他反对王安石主要是其“与民争利”，他担忧的是青苗等法会带来流弊，

危害普通农民，而对新法中如限制皇族特权、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措施表示肯定。熙宁年间苏轼和王安石的交恶，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从此以后，他的仕途便与旧党的得势、失势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管他后来曾与王安石有过短暂的会晤和谅解，也曾反对过司马光废除一切新法。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指使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弹劾苏轼，虽查无实据，但神宗对他印象已经不好。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开危机四伏的汴京。继通判杭州之后，他又在密州、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担任地方官达八年之久。苏轼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既是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果决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巡行各县，赈济灾荒。在密州，他监督捕蝗，上奏朝廷蠲免秋税，招人抚养弃婴，所活达千人。在徐州，他率领军民抗洪救灾，筑堤护城，开发石炭。在各地，他都以一个亲民的父母官形象出现在普通百姓面前。

在地方政事的闲暇，苏轼的文艺活动也得到极大的开展。杭州西湖的美景、钱塘的潮汛、天目的秀色为苏轼提供了丰富的诗材，引发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密州的苦寒生活和剽悍民风，激发了苏轼的英雄情怀，由此而有意改造词为“艳科”的旧习，开创了由“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的豪放词派^④。在徐州，苏轼则写作了一系列题画诗，结合绘画品评以发表其艺术见解。在湖州，怀念前任知州文同，写下著名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在此期间，一些年青的文人学士纷纷向苏轼求教，愿拜在门下，其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成为文学史上盛传的苏门四学士。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在文艺上取得极大的成功，俨然被新一代士人奉为在野的文坛领袖。

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并牵连了一大帮旧党人士。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它标志着变法的新党和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变质，蜕化为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和报复。这场险恶的政治风波，几乎使苏轼遭到灭顶之灾。经旧党元老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的营救，甚至新党重臣吴充、章惇的说情，苏轼终免死罪，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其身份实际上是安置在黄州而被监管的逐臣。

^① 苏轼《策略三》，《苏轼文集》卷八。

^② 苏轼《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

^③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④ 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同上卷五十三。

元丰三年（1080）春，苏轼以待罪之身抵达黄州，随之在此整整生活了五年。初到黄州时，苏轼已四十五岁，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但主行“新法”的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正值英年。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几乎已永无出头之日。经济上也极为困窘，团练副使有虚名而无俸禄，仅靠过去的积蓄为生，日子越过越艰难。后经友人替他向官府申请到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带领家人亲自耕种，以此解决吃饭问题。这块地在黄州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此取名“东坡”，苏轼也由此号“东坡居士”。从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出现了东坡居士这个形象，而“东坡”之名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黄州时期是苏轼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期，他再次印证了中国文学史上“诗穷而后工”的客观规律。作为学者的苏轼，他在黄州的主要成果是《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撰写与《书传》的动笔。这些成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更重要的收获是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散文，从以前侧重于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的论文，转向随笔、题跋、书简、杂记等文学性很强的小品文，抒写人生感慨，表达朋友情谊，发表艺术见解，记录山川风物。他的诗歌，则从以前的富赡流丽而走向清空旷达，表现出更深沉的人生思考。他的词作，或雄放豪迈，或高旷洒脱，或婉约清深，超越人生的苦难，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代表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指点江山风月，缅怀历史人物，思考宇宙人生，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史影响甚巨，黄州赤壁名满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坡赤壁”。

元丰七年（1084），苏轼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在离黄赴汝的途中，他于金陵钟山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这次短暂而神秘的会晤，宋人笔记异闻纷呈，但从苏轼“从公已觉十年迟”的表白来看^①，则他与王安石不仅在道德学问、诗歌文章方面惺惺相惜，而且在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上应当也有所谅解和默契。

就在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的哲宗继位，神宗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也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这一年，他先是接到知登州的任命，到任才五天，又匆匆奉调入

京，随即升任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三月，除中书舍人，掌外制。九月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从此，苏轼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祐更化”。然而，苏轼从任地方官的实践中，已意识到新法中有部分合理的内容，不能一概否定。所以在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一事上，苏轼与之进行激烈的争论，肯定“免役法”的实施对生产发展有好处。当然，对新法中害民之法，如“青苗法”，他也坚决反对。但是，苏轼这种“独立不倚”的立场，遭到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甚至有人将他比作第二个王安石。司马光去世后，旧党迅速分化为几个党派，出现了“洛蜀党争”、“朔蜀党争”一类朋党之间由学术宗派、政见歧异转化而来的政治倾轧。除去朋党恩怨之外，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与程颐所代表的洛党，还体现了宋代文苑传统和道学传统的根本冲突。

元祐年间，苏轼的门下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毕仲游等人并擢馆职，秦观、孔平仲、李之仪等一大群文学之士也会聚京城，形成一个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辟黄庭坚等人为助手，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真正的新一代文坛盟主。与嘉祐年间相比，苏轼领导的元祐文坛政治色彩相对淡化，而文艺色彩更为浓厚，从主考官到参详检点官，都是些多才多艺的知名文人。这个文人集团在政事之余，作画吟诗，听琴对弈，焚香煮茗，玩碑弄帖，谈禅论道，醉心于文学艺术精神产品的创造。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公麟、米芾等十六人集会驸马王诜的西园，李公麟为画《西园雅集图》。与会者皆为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玩赏兴味，文采风流，超过晋代的金谷、兰亭之会，成为盛宋高雅的精神文明的象征。在元祐年间，苏轼的文学创作质量或许有所下降，但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而以此年代命名的“元祐体”，也作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的典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②。

由于不断受到政敌的造谣中伤，苏轼不安于朝廷，便于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州。此时他

^①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苏轼诗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已是朝廷派出的方镇大员，更便于施展其行政能力，为民造福。苏轼一到杭州，首先是请求免去租税，又同时开仓赈灾，缓解民困。接着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工程，雇佣灾民，使其存活。后又进一步治理西湖，开掘葑滩，疏浚湖底，修筑长堤。不仅兴修水利于一时，而且留人文景观于千古，而今著名的苏堤、六桥、三潭印月等都是苏轼任知州时的杰作。苏轼任满后回京担任翰林学士，仅几个月，又避嫌外任，于元祐六年（1091）出知颍州。颍州冬日大雪，苏轼又开粮仓以赈饥，调炭薪以救寒。又开发沟渠，治理颍州西湖。在此不到半年，元祐七年（1092）春，苏轼又改知扬州。到任后他了解民情，呼吁朝廷放免“积欠”。九月，苏轼被召回京，参与了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职。苏轼在京城期间，不断受到御史们的弹劾，他不安于朝，请求外任。终于在元祐八年（1093）六月获准知定州。临行前，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病故。九月，宣仁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赴定州后，一边整顿军队，亲自检阅操练；一边恢复“弓箭社”，计划整编民兵武装，加强边防。

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受到重新上台的新党人士的攻击，罢知定州，谪知英州，随即遭受“五改谪命”的迫害，至八月南下到庐陵时，已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几个月时间内，苏轼骤然由一个北国的封疆大吏沦为岭南的僻州罪臣。同时，他的精神依托、思想倾向和情感认同，也由庙堂走向民间，在一般士民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惠州，年老多病的苏轼物质生活非常困乏，所处的人文环境也非常落后，但他却能以其特有的人生智慧安然对待逆境。他一方面种菜植药，在物质上对抗贫穷和疾病；另一方面参禅学道，在精神上超越痛苦，修养心性。更值得注意是他在期间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以安贫乐道的陶渊明为榜样，表明了他在任何逆境中始终保持诗意图地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

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苏辙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闰二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这次贬谪，给了苏轼兄弟俩在藤州见面的机会，随后同行到雷州。但雷州之别，竟成兄弟俩的永诀。这年六月，苏轼渡琼州海峡至海南岛，七月抵达贬所。海南的

物质文化生活比惠州更艰苦、更匮乏，“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①，几乎一无所有。但是顽强而乐观的苏轼马上在海南黎族人民中间找到了朋友，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在艰苦的贬谪生活中，并非只是“独善其身”，而是同样保持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在惠州，他就不顾自己罪臣的身份“勇于为义”，通过正直的地方官朋友作了大量便民之事，如造桥引水，利用水力作碓磨，推广新式农具“秧马”，筹划分病院等等。而在海南，他致力于改进当地落后习俗，鼓励黎人从事农耕，告谕乡人重惜耕牛，批评“坐男使女”的陋习。他尤其为海南人文文化的落后感到担忧，自觉担负起促进海南文化建设的责任。他通过纯粹民间的方式，指导一些学生、秀才，营造读书的文化气氛，使他们感觉到海南与祖国文化“地脉”相连，鼓励他们在文化地位方面“破天荒”^②。谪居时期，苏轼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复杂深沉的人生感慨化为适物自闲的人生智慧，在日常生活的题材中发现诗意图和情趣，表现出“寄至味于淡泊”的天然之美。

苏轼谪居海南岛整整三年，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在神宗妻向太后主持下，徽宗继位，元祐旧臣重获起用。五月，内迁苏轼廉州安置的诰命下达，他于六月渡琼州海峡北返，盘桓于雷州半岛。八月奉诰命，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越大庾岭。但是，政治上的春天并未真正重来，苏轼反倒经历亲朋好友的生死离别的最后打击。他在雷州与秦观握别，其后秦观北行至藤州便病逝了。随后，苏轼经江西虔州、庐陵，过鄱阳湖，入长江，再东行至当涂、金陵。在常州酷热的七月，苏轼一病不起，平静安详地告别人世。而直到临终之际，他再也没有见到一生至爱的弟弟苏辙，也再没有回到梦萦魂牵的故乡。

苏轼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不仅“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而且“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③，各地出现自发性群众性的吊唁活动。苏轼仕途的升沉进退，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联。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形象，却远远超越了政治派别，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

^① 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苏轼文集》卷五十五。

^② 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引》，《栾城集·后集》卷三。

^③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

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的象征。

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而他的光芒却永远辉映着千年的文化天空。

二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苏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举凡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领域各方面，他都具有独特而深刻见解，提出了一系列在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结论。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历代文人对苏轼的热爱和崇拜，他在各方面的言论，哪怕不过是只言词组，往往被奉为凤髓骊珠，不断得到诠释与再诠释。他的影响也表现在一些富有争议的论题上，因此即使对他思想和作品表示不满的批评家，也难以回避他在各领域的创造。除此之外，苏轼的兴趣还涉及到博物学、药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苏轼的一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和勤奋写作的习惯，无论在朝在野，处顺处逆，他一直笔耕不辍。正是这种习惯，才为中国历史留下蔚为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哲学方面，苏轼是北宋学术上“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的经解著作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另有《广成子解》一部，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儒经、道经哲学的理解和演绎。此外，收在文集里的大量以基本哲学命题、基本典籍或重要历史人物为题的论文，如《正统论》、《易论》、《扬雄论》之类，以及其它记序、书信、题跋、甚至诗赋里，也表现出他对政治历史、宇宙人生的哲学见解。苏轼一方面继承了庆历以来以欧阳修为代表的疑经疑古思潮，非议《周礼》，怀疑《尚书》，以为其中不少内容是“非圣人之所取而犹存者”^①；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尊重原典的慎重态度，不赞成欧阳修等人主张删除经书中所引谶纬的做法。苏轼“毁《周礼》”、“讥《书》”^②，是以史事、义理、文理为根据，同样他尊重经典上的原始记载，也体现了一种阙如存疑的理性精神。

苏轼天道观的基本精神，是把“道”视为无所不包的“大全”，自然全体的总名，包含了万物

之理。因而苏轼哲学的精华，不在于形而上的本体论方面，而在于实践性较强的认识论方面。由此出发，他特别强调“观万物之变”、“尽万物之理”^③，在认识活动中打破事物之间的界限，发现其共同规律。这种对自然全体之“道”的认识移植到人性论上，就是顺应自然的人性，圣人之“仁”，便是“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仁各安其分而不相躡”^④，而君子之“道”，便是要达到“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

如果说程颐的“道”注重真向善的倾斜的话，那么苏轼的“道”则侧重于真与美的结合。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作为自然万物之理总体的“道”常常是“美”的渊薮，是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依据。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⑤，“造物”就是“道”的形象化表述，它给人们源源不绝地提供着无穷无尽的美。苏轼认为，“凡物皆有英华，较于形器之外；为人所喜者，皆其华也”^⑥，物的英华是“道”的内涵的发露，同时也能给人以美感，因此“道”与“美”原为一体。为了做到“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⑦，苏轼提倡一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人生态度^⑧，即以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去观赏客观对象，从而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获得审美愉悦。他的这种人生智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独树一帜。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苏轼善于从各种学说中吸取合理的成分。“读释氏书”，“参之孔老”^⑨，培养出他“大全”的天道观与“会通”的认识论，并使他在儒、释、道思想中发现不少共同的精神。苏轼将道家的“清净无为”、“虚明应物”、“慈俭不争”的宗旨，等同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学说^⑩。他用佛教的“本觉必明，无明明觉”来解释儒家的“思无邪”^⑪，还把“思无邪”当作道教炼内丹的方法^⑫。他主张各派学说

^① 苏轼《东坡书传》卷六，《四库全书》本。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苏轼《上曾丞相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④ 苏轼《策略三》，《苏轼文集》卷八。

^⑤ 苏轼《赤壁赋》，同上卷一。

^⑥ 苏轼《大还丹诀》，同上卷七十三。

^⑦ 苏轼《苏氏易传》卷九。

^⑧ 苏轼《宝绘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⑨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

^⑩ 苏轼《上清储祥宫碑》，《苏轼文集》卷十七。

^⑪ 苏轼《思无邪斋铭叙》，同上卷十九。

^⑫ 苏轼《思无邪丹赞》，同上卷二十一。

的调和融通，不赞成“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那种形同水火的现象，认为宇宙人生的真理如同大海，各家学说如同“江河虽殊，其至则同”^①。正因如此，苏轼的哲学从整体上存在着为多元化辩护、反对用唯一之理统治思想的倾向，它产生于北宋中叶相对自由的学术思潮中，并且在后世被奉为反对思想学术专制的旗帜。

在政治学方面，苏轼撰写了大量的策论和奏议等政论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国家的主张。早在应制科之前，他就写下一组系统阐述治国之策的政论文《进策》，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这组文章的议论都针对当时社会弊病而发，涉及吏治、民生、财政、军制等各种问题。尽管在财政方面他缺乏王安石那样的远见卓识，但是将“安万民”视为治国的重要内容，注意民生先于财政、军制，应该说是比致力于专理财政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政治见解。关于具体的政治措施，苏轼也有很好的建议，如主张专任官员，有意校正宋代政治制度“内重外轻”的倾向；主张移民于腹地，体现了宏远的战略眼光；主张以土兵渐代禁军，解决困扰国家的冗兵问题。苏轼的政治纲领基于合乎“人情”的思想，“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②，可以说是他改革的根本思路。熙宁初年，神宗与王安石欲定新法为“国是”，即由国家法权保证其实施的基本路线。在此时刻，苏轼写下体大思精的《上神宗皇帝书》，指出君主之安危系于人心，国家之兴衰在于风俗，朝廷之治乱赖于纪纲，皇帝和政府的行为应该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以此出发，苏轼对“新法”的内容、宗旨和实施手段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否定。此后，熙宁、元丰年间在地方官任上，苏轼还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三篇奏议，其中包括“新法”造成的流民、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否以及请求开放盐禁、要求专掌医疗病囚等问题。元祐年间在朝廷、方镇时，他更写下大量重要奏议，除去表达新旧党争、洛蜀党争的政见之外，其中既有关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及黄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又有若干要求放免积欠、请求赈济灾伤、兴修便民工程等为民请命的内容，涉及国计民生，针砭社会弊病，提出治理方法。与王安石励精图治的改革思路相比，苏轼的政治态度确实倾向于保守，但其“结

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基本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立足于制定长治久安的政策，而非追求短期的经济效应，颇具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苏轼“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的政治人格^③，对自然与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立志于治国安邦的士大夫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在史学方面，苏轼虽无史传著作传世，却留下了大量的史论、史评，如早年作历史人物论二十余篇，晚年作史评著作《志林》等等，表现出卓越的史识。他治《春秋》学，推崇《左传》“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的实录精神^④，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鄙视《左传》为“断烂朝报”^⑤、尊崇《公羊》、《谷梁》的微言大义的取向大相径庭。由此，他读《春秋》不拘泥于“凡例”，而主张本人情、审辞气、观大体，坚持尊重史实的基本态度。本于《春秋》家法“尊王”的精神，苏轼在史论上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武王非圣人”，认为周武王夺取商纣王的政权，丧失了为臣之道；孟子称武王为圣人，是违背了孔子的家法^⑥。这一观点虽显得保守，但展示了苏轼不囿于成说、大胆独立思考的勇气，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历代政治野心家借武王之名、行篡夺之实的历史事实的透彻理解。北宋时期，与《春秋》学直接相关的史学问题，以“正统论”最为重要，苏轼也写了《正统论》三首参加讨论。他不同意欧阳修从道德角度来讨论“正统”的做法，而认为“正统”不过是曾拥有过华夏中央政权之“名”而已，并不一定有既“正”且“统”之“实”^⑦。他指出历史批评（褒贬）与历史记录（实录）各有独立价值，两不相妨，从而解构了本具浓厚道德批评色彩的“正统论”，对于澄清宋代史学中褒贬与实录的纠葛作出了贡献。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苏轼主张道德与智术兼备，重视道德理想的智慧实践，推崇伊尹、诸葛亮、荀彧、孔融、陆贽等人物；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他注意到“风俗”与历史盛衰的关系，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规律，特别重视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体的“形势”得失问题。总而言之，苏轼的史学思想是尊重历史

^① 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之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② 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引苏轼语，《春秋通训》卷末，《四库全书》本。

^③ 苏辙《春秋集解引》，《春秋集解》卷首，《四库全书》本。

^④ 苏轼《论武王》，《苏轼文集》卷五。

^⑤ 苏轼《正统论三首》，同上卷四。

^① 苏轼《祭龙井辩才文》，同上卷六十三。

^② 苏轼《辩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首》之二，同上卷二十七。

实践，主张寓道德于事功，在对历史的评判上，更强调道德的效果伦理。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

在社会伦理学方面，苏轼继承了孟子“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的思想^①，提倡一种在遵行“大道”的基础之上的君臣关系，即平等的“师友”关系。虽然他接受了《春秋》家法“尊王”的精神，但“尊王”的前提是互相尊重的“君臣之道”，士大夫臣服于天下为公的“大道”，而非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政治权威。苏轼提出了“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的立身处世原则；批评了“秦汉以来，士贱君肆”的“道”与“势”失衡的政治现象；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乃在于“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即士大夫整体人格萎缩的原因^②。苏轼之所以高度评价汉代疏广、疏受（二疏）的行为，就因为他们在“以智力王”、“以法驭人”的政治权势下，在“凜然君臣，师友道丧”的帝王专制下，能将功名弃如敝屣，使帝王知道区区官职，“不足骄士”^③。他推崇孔融的“英伟冠世之资”，鄙视曹操的“鬼蜮之雄”^④，其实质就在于鼓吹士大夫以道义力量与政治权势相对抗。苏轼这种思想既是范仲淹、欧阳修倡导的挺立士风、崇尚气节的继续，同时也表现了他自己尊重个性、反对专制的一贯作风。因此，苏轼一方面欣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的忠义精神^⑤，无论穷达，始终坚持忠君报国的信念；另一方面，他又称道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的潇洒态度^⑥，感叹其不愿牺牲自我个性而向政治权势低头。可以说，陶渊明和杜甫最终成为宋代诗学伦理典范，与苏轼的评价、推崇与仿效分不开。特别是陶渊明价值的发现，在文化史上意义深远。

此外，苏轼在军事学方面也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如《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在战略上反对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代滕甫论西夏书》，在战术上主张谨慎从事，反对轻举妄动，都颇能切合当时的军事形势。至于医药学方面，苏轼亲自实践并记

载下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和治疗药方，包括各种炼丹养息以及药物疗效之说，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医药杂说与沈括的《沈存中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

在文学艺术方面，苏轼全面的成就和杰出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北宋其它学派，如王安石的“新学”、程颐的“洛学”都具有鄙薄文艺的倾向，裂“文”与“道”为二途，尽管王安石本人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但其学说的精神却“以不习诗赋为贤士”^⑦。而只有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继承欧阳修的观点，坚持把“道”与“文”融为一体，延续着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传统。苏轼不仅一再公开为诗赋取士辩护^⑧，不仅接纳招揽大批文学之士，而且提出不少具有创作指导意义的文艺美学观点，奉献出诗词、散文、书画等多方面的经典作品，从而成为北宋后期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以及整个宋代名副其实的文学保护神。

苏轼一生创作欲望非常旺盛，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数量之巨为北宋作家之冠，质量之优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文被后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唐韩愈之文并称“韩潮苏海”；他的诗与黄庭坚之诗并称“苏黄”，被后世视为宋诗的典型；他的词开创豪放一派，与辛弃疾词并称“苏辛”。除此之外，苏轼的书法也独树一帜，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打破“蜀人不善书”的魔咒；而他的绘画则是文同“湖州派”的传人，为宋代水墨写意的文人画的中坚。

苏轼之文众体兼擅。如果说韩愈是唐宋以来“新古文”的开创者的话，那么苏轼的“新古文”则具有某种“集大成”的意义。他继承欧阳修“变峭厉为平畅”的文风，以其“才气廉悍”而“间架阔”的创作实践^⑨，把平易流畅的新古文推上艺术顶峰，并以此为基础，开辟出小品文的一片新天地。苏轼的古文作品包括论、策、序、说、记、传、墓志、行状、碑、奏议、书、尺牍、杂著、史评、题跋、杂记等多种文体，其富有文学价值的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以论、策为代表的政论和史论。这

^① 《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十四。

^③ 苏轼《二疏图赞》，同上卷二十一。

^④ 苏轼《孔北海赞》，同上。

^⑤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同上卷十。

^⑥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一。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元符三年五月条陈瓘弹劾蔡卞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⑧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只许诗赋兼经状》，同上卷二十九。

^⑨ 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七经楼文钞》卷四，资益馆1920年排印本。

类作品是最郑重的古文体制，颇能代表苏轼的艺术功力。大抵语言明晰准确，生动贴切，善用比喻对照，说理透彻；而其结构曲折条畅，洋洋洒洒，层层深入，首尾照应。尤其是《进策》中的不少文章，给人的感觉是文采斐然，思理周密，雄辩滔滔，有一泻千里之势。二是以记、传、书序为代表的叙事文，更体现了苏轼的艺术匠心。他的亭台堂阁记，打破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传统写作模式，将三种表现手法按主题展开的需要而错综使用，变化多端。如《凌虚台记》通篇以议带叙，《超然台记》先议后叙，《放鹤亭记》先叙事写景，中段以主客对话方式发议论，后以歌词作结。他的传记作品如《方山子传》，略去传主履历，抓住几个细节来描写人物狂放的性格，迥异于史传详于履历、略于细节的写法。他的书序如《范文正公集叙》、《六一居士集叙》、《王定国诗集叙》等，都是传世的名篇，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在写作手法上不拘格套。三是以杂记、题跋、尺牍为代表的随笔小品文。这些纯粹的艺术散文，抛开了“文以载道”的新古文传统，自由表达对自然人生、文学艺术的种种体验和感受，更能体现苏轼的创作个性。记游文如《记承天夜游》、《记游松风亭》等，融自然景物的赏会与人生哲理的领悟为一体，真率无饰而情趣盎然。书简如《答秦太虚》、《与谢民师推官书》、《与侄孙元老》等，或叙身边琐事，或抒人生感慨，或谈艺术见解，娓娓道来，亲切有味。题跋如《画水记》、《书黄子思诗集后》、《书陈怀立传神》等，评诗论画，见识卓越，称得上是艺术札记的精品。苏轼的随笔小品文别具诙谐戏谑的妙趣，有性灵，有哲理，最能体现他在日常生活中诗意图地栖居的人生智慧。

值得关注的还有苏轼的赋、骈文（四六文）和韵文。欧阳修领导的北宋新古文运动，一改唐人典重板滞的骈赋、律赋为自然清旷的文赋，既便于自由表达，且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继承了这一写作传统，他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潇洒神奇，出尘绝俗”^①，被公认为“一洗万古”^②，代表宋赋创作的最高成就。至于骈体四六文，更是苏轼文集中的一大类别，除了任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时写的制敕、内制敕文、敕书、口宣、批答、表本、国书、朱表等朝廷应用性文体外，还包括在地方官任上写

^①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评语，清道光间刻本。

^② 强幼安《唐子西文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排印本。

的表状、谢启、青词、疏文、斋文等个人或官府的应用性文体。这类文章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立意谋篇和属辞比事上，而苏轼的四六文不仅“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文”^③，而且其“属辞比事”做到“警策精切”^④，令人称道。他在朝时所拟的制诰，颇有典赡高华、浑厚雄放的气象，如《王安石赠太傅制》高度评价政敌王安石，显现出秉心的公正和胸襟的阔大。《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贬斥新法始作俑者吕惠卿，痛快淋漓，也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他在野时所写的谢表，宛转附物，怊怅切情，畅达如行云流水，而工稳如联璧并辔，如《谢量移汝州表》“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⑤，《到昌化军谢表》“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⑥，抒怀既工，遣词尤切，文情相称，沉痛感人。苏轼还写了许多铭、箴、赞、偈、颂、祝文、祭文之类的韵文。一方面，他遵守传统的文体形式，用整齐的四言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择胜亭铭》、《二疏图赞》、《十八大阿罗汉颂》、《祭柳子玉文》等，名言警句迭出，文辞精练而意脉流畅。另一方面，他又往往运用古文的句法，错综长短，在保持押韵的前提下句式自由放纵，如《徐州莲花漏铭》、《九成台铭》、《文与可飞白赞》、《告文宣王祝文》、《祭欧阳文忠公文》、《祭文与可文》等，长短高下，随意挥洒，做到辞情并茂。

总而言之，无论是古文、骈文还是韵文，苏轼都强调“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写作态度，追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写作境界^⑦，并由此而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⑧这正是对其文风格的真实写照。

苏轼之诗内容题材极为广泛。旧题王十朋编《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分苏诗类别共七十七类，其中杂赋九十五首，所属题材分散，难以归类，

^③ 欧阳修《试笔·苏氏四六》，《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④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四六名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校点本。

^⑤ 苏轼《谢量移汝州表》，《苏轼文集》卷二十三。

^⑥ 苏轼《到昌化军谢表》，同上卷二十四。

^⑦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同上卷四十九。

^⑧ 苏轼《自评文》，同上卷六十六。

因此其实际涉及的题材将近一百类。可以说，正是苏诗百科全书似的内容，引起宋人“集注分类”的兴趣。将传统分类重新归类合并，苏诗大致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社会政治诗、山水田园诗、风土民情诗、咏物寓志诗、抒情述怀诗、咏史怀古诗、评书题画诗、谈禅说理诗、赠答酬唱诗。

对社会政治的深切关怀，在苏诗中有很多反映，虽然专门以政治为内容的诗在其集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关涉政治和社会民生的诗贯穿他一生的写作。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以诗反映社会问题，写了《荆州十首》、《和子由蚕市》等作品。熙宁以后，他用诗来讽刺“新法”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弊病，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赠孙莘老七绝》等，抨击新法中的盐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在黄州贬所，他还是忍不住写下《五禽言五首》、《陈季常蓄朱陈村嫁娶图》、《鱼蛮子》等，讽刺谴责横征暴敛的“县吏催租”。同时还写下《闻洮西捷报》这样反映宋军与西夏战争的诗篇。甚至一直到晚年贬谪惠州、昌化军，他仍然不忘用诗来干预政治，批评时弊，如《荔枝叹》、《庚寅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等，批判劳民伤财的贡物与黄河治理的失策。山水田园诗也是苏诗中重要的门类之一。苏轼一生足迹遍及天下，西起峨嵋之麓，东到钱塘之滨，北至宋辽边境，南抵海南黎村；他曾在徐州乡村劝农，在黄州东坡躬耕，在惠州栽菜种茶，在儋州扶杖携藜。所以他的诗集中留下许多名山大川、田园风物的画卷，而许多山川风物也打下其诗的鲜明印记。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题西林壁》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初到黄州》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几乎只要言及西湖、庐山、黄州，人们马上会想起这些诗句。普通农村景物，在苏轼笔下也变得格外富有诗意，无论是“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的新城道中^①，还是“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的黎村路上^②，都蕴藏着乡土和家园的气息。与此相联系的是苏轼的风土民情诗，比如记载蜀中每年除夕“馈岁”、“别岁”、“守岁”风俗的《岁晚三首》，描写杭州农村妇女古老服饰与淳朴民风的《于潜女》，

歌咏江南农具的《无锡道中赋水车》、《秧马歌》，记载徐州开采煤矿的《石炭》等等，都具有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认识价值。苏轼诗集中有大量的咏物诗，但这些诗并非单纯的咏物，而多是托物以咏志，如咏海棠不为黄州土人所贵，感叹“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③；咏红梅因为“寒心未肯随春态”，所以“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④；咏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余”，而感叹“难进易退我不如”^⑤；咏龙尾石砚“文章工点黑，忠义老研磨”^⑥，表明自己的人生追求。苏轼一生大起大落，遭遇坎坷，有极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复杂的精神面貌，所以抒情述怀始终占据他诗歌创作的主流。早在青年时期，他便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喟叹^⑦；随着政治的失意，他更增添了“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的自责^⑧。在苏轼诗集中，常出现“吾生如寄耳”的命运主旋律，不断地倾诉着人生的苦难和无奈，“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⑨，“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超越人生的苦难和无奈，“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¹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¹²。苏轼的咏史怀古诗可看作用诗写成的史评，往往借古鉴今或借古讽今，如《王莽》讽刺王安石变法，《董卓》讽刺新党相互倾轧。苏轼的评书题画诗也颇多佳作，论书法的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句句警拔”，生动勾勒出一部书法简史；《石苍舒醉墨堂》则描写了书法艺术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艺术个性。他的题画诗更富于创造性，往往不再拘泥于画面形象引起的联想，而是借助题画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或是对其他事物的看法，如《虢国夫人夜游图》之抒发历史感慨，《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之表现归隐思想，《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之探讨艺术规律，多有妙处。至于苏轼的谈禅说理诗，虽有不少宣扬虚幻空无的

^① 苏轼《新城道中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九。

^② 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同上卷四十二。

^③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苏轼诗集》卷二十。

^④ 苏轼《红梅三首》之一，同上卷二十一。

^⑤ 苏轼《鹤叹》，同上卷三十七。

^⑥ 苏轼《龙尾石砚寄犹子远》，同上卷三十九。

^⑦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同上卷三。

^⑧ 苏轼《游金山寺》，同上卷七。

^⑨ 苏轼《送岑著作》，同上。

^⑩ 苏轼《京师哭任遵圣》，同上卷十五。

¹¹ 苏轼《东坡》，同上卷二十二。

¹²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同上卷四十三。

消极思想,但也有不少充满了人生的智慧,不可一概否定。如《泗州僧伽塔》通过考察“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的现象,得出祈祷不可信的结论;《百步洪》通过描写急流之迅疾,衬托人生之短暂,阐发了“但应此心无所住”的应对人生无常的禅宗之旨;《泛颍》通过描写水中倒影“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的情景,不仅表达了一即万、万即一的华严思想,而且悟出“玩水之好,贤于声色臭味之好”的人生哲理^①。苏轼诗集中将近一半为赠答酬唱诗,其中有的不免出于敷衍应景,但也有很多出于真情实感,抒发了亲人之情和朋友之情。此外,这些诗中有不少戏谑之作,争新斗巧,富有谐趣,表现了诗人优裕的智力和广博的才学,鲜明地体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苏轼之诗各体皆工,但成就最突出的是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相对而言,中青年时期诗风豪健清雄,长于七古,受李白、杜甫、韩愈影响较多,气势纵横,议论开阖,境界阔大。豪健者如《凤翔八观》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送刘頵倅海陵》、《书韩干牧马图》、《送杨杰》等等,清雄者如《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定惠院海棠》、《续丽人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等。晚年时期诗风平淡自然,长于五古,倾心于陶渊明、柳宗元,推崇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②、“质而实绮,耀而实腴”^③,他的《和陶诗》虽然尚缺乏陶诗的天然本色,但总体上已做到不弄奇巧,不施雕琢,随意吐属,自然高妙。

苏轼之诗在艺术上颇富有创造性。他擅长议论,善于从各种社会现象、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做出形象的、精辟的回答,启示人们做多方面的思考。后人评价他的《送参寥师》“直涉理路而有挥洒自如之妙,遂不以理路病之”^④,其实不少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苏诗长于比喻,不仅在比喻的新颖贴切上争胜,如《新城道中》喻云为“絮帽”,比日为“铜钲”,而且在比喻形式上有所创新:一是博喻,如《百步洪》以八种飞动的形象比喻长洪飞落,《读孟郊诗二首》以三种空无所得的情景比喻读孟郊诗的感受;二是曲喻,如《守岁》

以无法把捉的“赴壑蛇”比喻无法挽留的旧年,《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比喻无常的人生,比喻的两端建立在性质的相似上而非形象的相似上,突破了传统模拟思维的模式。苏诗善于体物,“随物赋形”,生动传神,如《韩干马十四匹》铺叙各马之神态,栩栩如生;《舟中夜起》描写“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的夜景,绘声绘色;《聚星堂雪》摹写“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的小雪,体物神妙;《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以“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之句刻画荔支,形容备至。苏诗为人称道的还有用典的博洽和精深,这在赠答酬唱诗中用得极为普遍。如《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均是八句中用七个典故,多层次地揭示所写对象的性质。如作诗送李廌下第,“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真迷日五色”^⑤,用典非常贴切,传达出自己惋惜自责的心情。

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使得苏诗在表达各种内容题材时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正如清人赵翼所说:“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⑥所以尽管苏诗从总体上沿着韩愈开辟的“以文为诗”的道路发展,但大体能避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出现的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弊病。

苏词的数量虽远远少于苏文、苏诗,但在两宋词坛也名列前茅,蔚为大家。更重要的是,苏轼率先冲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有意识“以诗为词”,开创了词的豪放一体,对词的“雅化”作出重要贡献。因而,就艺术开创性而言,苏词的贡献应在苏文、苏诗之上。晚唐五代词的内容几乎全部为男女艳情所占据,由此使词成为有别于诗的“小道”、“艳科”,而后世标举此为词的“本色”。苏轼的不少词作,却打破了诗词界限,扩大词的内容题材,记游、怀古、赠答、送别、咏物、说理、谈禅,“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⑦,“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

^① 苏轼《泛颍》王注引赵次公语,同上卷三十四。

^② 苏轼《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③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一。

^④ 纪昀《送参寥师》评语,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十七,清同治八年韫玉山房刻本。

^⑤ 苏轼《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苏轼诗集》卷三十。

^⑥ 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苏东坡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

^⑦ 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

绸缪宛转之度”^①，表现出全新的面貌。晚唐五代词风整体上境界狭小，风格纤弱，苏轼则另辟蹊径，创造出高远清雄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以“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气象恢弘，取代了“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辞情蕴藉^②。苏轼还有意识地突破形式、音律的限制，让音律服从于抒情需要，所以他的词“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③。这样就使词不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而成为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当然，苏轼向来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他的词也并非只有豪放一体，不仅还有旷达超逸，而且包括不少婉约含蓄的作品。在苏词中，就景物而言，既有“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这样气势磅礴的江涛海浪^④，“千古龙蟠并虎踞”这样兴亡悲慨的名胜古迹^⑤，也有“松间沙路净无泥”这样清新恬静的雨中美景^⑥，“牛衣古柳卖黄瓜”这样和谐古朴的田园风光^⑦。就人物而言，既有“酒酣胸胆尚开张”的太守^⑧，“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⑨，也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佳人^⑩，甚至“相排踏破蒨罗裙”的村姑^⑪。就情感而言，既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报国壮志^⑫，“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的思乡情绪^⑬，也有“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的沉重喟叹^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乐观放达^⑮。总之，

^① 胡寅《向莎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排印本。

^② 俞文豹《吹剑续录》，《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④ 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东坡乐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⑤ 苏轼《渔家傲·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同上卷上。

^⑥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同上卷下。

^⑦ 苏轼《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同上。

^⑧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同上。

^⑨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同上卷上。

^⑩ 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同上。

^⑪ 苏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同上卷下。

^⑫ 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同上卷上。

^⑬ 苏轼《满庭芳》（归去来兮），同上。

^⑭ 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同上。

^⑮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同上。

苏词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质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⑯，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此外，苏轼的书画艺术也值得一提。他的书法作品数量极多，也得到较好的保存、编集、整理、刻印。早在南宋，汪应辰就编集东坡法帖，刻于成都西楼，世称《西楼帖》，另有不少纸本真迹和宋拓法帖传世。苏轼书法大致早年追摹晋人，字体妍丽，风神俊爽，笔划细致流畅。中年遍参唐人笔法，笔势有力，用墨较丰，点画肥厚，字体稍扁。晚年作品笔力沉着，雄劲洒脱，字体从有意构巧转为渐近自然，以唐人笔法造晋人风韵。苏轼的绘画作品虽今仅存“枯木怪石”一幅真迹，但据同时代文人黄庭坚、孔武仲、米芾、惠洪等人的记载，除画枯木是他的拿手好戏之外，他至少还和李伯时合作过“竹石牧牛图”，自己单独画过墨竹、寒林等。苏轼曾自供“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⑰，除了在友人家外，汴京的法云寺、酺池寺、戒坛院的壁上也都留有他的作品。他“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作墨竹，从地一直起到顶”^⑱。总而言之，苏轼作画不追求形象性，而强调画的写意性和抒情性，有意以枯老拗折的笔墨表达胸中盘屈不平的情感。这种写意的风格，对后世文人画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古代“论画以形似”的传统格局。

苏轼在文学艺术各领域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与他自觉的文艺创作理论指导分不开的。这些有关文艺创作的论述极为丰富，散见于记序、题跋、书信、诗歌等多种体裁的文字之中。除去关于某种具体文体的创作方法的言论之外，他关于一般创作原理的论述可概括为这几方面：其一，主张“道”与“艺”的统一，即对世界的审美感知把握与传达这种感知把握的艺术技巧的统一。一方面，他认为“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⑲，艺术家必须做到“与造物者游”^⑳，透彻领悟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又意识

同上卷下。

^⑯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本。

^⑰ 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苏轼诗集》卷二十三。

^⑱ 邓椿《画继》卷三，《津逮秘书》本。

^⑲ 苏轼《跋秦少游书》，《苏轼文集》卷六十九。

^⑳ 苏轼《答黄鲁直五首》之一，同上卷五十二。

到“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①，在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还应有艺术能力来表现这种美。艺术家不仅能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能将胸中之竹转化为手中、笔下、纸上之竹。由此，苏轼晚年提出“辞达”说，其内涵是“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的统一^②，达到创作主体和文艺本体之间的高度融合。其二，强调各种不同媒体或不同文体之间有共同的艺术规律，可以相互融通并相互越界，不仅从事创作时应如此，进行欣赏时同样也应如此。苏轼有这样三句名言，一是“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③，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共同艺术趣味；二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④，主张超越媒体的界限去欣赏作品的美感；三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⑤，主张用看画的眼光评诗，用评诗的眼光看画，即站在甲媒体的立场去理解乙媒体的表现性。他批评谨守门户界限的做法，认为“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而真正的艺术家应懂得“物一理也”的道理，只要“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⑥。他之所以在各媒体领域中诗、词、文、书、画无所不能，之所以在文学领域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破体出位，之所以在文章门类中以古文为赋、杂散文于骈文、韵文，都与此思路相关。其三，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或是多种美感因素的相互渗透融合，反对由整齐划一而造成的单调乏味。他论书法作品，批评“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⑦，不同意以唯一的艺术趣味去衡量作品。论书法风格主张“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⑧，论诗歌风格主张“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⑨，提倡庄与丽、刚与柔、纤秾与简古等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他批评王安石作文章“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

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⑩，指出文化专制必然造成文学的贫困，其见解相当深刻。其四，重视文艺创作中的主体性和审美特性。他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¹¹反对绘画拘泥于“形似”，而追求“得之于象外”¹²，反对诗歌拘泥于“着题”，而主张“以奇趣为宗”¹³。他论书法，标举“意造无法”¹⁴；论绘画，标举“士人画”的“取其意气所到”¹⁵；论诗，标举“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¹⁶；论文，在肯定“词理精确”的同时，更赞赏“体气高妙”¹⁷。

总而言之，苏轼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观点标志着宋代文艺各领域、甚至中国古典文艺各领域审美风尚的全面转折，这就是以表现士大夫人格趣味为各艺术门类核心的“文人化”风尚的兴起。新古文范式的确立，小品文的流行，文人画的出现，豪放词的发展，书法笔墨趣味的追求，以及诗画相通的论述，“士人画”概念的提出，以禅喻诗的发端等等，都显示出这种审美风尚的转折。无庸置疑，苏轼在文艺领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三

苏轼一生将写作视为最快意之事，因而足迹所到之处，总要留下各种形式的作品。早在他生前，就有大量的诗文词作品被编辑成集，甚至刊刻印行。除了他自编或参与编辑的《南行集》（三苏父子合著）、《岐梁唱和诗集》（苏轼、苏辙兄弟合著）、《东坡集》、《和陶诗》之外，更多的是他人所编辑，如王诜、陈师仲所编两种《钱塘集》，陈师仲所编《超然集》、《黄楼集》，熙宁末年行世的《眉山集》，元祐间编辑的《汝阴唱和集》，陈慥所编《苏尚书诗集》，刘沔所编《东坡后集》，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的《东坡词》，契丹范阳书肆所印《大苏小集》等等。这些作品当时流传极广，不仅在宋王朝辖境拥有广泛的读者，如苏轼的政敌王安石在熙宁末就

^① 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同上卷七十。

^②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同上卷四十九。

^③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二十九。

^④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苏轼文集》卷七十。

^⑤ 苏轼《韩干马》，《苏轼诗集》卷四十八。

^⑥ 苏轼《跋君谟飞白》，《苏轼文集》卷六十九。

^⑦ 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诗集》卷八。

^⑧ 苏轼《次韵子由论书》，同上卷五。

^⑨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⑩ 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同上卷四十九。

¹¹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二十九。

¹² 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同上卷三。

¹³ 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柳诗有奇趣》引苏轼语，《稀见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¹⁴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苏轼诗集》卷六。

¹⁵ 苏轼《跋汉杰画山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七十。

¹⁶ 苏轼《送参寥师》，《苏轼诗集》卷十七。

¹⁷ 苏轼《书子由〈超然台赋〉后》，《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已读到《眉山集》，并次韵雪诗五首，而且流入邻邦契丹、高丽的书肆，如苏辙元祐年间出使契丹便发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①；苏颂更在元丰二年便称苏轼“文章传过带方州”，注明“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②。

此外，苏轼生前还撰述修订了《易传》、《论语说》、《书传》、《志林》、《艾子杂说》等专著和杂著。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先君（苏洵）……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学，多先儒所未达。……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若加上《志林》和《艾子杂说》，总数在一百卷以上，可见其著述之宏富。而且，这还并非苏轼写作的全部。

苏轼去世后，尽管宋徽宗和蔡京曾严禁他的著述，甚至在崇宁二年（1103）诏毁苏集印版，但民间对其作品的热情丝毫不减，至迟在宣和元年（1119），“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到了南宋，在朝廷排斥王安石“新学”、推崇元祐学术的背景下，苏轼的著述尤其是文学作品更得到空前的传播，具体表现为文集、诗集、词集的收集整理、编辑注释和刊刻印行的全面勃兴，出现了“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此后历元、明、清各代，苏轼著述的整理刊行一直长盛不衰。

关于诗文合集的编纂，据《墓志铭》所载，苏轼生前编定“东坡六集”，即《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而据晁公武在成书于孝宗之世的《郡斋读书志》中著录，在南宋初就有人在“东坡六集”的基础上补入《应诏集》十卷，变成了“东坡七集”。诗文合编的苏轼全集在宋代有多种版本，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坡别集》，便提及杭本、蜀本、建安本、麻沙书坊本、吉州本等。其中杭本又称临安本，为“六集”本。蜀本为“七集”本，即洪迈所说“今苏氏眉山

^① 苏辙《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之三，《栾城集》卷十六。

^② 苏颂《己未九月，予赴鞫御史，闻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不得通音息，因作诗四篇，以为异日相遇一噱之资耳》，《全宋诗》卷五百二十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③。建安本为苏轼曾孙苏峤所刊家集《东坡别集》，虽无《应诏集》，但与杭本编法不同，“是取前、后集及《内制》、《外制》、《奏议》、《和陶》诸集中诗文编次为一，以别于‘六集’之各自为书也”^④，可视为最早的苏集分类合编本。麻沙书坊本即《东坡大全集》，兼收六集之外的诗文及《志林》、《杂说》之类。吉州本是建安苏峤家集《别集》本的补遗本，即《续别集》。此外，还有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本，所传前、后集六十卷，编次有伦且少舛谬，为时人所推重。南宋前期传世的《东坡外集》也属分类编纂系统，专收《东坡集》、《后集》遗漏的诗文。据明焦竑所说：“得《外集》读之，多前所未载，既无舛误，而卷帙有序，如题跋一部，游行、诗、文、书、画等，各以类相从，而尽去《志林》、《仇池笔记》之目，最为精核。其本传自秘阁，世所罕覩。”^⑤总之，在南宋时期，世上流行的各种苏集至少有二十多种。据明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首原序说：“《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小集》、《仇池集》、《毗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右文忠苏先生文集之传世者盖如此。”^⑥

元人对苏集的主要贡献在于收藏了宋本“东坡七集”，而明人则不仅收藏宋本，更于成化四年（1468）由吉安知府程宗刊刻了新版的“东坡七集”。成化本的特点是“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⑦，以《续集》取代了宋本“东坡七集”中的《和陶集》，另收录了包括南行诗、东坡书简在内的《前集》和《后集》未收的诗文。明成化本《续集》有重收、漏收、互见的诗文，但比宋本“东坡七集”更全，是今人所见刊刻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东坡七集”。成化本广为流传，明、清两代一刻再刻。明嘉靖十三年（1534）江西布政司重刊“东坡七集”，有所修订，《续集》比成化本少收诗文九

^③ 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九《擒鬼章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校点本。

^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

^⑤ 焦竑《刻苏长公外集序》，《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首，明刻本。

^⑥ 不知撰人《东坡先生外集序》，《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首。

^⑦ 李绍《成化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苏轼文集》附录。

十三首。明万历间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二卷刊行，“大抵合七集本而重加类次者”。其后又有据万历本改编重印的《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流行。此外，南宋郎晔所见《东坡外集》，元、明两代有抄本流传。万历年间，康丕扬得到两种《外集》抄本，交毛九苞校订，刊刻于扬州。今存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康丕扬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另有明刻《苏文忠公集》一百一十四卷，前两卷为赋，卷三至卷三十一为诗，其余皆为文。

清代诗文合集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康熙中蔡士英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乃据万历改编本旧刻重订，为类编全集本，《四库全书》即据该本著录。二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宝华盦影刊成化本，经缪荃孙校跋，改正了原刊本许多疏漏。中华书局据缪校本“东坡七集”排印，收入《四部备要》。

苏轼之文，自南宋起，就成为士人学习模仿、尤其是科场考试的典范，以至于有“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流传^①。正因为人们重视苏文的范文价值，所以在诗文合集之外，南宋没有单独的苏轼文集全刻本，只有《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三苏先生文粹》两种选本存世。《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为郎晔所作苏文选注，书成于孝宗之世，光宗绍熙二年（1191）以表进呈。此书原为三苏文选注中的苏轼文选注，共六十卷，选注苏文四百九十八篇，“钩稽事实，元元本本，具有条理，可与施元之、王十朋诗注相颉颃”^②。此书虽进呈乙览，但并未颁行，所以流传不广，今存宋刊本均为残本。直到民国年间《四部丛刊》用乌程张氏、南海潘氏所藏宋刊残本拼合影印后，此书才大量流行。《三苏先生文粹》是南宋坊间刻本，编者不详。其中老泉（苏洵）文十一卷，东坡文三十二卷，颍滨（苏辙）文二十七卷。此书为备科场考试模仿，所以非常流行，当时就有多种刊本，据各种书目记载，有宋绍兴初蜀大字本、宋刊巾箱本、宋淳熙三年巾箱本，而宋绍兴饶州董氏集古堂刊本今尚残存三卷，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明代曾多次翻刻，有明刘氏安正书堂刊本、明嘉靖四十三年归仁斋刊本、明嘉靖十二年眉州刊本等。

明万历年间，茅维刊刻《苏文忠公全集》问世，这是宋、元以来第一次汇集全部苏文并单独刊行的文集。此书对照焦竑所藏阁本《外集》，“参之《志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②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

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③，总共七十五卷（其中第七十四、七十五两卷收苏词）。由于此书搜罗苏文甚为齐备，虽有脱误，且印制不精，但仍有相当价值，所以明、清两代曾多次刊印，今中华书局版《苏轼文集》也以此书为底本。

与苏文相比，苏诗的注释刊刻本则远远多得多。据宋人所说：“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也。”^④这种当代人注当代诗的现象，与苏轼、黄庭坚“以才学为诗”的作风有关。不过，在宋代，黄诗仅有任渊、史容、史季温三家注，而苏诗则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各种名目，注释者近百家，刊行的注本至少有赵夔《注东坡诗集》、吴兴沈氏注、漳州黄学皋补注、宋刊五家注、宋刊五注与十注合拼本、旧题王十朋注、施顾注、廖群玉莹中注，凡八种。今存宋人注苏诗仅三种，其形式分别为集注、类注和编年注，代表了诗集的三种编纂方式。类注在南宋、金、元、明倍受欢迎，而编年注则是清人各注本的圭臬。

集注本为五注、十注合拼本《集注东坡诗前集》宋刻残帙，今存四卷，不知纂辑人。据考证，注释者有赵夔、赵次公、师尹、傅藻、程演、宋援、孙倬、林子仁、胡氏等。此书对北宋诸帝、南宋高宗赵构名皆避讳，而对孝宗赵眘嫌名则不避，可证此书刊行于高宗朝。

类注本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旧题王十朋纂集，今存二十五卷，附《东坡纪年录》一卷。此书以分类编次，其最大功绩在于汇集了此前的苏诗旧注，使诸如“八注”、“十注”等赖以局部保存至今。此书于南宋中叶问世后，“风行一时，流播四出，闽中坊肆遂争先镌雕，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期于广销射利，故同时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于文字初无所更订也”^⑤。今存宋刻本以建安黄善夫家塾本为最古，凡二十五卷，分五十类。此书宋刻本还有泉州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本、建安万卷堂家塾本、建安魏忠卿家塾本、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宋刊元修本等。另外，北方金也有刻本，今尚有金刻蝴蝶装本残叶存世。宋末元初，又有《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诗》问世，二

^③ 茅维《宋苏文忠公全集叙》，《苏轼文集》附录。

^④ 钱文子《山谷外集诗注序》，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首，《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傅增湘《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苏诗跋》，《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校点本。

十五卷，分七十八类。除仍署“王十朋龟龄纂集”外，增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此书借王十朋、吕祖谦、刘辰翁的大名，得以在元、明两代广为流传，朝鲜、日本也有翻刻，存世的版本很多。宋元刻本有宋刻刘辰翁批点本、元建安熊氏本、元庐陵某氏书堂本。明代类注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元版重翻”，如成化间汪氏诚意斋集书堂新刊本、嘉靖五年刘氏安正书堂本，皆据元庐陵本翻刻；一为“新王本”，乃万历间茅维改编的类注本，题《东坡先生诗集注》，将原有七十八类并为三十门。崇祯时，王永积重印。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从延据茅维本、王永积本重刊，将“酬和”与“酬答”并为一类，共二十九类。

编年注本为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凡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为编年诗，第四十卷收翰林帖子及遗诗，不编年，最后两卷为《和陶诗》。据陆游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推断，施顾注苏诗成书于孝宗淳熙年间，而据施宿序及跋，则当刊行于宁宗嘉定六年（1213），即淮东仓司刊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此书：“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藩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此书的编排体例比类注合理，有利于知人论世。其注文“援引必著书名，诠诂不乖本事，又于主题之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①。施宿刊本传世很少，到理宗景定三年（1262），郑羽在嘉定原版基础上修补印行。施顾注苏诗嘉定原刊本今存有毛晋原藏本三十卷，黄丕烈原藏本《和陶诗》二卷，缪荃孙原藏本四卷，均为残帙。景定补刊本仅存翁同龢家藏本三十四卷。以上四部残帙合计，去其重复，仍缺卷一、二、五、六、八、九共六卷。

施顾注苏诗元、明两代无重刊本，清初宋荦购得毛晋原藏本，先后请邵长蘅、李必恒作补注，又摭拾施顾注未收的遗诗四百余首，让冯景作注，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为刊版。此书刊题为《施注苏诗》，凡四十二卷，俗称“清施本”，有宋氏宛委堂刊本，乾隆内府刊古香斋袖珍十种本，同治、光绪间南海孔氏翻刻本等。但由于邵长蘅的补注自称

“芟芜省复”^②，破坏了宋本原貌，因此颇受后人讥评。查慎行因不满宋荦新刻本，于是自著《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五十卷，俗称“查注苏诗”。其编著体例，“凡为正集四十五卷，又补录帖子词、致语、口号一卷，遗诗补编二卷，他集互见诗二卷，别以年谱冠前，而以同时唱和散附各诗之后”^③。此书是南宋以来最重要的苏诗注本，开清人苏诗编年注之风，以后诸注均承其衣钵。此书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香雨斋刻本，今仅有几部见于著录；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香雨斋刻本，今存藏本尚多；且收入《四库全书》。后来翁方纲仍不满于“查注苏诗”，作《苏诗补注》八卷，凡补原注二百七十五条，皆收拾施注之残坠，新补九十三条，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入《苏斋丛书》。沈钦韩又撰《苏诗查注补正》四卷，主要在于订正查注纰缪，补其阙遗。此书有光绪八年（1882）心矩斋丛书本，后有广雅书局丛书本。

鉴于查氏、翁氏的补注仍有缺失，冯应榴广采宋刊五家注残本、元刊王氏类注本、宋刊施顾注本、查氏苏诗补注本，融诸本之优长，“合而订之，删其复，正其误”^④，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著成《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乾隆六十年（1795）冯氏息踵斋刻本问世，以其材料翔实、考证精密、体例严谨、编次审慎而备受好评。此书在清代一再刊行，计有息踵斋嘉庆二十四年（1819）印本、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节署刻朱墨套印本、同治九年（1870）补刊本、光绪二年（1876）眉山三苏祠本、光绪二十年（1894）粤东文英阁重刻本等。然而，冯氏《合注》的缺点在于注文征引过分繁琐。于是，王文诰撰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集成总案》四十五卷，于嘉庆二十四年刊行。《编注集成》主要依据《合注》而剪裁移易，删其繁文约之二，而增补纪昀评语；调整查注、《合注》中某些篇目次第；删去《合注》卷四十七、四十八他集互见诗及卷四十九、五十补编诗中的大部。注文虽较简明，但删诗体例不够严谨，有删略失当之处。《集成总案》是东坡年谱的扩编，多可考究，也有谬说。王氏《集成》和冯氏《合注》各有所长，代表了清人苏诗注的最高成就。《编注集

^① 张榕端《施注苏诗序》，《施注苏诗订补》卷首，清康熙三十八年纬萧草堂刻本。

^② 邵长蘅《题旧本施注苏诗》，《施注苏诗订补》卷首。

^③ 纪昀《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四，中华书局1964年影印本。

^④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凡例》，《苏文忠公诗合注》卷首，乾隆间踵息斋刻本。

成》有嘉庆二十四年韵山堂本、道光二年（1822）韵山堂本、道光三年（1823）扬州阮氏刻本、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书局刻本等。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孔凡礼校点本《苏轼诗集》，即以王文诰《编注集成》为底本，校以宋刊本集、施顾注、百家类注本各残帙、明刊东坡七集及《外集》、查氏《补注》、冯氏《合注》以及金石碑帖、清人、近人校勘批语、校勘记等等。又将查注、合注中被王氏所删未及编入《集成》的补编诗、他集互见诗，移编为第四十七至五十卷。

苏词的编纂始于两宋之际，据宋钞本《东坡拾遗词》录曾慥跋语可知，北宋末曾有“张宾老所编并载于蜀本”的《东坡词》。自南宋以来，苏词多为集外单行，有多种单刻本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著录《东坡词》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轼词》一卷，均属集外单行，因原书失传，不知其内容体例。苏词最早的辑本为曾慥所辑《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刊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而今存最早的是明人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钞本。苏词的另一重要单刻本是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的云间南阜草堂刊刻本《东坡乐府》二卷，世称元延祐本或云间本，为今存苏轼词集的最早刻本。叶曾号称“用家藏善本，再三校正一新，刻梓以永流布”。全书按词调编次，同调汇刻，上卷凡四十一调，收词一百一十五首；下卷二十七调，收词一百六十六首，总共六十八调，收词二百八十一首。比曾慥辑《东坡长短句》多十首。此书原刊本先后为顾广圻、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周叔弢等著名藏书家收藏，颇受清人推重。光绪十四年王鹏运辑四印斋刻本《东坡乐府》即用元延祐刻本。明代另有《东坡乐府》二卷钞本，或有书目著录为“影宋钞本”，其实是影钞元延祐刊本，其内容、编次、行款、版式、误字、缺字皆同元刊。

明人所刻苏词，多附于苏轼文集或其它总集、丛书中。如万历年间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收文不收诗，但却收词两卷（卷七十四、七十五）。茅本苏词系改编曾慥辑本而成，共七十三调，三百一十六首。原刊本附有曾慥跋语，明末陈仁锡阅文盛堂翻刻本，内容与茅维原刊本相同，但删去曾慥跋语。此本较通行，是明代收集苏文、苏词最全的本子。明天启元年（1621）徐氏曼山馆刊行《苏长公二妙集》二十二卷，题为焦竑批点，许自昌等校

订，徐象樞梓。所谓“二妙”是指东坡尺牍与诗余，收《东坡先生尺牍》二十卷，《东坡先生诗余》二卷。其《诗余》系增补茅本而成，而来源于曾本。元延祐刊本中有八首词，《二妙集》本未收。明崇祯三年（1630），毛晋汲古阁家塾刊《宋六十名家词》，中收《东坡词》一卷，凡七十二调，三百二十八首词，按词调编排，小令在前，长调在后。由于此书体例严密，编排合理，并多种版本参互校正，质量可信，因此在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并收入《四库全书》。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重刻汲古阁原刊本《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也在其中，为苏词通行本。明代末年还有黄嘉惠校刊《苏黄小品》本，收《东坡小词》二卷，与山谷词合刊。上卷五十三首，下卷亦五十三首，共收词一百零六首。各首词有黄氏评语，词题多数同毛本，正文出自茅维《苏文忠公全集》本，按调编次，刊行于崇祯年间毛本之后不久。

早在南宋初年，就出现几种苏词注本，但多已失传。今存最早的苏词注本为傅幹《注坡词》十二卷，绍兴初年镂版于杭州，收苏词凡六十七调，二百七十二首，其体例是按调名编次，同调词汇编在一起，自第二首以下，以“二”、“三”、“四”等等代替调名。傅幹编纂此书前，曾对当时世上流传的东坡词全面进行整理，“削其附会者数十”，“益之以遗轶者百余首”，“敷陈演析，指摘源流”^①。傅幹的笺注虽然在标出处方面稍有粗疏，但材料翔实，颇有参考价值。此书《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误为二卷。杭本《注坡词》在元、明两代未见翻刻，惟仗钞本得以流传。明范氏天一阁曾藏有一部，晚清失传，赖沈德寿再次传抄得以保存。清末沈本归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徐氏藏本曾先后为词学名家朱祖谋、罗子经、龙榆生、赵万里等人所亲见，并有多人再据之转抄。据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记载，南宋还有顾禧的《补注东坡长短句》，但此书久已失传，是否为补傅幹《注坡词》而作，已不可知。

金人孙镇《东坡乐府注》“删去他人所作”，“坡词遂为完本”^②，应当是《注坡词》后另一重要苏词注本，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曾著录此书，其后未再见流传。金人元好问从孙镇注本

^① 傅共《注坡词序》，刘尚荣校证《傅幹注坡词》卷首，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② 元好问《东坡乐府集选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中录取七十五首为《东坡乐府集选》，成书于金章宗天兴五年（1236），可惜其书也失传。元、明、清三代无人注苏词，直到清末宣统二年（1910），才有朱祖谋编年笺注的《东坡乐府》三卷问世。此书前两卷为编年本，末卷未编年，仍依元刻本分调编纂。其底本为明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所收《东坡词》和王鹏运四印斋所刻本《东坡乐府》，并经过订讹、补阙和编年、笺注。此书重点在编年，不在笺注，是苏词最早的编年本。清代还有《苏辛词合刻》，是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和元大德信州本《稼轩长短句》二种的合刻。

二十世纪以来，苏轼著述的整理有了更大的进展。除了上述宋、元、明、清各种旧本的大量重新刊印以外，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整理成果。苏诗方面如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以王文诰注为底本的《苏轼诗集》，由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任编辑。此书在校勘和辑佚方面颇有成就，它“使用了今所知见的（包括美国、日本公私藏书在内）十余种极珍贵的苏诗宋、元刻本及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明、清刻本，做为主要校本；又参考了存有苏轼真迹的金石碑帖与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还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订苏诗的成果。全书采用汇校方式，整理出四千余条校勘记，分载各卷之后。这些校勘记忠实录存下种种苏诗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异文资料（惟缺台湾独存的宋刻苏诗残卷的异文）”^①。此书除了恢复被王文诰删去的补编古今体诗、他集互见诗四卷外，还新收了辑佚诗二十九首。

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孔凡礼校点、刘尚荣任责编的《苏轼文集》。此书以明茅维刊本《苏文忠公文集》为底本，其主要成就仍在校勘、辑佚方面。此书的校勘“除采用九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数据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②。此书辑得苏轼佚文四百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此书校勘记体例不统一，异文去取不尽恰当，对墨迹刻石资料缺乏辨析；辑佚则显得过滥，考辨不精，甚至有《文集》正文已收

入者；标点断句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1990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以清光绪、宣统年间覆刻明成化七集本为准，对苏文作了全面系统的编年。除去《外制集》、《内制集》已标明写作时间的诏令类外，此书为一千六百九十九篇苏文作了系年，约占《外制集》、《内制集》外二千零三十篇苏文的百分之八十四。此书实为苏文的首次编年，有开创之功。

苏词的整理成果最丰，在编集和笺注方面都不乏佳作。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横排增补本《全宋词》，由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其第一册收《苏轼词》三百六十余首。在按调名编次的各种东坡词集中，此本收苏词最多。注本方面，整理旧注以刘尚荣校点的《傅幹注坡词》成就最高，该书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钞本为底本，以北京大学、中华书局所藏傅注钞本及有代表性的六种苏词及其它版本为校本，凡重要异文皆出校记，同时区别苏轼自撰词题、词引和傅幹补添的题解、校注，校订傅注所引经史子集的文句，补标傅注引文出处。书后附有附录三种，一是《注坡词补佚》，二是《历代题跋选录》，三是《苏词版本综述》。新注本最著名的是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重印，是流传最广的苏词注本。1974年华正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都曾刊行。商务印书馆重印本各词之后，首列校记，后为笺注，部分笺注后列有评、本事附考或附录，分别收录诸家有关苏词本事的记载或考证、评论数据。在龙笺后数十年，1968年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出版了曹树铭校注的《苏东坡词》，1980年曹氏对全书作了修订，1983年、199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两次印行。1977年，台北学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向恒的《东坡乐府校订笺注》。199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代表了苏词新注本的当代水平。此书收苏词三百六十首，在编年上颇下功夫，订证前人编年之误者十首，新编年者一百零三首，共编年三百一十七首，几占苏词十分之九。但是此书少部份编年词仍有穿凿附会之嫌，尤其是处理互见词、可疑词不够审慎。200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含编年词二百九十二首，未编年词三十九首；附编他集互见词八首，存疑词十一首，误入苏集词五十三首。在词

^① 刘尚荣《评新版〈苏轼诗集〉》，《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

^② 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同上。

语注释、编年审订，特别是在某些词章收录流传的文献轨迹上用功夫极深，也是目前苏词新注中成就颇高者。虽然此书后出转精，然而校书、注书，皆如扫落叶，所以值得商榷处也有不少。

苏轼留下的各种著述，不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早在北宋神宗时期，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影响高丽、朝鲜直至现代韩国的文坛。高丽高宗二十三年

(1236)，著名文学家李奎报的门人崔址将从中国买来的苏轼著作重新刊刻为《东坡文集》，可惜这一高丽雕刻本今已失传。近世朝鲜更出现了好几种《东坡源流》，是苏轼学术渊源和作品选录的汇编本。正如韩国学者洪瑀钦教授所说：“苏轼在韩、中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比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人，更深刻而广大。”^①在南宋，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鎌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开始抄录、注释、讲述苏轼的诗作，到1534年，日本出现苏诗的讲义录集《四河入海》。全书二十五卷，由五山禅僧笑云清三抄集北禅和尚《脞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韩《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等四部讲义而成，其底本是传到日本的元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在《翰苑遗芳》中，收集有《施注苏诗》的注释，可作为宋刊施注本的辑佚。此外，在日本刊行的苏轼别集版本极多，不胜枚举。苏轼的著述传到欧美，引起西方汉学界的兴趣。除了研究著作外，也出现了一些苏轼作品的英、德、法和其它欧美语言的译本、选本，内容包括苏轼的诗、赋、古文等等。总而言之，苏轼在文学上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他的作品不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并已成为国际性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范本。

四

历代学者对于苏轼著述的整理已取得很大成绩，不过，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苏轼文集的校注本，更遑论合苏文、诗、词于一体的全集校注本。究其原因，乃在于苏轼著述过于庞大，以个人之精力很难完成全集的校注工作。正因如此，地处苏轼故乡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承担起这一艰

^① 洪瑀钦《“拟把汉江当赤壁”——韩国苏轼研究述略》，曾枣庄主编《苏轼研究史》第九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2页。

巨任务。

1979年，邱俊鹏、张志烈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宋文选》书稿，时任该社古编室主任的杜维沫先生正在筹组十五位古代大作家集的校注工作。由邱俊鹏、张志烈代表教研室主任杨明照先生与杜维沫达成了意向性协定。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苏轼全集校注》由川大中文系承担。接着，系里开始建立工作小组。到1991年时，已有12人参加此项工作。在此期间，曾枣庄、成善楷、项楚、吴朝义等先生先后担任过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从1985年到1991年底，由成善楷、曾枣庄、马德富、周裕锴、金诤、何江南、江裕斌等人完成《苏诗苏文人名索引》、《苏诗苏文地名索引》、《苏诗语词索引》、《苏诗诗句索引》、《苏诗版本目录对照表》等数据索引的编写工作，并完成苏文校注初稿十二卷，苏诗校注初稿十二卷。同时，川大中文系十多位老师参加了有关苏轼生平及评价的各种资料的辑录，最后由成善楷、曾枣庄、项楚、邱俊鹏、张志烈、周裕锴等人分别通读删订，编成了《苏轼资料汇编》，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2年到1994年，由张志烈、吴朝义并列任《苏轼全集校注》编写组长。张志烈为项目负责人。1992年12月，校注小组在原来实行的《苏轼文集注释工作细则》、《苏轼诗集注释工作细则》的基础上，又制定了《苏轼全集校注编写细则补充规定》，进一步统一体例。1993年9月，由张志烈、周裕锴赴广东省惠州市，与市委宣传部签定合作协议，惠州方面冯肇怡、曾铁元、钟锦才、祝基棠等人参加编辑工作委员会工作，并提供编辑经费。

1995年2月，四川大学及下属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加强对《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的领导，调整机构，增加人员，明确分工，确定由张志烈教授担任编写组长，周裕锴教授、马德富教授协助工作，分别负责苏文组和苏诗组工作。同年10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苏轼全集校注》为“九五”立项规划中项目，以张志烈为项目承担人。

从1994年起，《苏轼全集校注》全体人员分工落实，任务明确，并陆续邀请了几位兄弟院校的老师参加校注，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苏诗校注方面，由马德富负责，参加人员有曾枣庄、陈应鸾、王克让、李昌龄、罗国威、刘文刚、王兴平、虎维铎（西南师范大学）、吴明贤、赵晓兰、王春淑（四川师

范大学);苏文校注方面,由周裕锴负责,参加人员有金诤、江裕斌、刘黎明、何江南、谢谦、潘慈光、杨胜宽(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王文龙(江苏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张志烈全面负责,并独自承担苏词校注。同时,校注组建立了严格的“两审”编写制度:初注者完成后,送交一审,一审提出修改意见,返还初注者。经修改后,送交二审,二审再提修改意见,再经修改,才算完成初稿。审改工作主要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主编承担,经本植、陈应鸾等先生曾参加部分审改工作。刘黎明、何江南在统收整理稿件方面做了大量事务。全集各卷的校注者及审阅者署名每卷卷末。

经过二十余年几代人的努力,《苏轼全集校注》终于在2004年全部脱稿,并于2005年5月与河北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其中苏诗、苏词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另作新注,补罅删芜,订讹纠谬,释词解义,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都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苏诗、苏文校注以孔凡礼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为底本,并得到孔凡礼先生和中华书局的授权。由于苏轼全集内容庞杂,涉及的知识面极广,因而校注工作的难度相当大。鉴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同时因书成于众手,良莠不齐,所以在校正字词、引用数据、处理注文、统一体例等多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杨明照先生的重视和关怀,历任中文系主任唐正序、龚翰熊,文学院长曹顺庆、吴茂楠等先生也对编写工作给予了充分支持。惠州市委宣传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河北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投入巨大热情,特别是王书华先生数次南下四川,在本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付出辛勤的劳动,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也给予我们应有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四川大学中文系《苏轼全集校注》小组
执笔者:周裕锴
二〇〇六年三月

参考资料: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曾枣庄等著《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祝尚书著《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

刘尚荣著《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

刘尚荣校证《傅干注坡词》,巴蜀书社1993年版。

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执笔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孙开中)

注:预定此书,可发电子邮件到《苏轼研究》编辑部。

(上接第45页)

这首词历经沧桑而不竭,意在它“情”、“景”的纯真,真而不矜,处处赤诚,不矫揉造作,不忸怩作态。使人吟咏伤怀,感慨万端,有意在言外之幽思,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这首词,各有所解。多情的少男少女把它当作男女伤别离的相思词,喜吟咏以寄己之情恋,这也未必不可。但一般多理解为是诗人对徐州的依恋之情,诗人确实对徐州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并把她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当然,如果联系诗人所处的特殊环境,联系诗人以意入词,表现自我,反映自我的生活感受和自我理想情趣的词作特点,那么可能较为全面地理解词中诗人那复杂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蕴含内在之主旨,这样吟咏咀嚼,便觉意味隽永,感悟其意境之高远了。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故该词贵在它意境的高远和名句的绝妙。如“天涯流落思无穷”、“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皆名句也!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新闻中心原总编、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山流水)

走近东坡五十年

——饶学刚先生的苏轼研究之路

白 水

饶学刚，笔名曲辰、雪港，湖北崇阳人。《黄冈日报》记者何志弘说：饶先生“在黄州生活了半个世纪，视黄冈为他的第二故乡，对黄州和苏公的挚爱，比很多黄州人和眉山人还要深厚而执着。”①

饶学刚先生与东坡赤壁结缘于 1953 年。当时，他从湖北大治师范学校保送华中师范学院，来到黄冈鄂东医院体检，遂第一次游览了东坡赤壁。大学学习期间，勤读苏轼诗文；大学毕业之后，分到黄冈工作。因而，从一位普通的文化工作者成长为著名的苏学专家。曾任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的馆长、黄冈师范学院的教授、编审，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和《苏东坡研究》编委、四川《乐山师院学报》三苏专栏特邀撰稿人。他是东坡虔诚的崇拜者、铁杆的粉丝。半个世纪以来，为弘扬东坡文化，保护东坡遗迹而奔走，而呼号。

1957 年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便在赤壁新村一带搜集了 100 多篇苏东坡的传说，被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内部印刷并在《鄂东晚报》连载。1977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游览东坡赤壁者日益增多，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作为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的馆长，他义不容辞地当上了讲解员。80 年代，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文物盲们以为东坡当年的遗迹“不合时宜”，将推土机开进了赤壁山下。他当即去找黄冈地区相关部门领导，去找湖北省人大主任石川同志，请求保护东坡赤壁。石川主任批示：希望有关单位为子孙后代留住景仰缅怀的历史文化遗存。

1982 年，在黄州举行的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了“黄州高峰说”，即苏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在黄州，引起轰动。大会简报连续三期展开争鸣，此说得到了全国知名学者陈迩

冬、胡国瑞、王水照、朱靖华、刘乃昌、吴志达、唐玲玲、祁念曾等的赞许。

80 年代中期，为了完成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苏东坡在黄州”，也是因痛心疾首于东坡遗迹的湮没，他两次分别陪同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和台湾大学王保珍教授，沿着东坡鄂东足迹，进行考察，详细记下东坡遗迹的准确位置。1999 年，京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苏东坡在黄州》，朱靖华教授说：饶先生的《苏东坡在黄州》，是“填补研究空白的文化建设工程”。

1988 年，在上海《民间文艺季刊》发表《苏东坡“鸡鸣歌”考证辨释——兼谈田歌（秧歌）的源流》，填补了苏学研究和民间音乐史研究的两项空缺，1990 年获上海“飞鹰”优秀论文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全文复印，《中国苏轼研究》第 2 辑转载。1993 年，他提出“东坡是传统民歌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的观点，得到苏学界的认同。华中师范大学刘守华教授说：饶学刚对苏东坡“在创作中吸取民间文学（主要是民歌）滋养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受到大家的重视。”②朱靖华教授说：“我认为，作者依据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东坡著作，提出了东坡是一位‘传统民歌的继承者’的论题，颇为引人注目，开拓了一个苏东坡研究的新领域，并联系黄州地区的山歌、田歌的社会习俗加以推论印证，就显得更具说服力。”③

1992 年，在山东烟台举行的全国第七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东坡创造了“仕宦文化、伦理文化、空间文化”，“三维整合效应的文化现象，即‘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东坡文化现象’”的观点，被苏学界普遍接受。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说：不少文章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苏轼。……饶学刚“从仕宦文化（忠君爱国忧民的统一）、伦

理文化（祖国皇权人伦的结合）、空间文化（云海人间仙境的融会）的方面来研究苏轼，也颇有启发。”④黄冈师范学院方星移教授说：饶先生的《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苏东坡黄州贬谪文化现象探微》，指出“黄州磨练铸就了苏东坡，苏东坡发现构建了黄州，相互成全”，说“黄州成为‘东坡文化发祥地、黄州赤壁文化发祥地’。这一见解，颇为新颖。”⑤

1992年，他应黄冈地区行署领导的邀请，为遗爱湖风景区（后改名为遗爱湖公园）命名。这一命名，无疑提高了黄州城市的东坡文化美学品位。随后，完成了介绍词、东坡诗碑词、园内雕塑说明词的撰写和修订等文字工作。2006年，黄冈市市长刘雪荣先生上任40天，就微服私访其寒舍，爱上《苏东坡在黄州》，赞赏他命名“遗爱湖风景区”古为今用之创新思维。刘市长发电子邮件说：“读了您的《苏东坡在黄州》，就产生了强烈的要拜访您的愿望，那天造次冒昧，打扰了您，很过意不去。从您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信息，使我受益匪浅。开发利用黄冈的文化资源是一项重大课题，我会尽力去做，还希望得到您的不断帮助。”这意味着他的书，将影响甚至决定黄州城市建设的新走向。后来，刘雪荣市长的《人间绝版苏东坡》演讲和“遗爱湖公园”的建设完全印证了这一点。不久，他出任遗爱湖整治指挥部咨询工作，撰写“苏东坡贬居黄州大事年月表”、“遗爱湖公园结构布局方案”、苏东坡《遗爱亭记》译文等。刘雪荣市长看后回信说：“饶老师：来函及附件均已收到。很好，很满意。我们会认真研究并采纳。”2009年8月21日，刘雪荣市长去信慰问：“饶老师，您的每次来信、每篇文章我都拜读了，收获良多，受益匪浅。”“您高尚的品德、严谨的治学风格，都让我感动、让我景仰。在东坡文化学习上，您更是我的启蒙老师。衷心感谢您为弘扬东坡文化做出的努力、付出的心血、做出的巨大贡献。祝您健康长寿。”在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贺词中，孔凡礼先生赞扬他“长时间以来，以弘扬东坡文化为己任”。

1998年，在山东诸城举行的全国第十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东坡密州超然文化现象”的命题，成为苏学界公认的“东坡文化形态”的标识之一。同年创作《诸城行》，2003年获首届“华夏作家网”杯，《中华文学选刊》文学大奖

赛优秀作品奖，并收入其“优秀作品选”。苏学专家孔凡礼先生说：饶先生的《超然：高品位的东坡文化形态》，“以《超然台记》为据，提出了‘超然：高品位的东坡文化形态’（或为‘东坡密州超然文化现象’）的全新命题。”⑥同年，在北京《民间文化》上发表《苏东坡与道家方术》，提出了“黄州是东坡养生学的发祥地”的论题。

1999年发表《20世纪苏东坡文学研究述略》（与朱清华教授合写），引起反响，先后被中央文献出版社、台湾红叶出版公司等五家出版社书刊转载。同年，将王文诰、王宗稷、朱祖谋、龙榆生、陈迩冬等关于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宋元丰五年的作年校正为宋元丰三年的作年；将人们视《浣溪纱·西塞山》杭州之作校正为黄州之作，均得到了孔凡礼先生的认同。

2001年，在河南郏县举行的全国第十三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了苏东坡葬郏县上瑞里是东坡“生命流程与心路流程”，“历史的必然”的原因说，已经引起了我国文学界、史学界的重视。孔凡礼先生说：饶学刚与饶晓明先生《苏轼葬郏县上瑞里原因臆探》一文，视野开阔。”“作者对生命流程和东坡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维观照，时空交错。其切入点是嵩山之阳的郏县上瑞里峨眉山。作者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所提出的深化见解，给人以深刻启迪。”⑦

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苏东坡黄州笔记赏析》（与饶晓明合写）专辑。

2007年，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苏轼词新释辑评》（上中下三册）（他与朱清华、王文龙、饶晓明合著）。其中，他对东坡词全部编年，东坡词初作年提前到19岁，辑评辑古又辑今，引起了苏学界的震动。

2008年，在否定余秋雨先生“东坡突围黄州，佛教帮了大忙”观点的同时，他又推出了东坡在黄州的神奇奥秘的文化现象，即“东坡黄州贬谪文化现象”和“黄州是东坡贬谪文化的发祥地”的论题，亦成为苏学界公认的“东坡文化形态”的标识之一。

2009年，出任东坡赤壁风景管理处咨询工作，黄冈师范学院图书馆“苏东坡在黄州”特色数据库学术咨询工作。

近30年来，除专著外，还发表了有一定影响的论文数十篇，约计40万字。其中有9篇被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全文复印。热心传播东坡文化和东坡研究成果，为国内知名学者孔凡礼、朱清华、邹同庆、王宗堂、王文龙、杨胜宽、韩国强、朱玉书等的东坡研究著作撰写书评等。记者袁桂凤、刘红红说：“‘学术研究，要追求独立求异思维，千万不能吃别人嚼过的现馍；没有学术的创新，任何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饶老师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许多论文，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观点。他将自己现象归结为由他爱标新立异的怪僻性格造成的。”⑧

近30年来，他先后结识了诸如孔凡礼、王水照、马兴荣、颜中其、朱清华、刘尚荣、刘乃昌、邱俊鹏、张志烈、曾枣庄、薛瑞生、王文龙、王宗堂、邹同庆、唐玲玲、王保珍、陈祖美等良师益友；接受了河北栾城“苏味道及三苏考察团”、广东惠州市“王朝云剧组”、四川眉山市政协“东坡足迹万里行”考察团、湖北卫视、《鄂东晚报》、黄冈电视台、徐州电视台、台湾玄门天方夜谈网络电台等国内新闻文化单位和原新加坡市长王永元、日本学者山上次郎和内山精也、韩国学者安熙珍等国外学者的访问。还为许多青年东坡研究者做引荐搭桥工作。

他的许多东坡研究成果，先后进入了新华网、国学网、东坡网，获得了全国著名苏学学者孔凡礼、王水照、朱清华等的赞赏。

晚年的他，也是忙忙碌碌，但绝不是自讨苦吃，去捞什么名利之类的“化妆品”，而是要尽力了却他未竟的学术研究事业。

论文注释：

①《镇守穷庐，富有赤壁——记黄冈师范学院教授、苏轼学者饶学刚》，《岁月淘金》，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②《评饶学刚的地方民间文艺研究》，《江汉大学学报》1993年2期。

③《填补研究空白的文化建设工程——〈苏东坡在黄州〉序》，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④《中国第七届苏轼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6期。

⑤《孤守寒窗，乐读东坡——评饶学刚先生的苏东坡研究》，《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4期。

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

年版。

⑦《〈苏东坡与平顶山〉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⑧《以电脑为伴，与东坡“对话”——饶学刚老师晚年生活剪影》，2007年9月15日《黄冈师范学院报》。

（根据饶学刚《走近东坡五十年》改写）

（责任编辑：山流水）

（上接第19页）祭文深情地云：“惟我与公，交游之义，外虽朋游，情实兄弟……”“平生胶漆，永隔存亡。”

自古以来，世间人际关系可叹之事不少，亲友之间，有的可共患难，却不能同享福；有的可同享富贵，却不能共患难，演绎了许多人间悲剧！只因为这些人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之缘故。在那以权势为俯仰的封建官僚社会里，苏轼与其门生之间，任凭风云变幻，师生情意永存，堪为人际关系之典范，可歌可泣！可赞可叹！

苏轼与其门生的师友关系，不仅仅限于人际关系的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苏轼以崇高的道德力量，以深厚的才学识见，如同磁石一般吸引了有识之士投奔于自己的门下。苏轼以平等的朋友态度对待门生，决不以清规戒律去束缚他们的才学，使其才学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北宋的文坛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可喜的文化景象。

论文注释：

①掉鞅：从容驾驭，或从容不迫地显示自己的才华。

②凌躐流辈：凌躐，超越。流辈，同一流的人。

③蝤蛑、江瑶柱：蝤蛑，梭子蟹；江瑶柱，鲜贝。均是名贵海产品。

④迈往：超凡脱俗。

⑤觳觫：因恐惧而发抖，此处指老牛。

⑥曳裾：裾，衣服的大襟。拖着衣襟，比喻在公侯贵人门下当食客。

⑦端明二丈：指苏轼。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上面有个哥哥，夭折），元祐年间，其馆职为端明殿学士。

⑧殄瘁：穷困，苦难。

（山东济宁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清泉）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三）

（日本）池泽兹子

桃源瑞仙与《蕉雨余滴（一韩翁听书）》

《蕉雨余滴（一韩翁听书）》是一韩智翊的著作。《日本坡诗讲谈师》说：“竹处师讳仙，字桃源，号丑庵，或号春雨。在山上（近江国）讲坡者全部。……讳翊，字一韩，坡之闻抄号《蕉雨余滴》。因桃瓮所讲也。桃瓮或号焦了，盖以蕉坚绝海和尚之后裔也。”从此可知此书是桃源瑞仙（1430—1489）讲解坡诗时候的笔记。

桃源瑞仙是临济宗梦窗派的僧侣。法讳是瑞仙，道号桃源。另外有焦了、蕉雨等称号（他是绝海中津的法孙）。他是近江市村人。他的父亲叫年登居士。是京极氏麾下的小仓氏管辖下的下级武士。

他永享二年（1430）六月十七日出生。永享五年（1433）4岁的时候，遵从母亲的遗言出家。父亲再结婚，桃源的亲生母亲死去以后，继母桂岩慈昌尼抚养他，把他送进永源寺派下的慈云庵。永源寺的开山齐岳性均钟爱桃源，带领桃源瑞和他父亲经常去伊势大神宫祈祷桃源成为本色衲子。20年间，每年都去参拜。嘉吉、文安年间（1441—1448）桃源10多岁的时候，入相国寺胜定院的明远俊哲的室出家，被名为瑞仙。后来到享德四年（1455）闰四月七日远俊去世的时候，他多年在那儿以远俊为师。桃源24岁的时候，同横川景三、万里集九参加相国寺的友社（在寺庙内的诗文盟社）。在那儿还和比他小10岁的景徐周麟亲密交往。应仁之乱以前，他已具备了作为五山僧所应有的经历。

他曾深入学习并讲解过《易经》、《史记》、《汉书》，他在瑞林庵的东轩听东福寺的云章一庆讲《敕修百丈清规》摘录，这就是《敕修百丈清规云桃抄》，还讲《东坡诗集》。门弟一韩智翊抄录他讲的《东坡诗集》，写成《蕉雨余滴》。他接受寿春妙永的请

求讲《楞严经》，他还接受继天寿戬的请求讲《三体诗抄》。先后任等持寺的住持、相国寺住持，兼同寺开山塔崇寿院塔主、嵯峨胜曼院塔主、相国寺胜定院塔主。他虽然没有法嗣，但有很多门弟。其中季玉承球是亲身受到桃源的教诲的第一个弟子，他听过桃源讲的《史记》，效薪水之劳。第二个是一韩智翊，他听过桃源讲的东坡诗，侍候他20多年。桃源还跟小仓实澄、横川景三、景徐周麟、季弘大叔、翫之慧凤、万里集九、彦龙周兴交往。性格刚强，不喝酒。

万里集九与《天下白》

万里集九是临济宗一山派的僧侣、法讳是集九，道号万里。他的法讳和道号取自《庄子·逍遥游》里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万里集九是正长元年（1428）九月九日生的，他的法讳“集九”的“九”字是来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应仁之乱后他还俗，也不再用“集九”这个法讳。他在道号“万里”前面加上“漆桶”两个字，号“漆桶万里”。在美浓鹈沼修筑“梅花无尽藏”之后，他号“梅花无尽藏漆桶子”。另外，还有“梅庵”、“椿岩”的称号。地名是“江左”。他是近江安昙郡人。俗姓是速水氏。他叔父叫梅西，属于永明门派。他寄居在他叔父的永明院为僧童，侍候梅西3年。梅西跟颇有文才的季弘大叔、太极等东福寺的僧侣关系密切。

应仁之乱前宽正元年（1460）左右，万里在东山的常在光寺侍候属于一山派的一华建忿。一华建忿是颇有文笔、学问的僧侣，曾跟瑞溪周凤亲密交往，一起商榷古典章句。万里受一华的熏陶，在传授古典讲学方面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同季弘大叔、横川景三、彦龙周兴、桃源瑞仙、益之宗箴、

季琼真蘂、月翁周镜等 10 多个五山僧一起听东福寺宝渚的云章一庆讲《敕修百丈清规》。这样应仁之乱前，万里走过了跟一般五山僧一样的道路。他还俗结婚，生了两个孩子。长子叫千里瑞翼，次子叫百里等京。当时美浓承国寺和革手的灵药寺两个寺庙是文学活动的中心，经常在那儿开高雅的诗会。万里以承国寺为据点，有时候访问灵药寺，进行创作活动。文明十二年（1480）他决定在鹈沼落户，盖一个庵室，叫“梅花无尽藏”。这名字来自他喜爱的陆游诗“要识梅花无尽藏，人人襟袖带香归”。另外号“梅花海”，这也是来自陆游诗“锦城梅花海，十里香不断”。在这个庵居盖好之后，他跟妻子女儿一起住。

文明十四年（1482）梅心主持把诸老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诗会。在会上他作祭东坡文，让春溪宗熙朗读这篇祭文。在会上他又作《祭东坡先生》诗。其诗序云：“余讲毕坡集 25 卷，始丁酉终壬寅，春泽主盟梅心翁，会诸彦，设斯宴，祭其灵，作诗席上，又作祭文，命鍊船市隐老读焉，盖一时之美谈也。祭文并市隐着语，见《天下白》末，余作坡抄 25 卷，号《天下白》。”诗云：“春梦玉堂花昨非，大鹏背上着鞭归。今朝三拜举头看，云舞蓬莱及第衣。”（《梅花无尽藏》卷 1）后来这个讲案编写为《天下白》。

文明十四年（1482）万里已经跟武藏江户城主扇谷上衫定正的家臣太田资长（春苑道灌居士）有了交往。文明十七年（1485）万里为太田写诗歌颂“静胜轩”。后来万里得到太田的招聘。太田为万里新建了一处庵室让他住。万里把这处新建庵室也叫做梅花无尽藏。之后他妻子儿女也搬到此处。太田有时候宴请万里和建长、圆觉寺的诸位尊宿，和少年僧开诗会，有时候在城北畔的数百株盛开的梅花中跟万里一起评诗、和歌，请万里为菅丞相做祭文，有时候带着万里到武藏越生去见自己的父亲道真（资清），并参加那里的诗会，在那儿呆上几天。这样，太田的热情招待使万里在那里过得很快乐。但不久有人谗言太田资长，主君上衫定正信以为真，在相模糟屋里杀掉了太田，他只好回到江户城。叔悦请万里讲黄庭坚诗 20 卷，他讲了 3 年，后来他把这次讲案整理为《帐中香》。延德二年（1490）一个叫万福和尚（本名不详）的法灯派僧侣写诗庆贺《天下白》（东坡诗注）和《帐中香》成书。名应六年（1496）万里到了古稀之年。他的老朋友桃

源瑞仙的门弟圣一派大慈派的一韩智翊和笑云清三，在延德二年（1490）桃源瑞仙去世后，拜万里为师，到梅花无尽藏寄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缘分，所以后来笑云把东坡的四家注合在一起编了一本《四河入海》。万里写的一韩《蕉雨余滴》的序，现在收在东福寺的《帐中香》里，是从明应七年（1498）九月末到八年（1499）正月末笑云清三抄写的。大概这是为写《四河入海》做准备。在笑云抄写的《帐中香》里万里也写了跋文，可知万里亲自帮助过笑云。在东福寺还有《晓风集》。这是万里讲《三体诗》时的讲稿，由笑云抄写而成。还有万里抄写《临济录》的《临济录梅庵抄》，以前在绩翠文库里有万里亲自书写的《临济录梅庵抄》草稿，现在在松冈文库。还有万里抄写《忠兴禅林风月》的《棘门集》，这本书的存佚不清楚。万里还有自己的诗集《梅花无尽藏》7 卷（8 册）。按照年代的顺序排列，亲自做注释。因此历史家把它看作非常珍贵的资料。

万里歿年不详，但他的作品里有文龟年间（1501—1503）写的（如果活到文龟三年，他的享年是 76 岁）。《梅花无尽藏》收在《续群书类从》里，传播很广泛，但缺第 7 卷的后半部分。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国会图书馆里，有第 7 卷的全本。另外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古抄本《五山禅僧诗文集》里，可以找到很多佚文。现在这些作品都在《五山文学新集》第 6 卷里。

笑云清三

名应、永正年间（1492—1520）人，临济宗圣一派的僧侣。法讳清三，道号笑云。伊势人。俗姓不详。在伊势无量寿寺严伯通噩那里参禅。长大以后晋京为东福寺大慈庵塔主。在东福寺的时候他重新建造山门（妙云阁），为修复东福寺做了很多努力，后来他去美浓，住在梅花无尽藏邻地“容安斋”里，以万里集九为师，抄写《帐中香》。他在《古文真宝》、《无量寿禅师日用清规》、《敕修百丈清规》这几本书里加过注释。撰述《四河入海》。他曾重新建筑天得庵，兼任天得庵塔主。在晚年受到建长寺的公帖，登上东堂位。

（下转第 77 页）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五）

雷金贵

第五章 荡涤刷新 民胞物与

14 苏东坡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苏东坡意图荡涤刷新，不是没有来由的。

苏东坡是有抱负的，很多书上都说过，他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因为如此，苏东坡踏上北宋的政治舞台，面对积弱积贫的北宋，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冗兵，冗吏，使北宋王朝国库亏空而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最终而使“民弱国衰”。

苏东坡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意图为北宋疗治根本。

苏东坡从“安万民”、“厚财货”、“课百官”、“训军旅”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十七项具体的治疗方案。老实说，他比王安石的变法，更全面，更具体，也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本文只作概略简说，不能面面俱到地叙述，史家们可以去做详细的研讨，以我愚见，研究苏东坡的治国之策，应该很有意义，不仅是为苏东坡的政治正名，也可为今天树一面镜子，同时对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做出超越以文说文的解读。

我想先说苏东坡的“安万民”。

民惟邦本，这是苏东坡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他一生坚持所追求的治国安邦之理论基础，最终成为他跌宕人生的根本缘由。苏东坡的一生，无论是在官，还是被贬，其忧民之心，其爱民之举，其谋民之利，即使在今天，也是可以做榜样的。

苏东坡不是坐在主席台上高调民惟邦本，他初入官场的一首诗，虽然不及他后来的诗歌、词章、文赋那样汪洋恣意，但是其民本思想却无遮无拦的，全盘的暴露了。

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

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
山川随出产，贫富称老大。
寘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
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
贫者愧不能，微挚出春磨。
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
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馈岁》

艺术来源于生活。

我不把它作为一首风俗诗来读。我以为它确实不仅仅是一首风俗诗。穷人的艰难，富人的豪奢，苏东坡看得很明白。所以，能够给万民以安居乐业的日子，成为苏东坡无比的渴望。

安排天下民众，你的方针和政策，你的措施和办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是你的政治水平。

民之不安，国之将乱。

现在就要说到发生在苏东坡身边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都很著名，从中可以找寻到苏东坡安民思想和主张的根源。

这件史实，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人，都可能记得，和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一样，曾经编入过语文课本或者是政治课本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宋史叫叛乱，发生在四川青城，时间就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 993 年，离苏东坡出生的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 1036 年，相距仅仅四十三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王小波、李顺，是青城的农民，乘着百姓的困苦不堪，喊出百姓心中的一个口号，揭竿而起，将饥寒交迫的十数万贫民，集聚为伍。攻青城，占彭山，据成都，立大顺国。虽然时间不长，却点燃了蜀中百姓均贫富的火种。

之后又有张余、王均之乱，民众的闹事，一直不能平息。

王小波发起的民众运动，全蜀动摇，逼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

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王小波等等，为什么要起义或者作乱，有一本书，叫《渑水燕谈录》，为大宋当朝人物王辟之所著，就把其中的根源揭示得很透明。

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藏帑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

这样一段就近的历史以及根源，苏东坡不可能没有耳闻和感受，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个性，就是与什么人都打得拢堆，或许苏东坡在青少年时期，他还交往过当年的闹事者。百姓其实没有更多的奢望，渴望安居乐业而已。

苏东坡应该是把这段历史和百姓的期望，记在了心中的。

15 事父母 睦兄弟 恤妻子

苏东坡将怎样“安万民”？

他有两个主张，其一为敦教化，其二为裕民。

用今天的话来讲，一是要提高国民素质，二是要对人民多予少取。核心是要富裕百姓，这是他一贯的主张，而且在他以后的坎坷仕途中，一有机会，他便身体力行。

所以林语堂作《苏东坡传》，就明确地说了，他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林语堂是以民的眼光看苏东坡，不像我们，长期在文的视觉里，诉说苏东坡，好像苏东坡就是一个文人而已。

而且，《宋史·苏轼传》关于苏东坡在所到之处的“政绩”，那是不惜笔墨的。那些政绩，都关乎民生。眼前的民生，长远的民生，同时都在苏东坡的谋划范围里。因为苏东坡利为民谋，所以杭州百姓为其建生祠，为之“家有画像，饮食必祝之”；才有苏东坡被逮捕入狱，江浙百姓公开为他做解厄道场。

苏东坡的教化主张，缘于他善于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营养，化为己用。他从三代享国长久，而秦、汉多乱中，提出官府、官员、百姓，都要以诚信为本。用现时的话讲来，就是要弘扬真善

美，消除假丑恶。苏东坡以“三代之民见危而授命，见利而不忘义”为理想目标，若能实现，“则天下不可以敌，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诱，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叛。”

苏东坡认为，教化百姓，官方不能只是停留于口头，层层只发文件，层层只发号召。他十分赞赏周武王散财发粟、礼下贤俊等不贪、不骄、知仁、知义的表率行为。其实，苏东坡就是希望当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弘扬真善美，自己要率先垂范，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表里如一，要言行一致。现在的说法是，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带头干。苏东坡在千年以前的思想，至今也生命盎然。而现在，一些身居要职的人物，为官一方的人物，有权一域的人物，居然连千年前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如，且看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巨贪巨腐者，在台上的时候，说起反贪反腐，可谓声色俱厉，而背地里做下的可耻勾当，其对权力的滥用，其对钱财的贪婪，其对女色的荒淫，让我等一般人想都想不到。

苏东坡对皇帝、对朝廷百官、对各级官员提出表率要求，也是有针对性的，不是乱发议论。他在上书仁宗皇帝的“安万民”之《策别》中，指出了实例，批评朝廷不讲信用，欺诈百姓。所以他忠言进告，“欲民之知信”，朝廷首先要言行一致，朝廷都朝令夕改，却要百姓讲诚信，那只能是废话；“欲民之知义”，朝廷和官员首先廉洁奉公，不贪不占。如果朝廷想尽办法搜刮民财，官员扯起幌子挤榨民膏，却要百姓见利不忘义，那只能是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样的荒唐。

“先其实而后其名”，要皇帝，要朝廷，要百官，垂范信义，苏东坡是不是太书生用事了？

后来，北宋的最终灭亡，内因是奸邪弄权，腐败当道，外因就是背信弃义，不讲信用。宋徽宗时，宋、辽都因相同的内因而走向衰微，辽之后院，反抗其压迫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宋徽宗政和五年

（1115），女真族建立金国。著名的奸臣童贯，给宋徽宗出了个联金灭辽的馊主意。澶渊之约，宋、辽是建立了所谓兄弟关系的，现在宋秘密地与金达成了夹击辽的协议。很多人出来反对，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在金国向辽发起攻击的时候，宋却被方腊起义拖住了手脚，没有同时出兵。金国认为宋很不守信用。宋因此同时失信于辽和金。公元1125年冬天，金完全灭辽后，向北宋不宣而战，宋徽宗为了逃脱历史责任，匆匆忙忙禅位，但是大势已去，

仅两年，北宋就被金军横扫而灭亡，宋徽宗、宋钦宗等等一万四千多人，做了俘虏。

苏东坡提高国民素质的主张，还有一项叫“劝亲睦”。他希望每个人，首先要爱自己，然后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如此，人就能安居乐业，家就能和睦温暖，社会就能和谐发展。一个人，如果不晓得孝敬父母，不晓得和睦兄弟姐妹，不晓得疼爱妻子儿女，只能是一个混混，不会是其他什么，这是肯定的。

苏东坡这个思想，即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兄弟，不爱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不爱自己的同事同学，不爱自己身边的邻里，不爱自己同船的人、同车的人、同机的人，不爱自己的本职岗位，你要让他爱党、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你要让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以为那是空话。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给贪官们一剂公开的秘方》，我说，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家人，就不要去贪污，就不要去腐败，你进监狱了，你掉脑袋了，对养育你的父母、对爱着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儿女的伤害，是任何药物都不可治疗的。我说的秘方就是“爱”。为人儿女，为人父母，为人夫妻，为人弟兄姐妹，扩而大之，为党之一员，为国之一公民，惟时常不忘爱心，便可走得正，行得端，经得起各种各样欲望的考验，而不至于贪赃枉法，而不至于沉沦堕落。

当然，你的父母，或者丈夫，或者妻子，或者儿女，或者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鼓励你贪腐，帮助你贪腐，那是另一回事情。

苏东坡犀利的眼光，洞穿时空，让人肃然起敬。

16 民之生死寄乎财

“裕民”，是苏东坡“安万民”之本。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过上很滋润的日子。物质很滋润，精神很滋润。苏东坡，千年前的封建士大夫，以“裕民”为其政治之基础，已然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苏东坡因为这种民本观念，王安石的激进变法，竭泽而渔，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意气用事，他也反对。苏东坡的尺子，是是否便民，是是否利民，是是否可以让天天要过的日子过得好。

且看苏东坡将如何“裕民”，其举措方略，是夸夸其谈的纸上谈兵，还是从实际出发的切实可行。

苏东坡之“裕民”，首先要拿朝廷开刀，他呼吁朝廷，要减轻对百姓的榨取。

可是现实让苏东坡心疼。

“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生活已经如此艰难，然而，“吏且随而税之，扼喉拊背，以收丝毫之利”。这样残酷无情的现实，耿直的苏东坡自然要无比愤慨，自然要痛心疾首地批评：“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胜者，尽也，刮尽人民的财产者也。

所以他大声疾呼：“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也。”

打破朝廷垄断，让利于民，留利于民，给民以生路，藏财于民，这是苏东坡减轻对百姓榨取的措施之一。

北宋朝廷，垄断经营盐、茶、酒等，其实就是官方用强权垄断了市场，苏东坡主张放开经营，搞活市场，很有些现代经济思想。资源垄断，市场垄断，说白了，就是权力可以随意获取无穷的暴利。市场开放，是需求在推动产销。

再一条，苏东坡主张免除百姓对朝廷的欠帐，北宋朝廷“广开财路”，百姓却不堪重负，朝廷自然就成了百姓的债主，长此以往，百姓皆苦不堪言。王安石的青苗法，实质是向百姓放贷，初衷确实也很好，但是缺乏严密的操作程序，和监督措施，青苗法成了面向全民的高利贷。

有一件事情可以一说，苏东坡初到密州，见官不卖盐，狱中无有盐囚，路上也无流放的盐犯，心中甚是欣慰，通判杭州三年，苏东坡曾在大年三十还在审理盐案，深知“榷盐”之害。哪知他刚在暗喜，却早已有人向朝廷建议，京东河北的盐业，也该收归朝廷垄断，很快朝廷的文书就送到了，苏东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上书陈情，要求朝廷收回已经发出的诏命。

也是在密州，苏东坡废除了刚刚开始实行的手实法。

苏东坡要动朝廷的奶酪，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自然讨不到皇帝和朝廷的欢心。苏东坡其实比皇帝看得长远，设若，一国之家是一条河，那么百姓则是万千溪流，溪流没有水了，大河最终就只

有干涸；设若，一国之家是一座大厦，百姓人家就是基石，基石都破产了，大厦最终就只有轰然坍塌。

打击豪强，恩惠贫困，是苏东坡裕民的又一主张。

依然是向有话语权的集团动刀。

北宋之时，以田土的多少以及肥瘦，来确定其税赋和差役，并随着其田土之增减而增减，理论上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北宋的现实，却不是那么一回事，贫寒人家，迫于生计，而不得不把田土贱卖了，而其税赋差役却没有减少，豪强之家，却趁人之危，兼并了大量田土，而其税赋差役，却不见增加。

官府却昏昏然，或者是晓得的却装聋作哑，依然按本本上的数字，收取税赋、摊派差役，于是贫者日益地贫，富者日益地富，以至于贫弱之家“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赋存而人亡者，天下皆是也”。

家都破了，人都死了，而税赋差役还在官府的帐本上照列收取。如此荒唐之举，为一国之现象，此国之荒唐，也算是透顶了。所以来，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呼吁朝廷，免除民间积欠。

如此荒唐，是何原因？苏东坡一针见血，按田土多少肥瘦来确定税赋差役，广开了一个极大的黑洞之门，豪强大户，为了少缴税赋，为了少服差役，贿赂那些贪官污吏，贿赂之门大开，其患之深，不可探测。苏东坡依然站在民间立场，因为如此这般，被榨取的还是平头百姓。

苏东坡毫不客气地说，普天下之人，当然包括皇帝和朝廷官员、地方官员，都晓得这样的税赋差役有失公平，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但是却熟视无睹，或者看见了晓得，根本就不想去改变，又是何故？从苏东坡后来在常州买田养老推断，北宋官员买田置地当是普遍的。所以我想，苏东坡还是给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留够了面子的，不是无法改变，而是不想改变，若要有所改变，必然要损失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把自身利益放在一边，什么事情都好办得很。所以苏东坡的办法既简单又可行——田地买卖，必然有契，价值几何，记载分明，官府据此而收取田地交易税，也应该据此而掌握所买田地之多少肥瘦，也应据此而确定人户之税赋差役。该核销的核销，该增加的增加。如此，只需要“一持筹之吏坐于帐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虚实。不过数月，而民得以少苏”。

17 尔耕尔食 遂为尔有

“均户口”，乃是苏东坡颇具开拓性的裕民思想。

所谓“均户口”者，移民开发也。

苏东坡的移民开发思想，直接的灵感来源于他守完母亲之丧，回京路过唐州的一次亲眼所见。那是嘉祐五年（1060），苏家十多口人，途经唐州会京，见得唐州太守发动军队和流民，疏浚水利。太守府明确规定，水利工程完工后，四方来的流民，可以分得陂渠附近的荒地，并就地落户。地者，生之本也。有地就能安居，安居就能乐业。苏东坡认为这是好办法，为此写了《新渠诗》五首，沿途张贴，布告四方。

其一曰：

侯谓新民，尔既来止。
其归尔邑，告尔邻里。
良田千万，尔择尔取。
尔耕尔食，遂为尔有。

苏东坡认为，北宋的土地，完全可以养活北宋的民众，不仅如此，而且应当供给有余。而现实是，老百姓常常衣食不保，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分布不均。人口密集的地方，人均占有的田土自然就少，而人烟稀少的地方，可耕之地却不能得到开发。那个时候，还没有良种良法，单位面积的产量还很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当然要靠广种。其实，在杂交技术之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依然依靠的是面积，还有靠老天爷的帮忙。所以在上个世纪，最早有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是模范”，后来有新疆建设兵团成建制的务农，有北大荒大规模的开发，有农业学大寨的全民开荒垦地之举。人口在不断增长，无数的嘴巴嗷嗷待哺，没有生产力的提高，就只有依靠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

苏东坡说，吴、蜀有可耕之人，但是土地紧缺；荆、襄有可耕之地，可少耕种的人。人地矛盾的产生，不是老百姓不愿意迁移，而是没有较多的人一同迁移，害怕到了新的地方，没有邻里朋友，缺少互相照应和帮助。所以苏东坡指出，人地矛盾的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府的政策不当。

苏东坡提出两种方式，推进移民开发。

其一，领导带头。苏东坡向皇帝和朝廷建议，有计划地让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迁移到荆、襄、唐、

邓、许、汝、陈、蔡等人少地多的州、县，定居生活。有官员带头和发动，跟而从之者，必然不会少。

其二，在灾荒歉收年头，募集那些困急人家，有组织地向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

为了让迁移者在新的故乡安居乐业，苏东坡主张，朝廷和官府要舍得“出血”。第一，无偿的划一些土地给他们；第二，无偿的送一些农具种子给他们；第三，在一定的时间内不收取他们的田租税赋。

这种“造血”方式的移民开发，属于蓄水养鱼之举，属于养鸡下蛋之策，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十分积极的发展观，充满了人文关怀。苏东坡在农耕文化的背景里，提出如此积极前瞻的开发主张，我以为，今天的不少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汗颜，感到羞耻，比如强制野蛮的城市拆迁，比如城市扩张而对城郊失地农民的不管不问，比如工程建设对农民工血汗钱的一拖再拖，比如扶贫助农金玉其外的形象工程，比如在企业转制中的暗箱操作，比如权力的无边无际……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背景里，苏东坡的均户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张，不仅可以保证耕者有其田，而且是有足够的田，还同时可以推动人口的优化，以及生产技术的交流，以及文化的流传，乃是一举多得的良策。

18 要以诛寡而悦众

“去奸民”，乃苏东坡安万民的再一个主张。

“去奸民”者，就是对那些违法犯罪者，要坚决打击，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宁，为大多数老百姓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社会法制环境。对那些违法犯罪者，苏东坡主张严惩不贷，“诛一乡之奸，则一乡之人悦；诛一国之奸，则一国之人悦。要以诛寡而悦众。”

苏东坡所说之奸人，乃“时出为盗贼，聚为博奕，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冢，无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与嬉游”，以及“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讼而数犯法者”。

有人说，苏东坡这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我不这样看。

这种人，在民间，是苍蝇，如若任其横行乡里，则一乡之民，不得安生；而且，这种臭味相投的人，

很容易纠集在一起，形成团伙，吃、拿、卡、要，强买强卖，怙吃霸赎，为害一方。现今有一个概念，叫黑社会团伙，其对社会的危害，如同豺狼当道。

这种人，在官场，是老虎，若在朝廷或官府里纠集一团，祸害的就不是一乡一县，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不幸的是，苏东坡预言的一国之奸，在后来的北宋、南宋的历史上，得到了应验，小人专权，奸臣当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无恶不作，是如吕惠卿、章惇、蔡京、秦桧等等之流，加速了北宋的灭亡，让南宋也只能苟延残喘于一隅。比如苏东坡遭遇的文字狱，打手之一的李定，就是不为母亲守孝的忤逆之徒。

苏东坡在三个地方，力行了自己的“去奸民”之策。一个是杭州，一个是扬州，一个是在密州。

苏东坡两次在杭州任职，对待犯罪分子，不光看其果，而且追其因，所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次是去杭州做通判，时在熙宁四年（1071），因对新法持异议，又上神宗皇帝书，触怒王安石，自知不见容朝廷，一再请外。神宗皇帝本意要派他一个知州之职，却被中书格制，要让他通判颍州，皇帝改批通判杭州，皇帝还是很器重苏东坡的，让他到了江南的要津之地。苏东坡十一月底到任，公务一直很繁忙，主要是审理犯人。这些犯人，多是犯盐事者。盐，朝廷专卖，低买高卖，民间为盐所困，这些人就铤而走险。苏东坡有《山村五绝》做实录。一直到年三十了，苏东坡还在狱中忙乎，他很同情这些犯盐事者，却又没有权力开释他们，让他们回家过年团聚，遂作“题狱壁”诗，以解心中之痛，诗曰：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一个新法的不同意见者，却要来执行新法，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是常人可以体验的。一个朝廷命官，居然把自己等同于那些犯新法者，都是为了口饭。苏东坡对于断人生路之策，深恶痛绝，可见一般。

苏东坡二次莅杭，是在时隔十多年之后，去做一把手。当年人满为患的监狱，已经空空如也了，苏东坡当然很高兴，向两位副手赠诗——

山川不改旧，岁月逝不留。
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
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
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
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但是，苏东坡对于鱼肉乡里的豪强恶霸，却绝不姑息怜悯。这要说到苏东坡从重惩处颜氏兄弟。苏东坡二次莅杭，遇到一件怪事，受纳的以绢抵贷的“和买绢”，民间总是要故意制造一些低劣的，而且故意拖延到最后期限来蒙混缴纳，致使负责此事的官员，遭受牵连，不仅受到鞭打，还赔得倾家荡产。苏东坡到任后，要求负责此事的官员，必须认真负责，劣绢一律不受，结果就发生了群体事件，两百多人拥进政府大院，向苏东坡要一个说法。苏东坡一看事态，就晓得背后一定有人指使，查下去，就查到了颜氏两兄弟，再深入查证，颜家居然为恶已久，恶霸一方，百姓都害怕他们，迫不得已被颜家当枪使。就事说事，负责此案的部门，只判了颜氏兄弟行政处罚。苏东坡说这样不行，对这样的恶霸，处罚太轻，起不到处罚的作用，于是他在判词上法外加判——在颜氏兄弟的脸上刺花，发配到边远地方去。

这个判决，已经超越了知州的权限，所以苏东坡一方面上奏朝廷批准，一方面请求朝廷处罚自己越权用法。果然，他的奏章上去，就有御史攻击他违法，后来在哲宗皇帝亲政后，以章惇、吕惠卿为首，对元祐党人，疯狂围攻，血腥报复，这也成了苏东坡的罪状之一。而在事发当时，朝廷最终和了稀泥，免了苏东坡越权用法的罪，同时也把颜家兄弟释放了。苏东坡很气愤，他是宁肯被治罪，也要严惩犯罪的。事发后，按照惯例，苏东坡要向朝廷写检讨，其中一段话，写出了他疾恶如仇的天性：

“……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

后来到扬州，苏东坡也坚决的打击过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前面的文字里，我已经说到了这件事情，他为了奖励有功人员，宁愿把自己升职的“恩荫”，自己不受，希望转移给有功者，苏东坡的惩恶之心，可鉴日月。

从时间上说，早年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苏东坡就有过强力的“去奸民”之举。《宋史·苏轼传》有专门的一段文字，作了记载。事情大概是这

样的，朝廷派出官员，率领几十个执法人员，到密州来辑捕一批强盗，不料这批所谓的执法人员，竟然比强盗还要强盗，甚至以禁物设赃，诬陷老百姓，老百姓忍无可忍，一方面起而抗之，一方面向太守报案。那些执法犯法者晓得后果很严重，“畏罪惊溃，将为乱”。苏东坡为了稳住他们，就放言说，他们是执法人员，不会干知法犯法的事情。这些人以为太守将为他们撑腰，又集合起来，苏东坡趁此一举将他们抓获在案，然后开庭审理，人证物证事证俱在，无可狡辩，只得认罪伏法。

但是，不是所有的犯罪分子，都被苏东坡视之为奸民。他在密州上书朝廷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对那些民不堪命、铤而走险者，充满了同情，

“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那时正当新法席卷之日，苏东坡为此警告朝廷说：“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饿；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赎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苏东坡揭穿了问题的实质，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这和马克思的结论是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皇帝和朝廷不以为然，把苏东坡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结果就很严重了，后来发生的水浒好汉，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的结局，晁盖、宋江、李逵、武松等等的水泊梁山，就在今天山东之寿张、东平、郓城一带。刘欢唱的《好汉歌》，很好地诠释了水浒英雄的背景和精神。

19 不是天下无人

苏东坡安万民的再一个主张，是加强国防建设，保证国家安宁，人民安居。

国防不强大，国将不国。

国防脆弱，民要安生，那是空话。

没有强大的国防，你就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近代以来，鸦片战争的枪炮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意而起，八国联军的铁蹄在我们的国土上蹂躏，小小日本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

苏东坡在千年以前，就有了强大国防的主张，见得他治国之长远，见得他对北宋之耿耿忠心。

内要强兵，外要御侵，是苏东坡加强国防建设的两个核心内容。

西夏和契丹，是为当时北宋之外忧，苏东坡主张掌握主动，坚决反对拿钱买所谓安宁，前文已经叙说。现在说苏东坡的对内强兵。

苏东坡将如何强兵？

一介书生之主张，是否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乃苏东坡强兵之三大主张。

蓄材用者，求将选帅之法也。这是苏东坡对北宋在文官中选用武将的反动，是对北宋开国皇帝弱兵政策的反动。苏东坡以后被戴上谤讪先帝之罪，可知是一点不冤枉的。问题是，如果先人说的话决定的事情，后来人都把它作为最高指示，一概照单全收，尤其是，事实证明“先帝的指示”本身是错误甚至荒谬的时候，还是要坚决照办的话，那就太愚昧了。远的不说，上个世纪，如果我们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一系列错误理论，包括对毛泽东——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晚年错误的否定，中国会有被世界瞩目的今天么？

在苏东坡看来，堂堂北宋，竟被契丹、西夏虎视眈眈，甚至要靠进贡才求得一时之残喘，不在于兵少不够用，不在于武器落后不经用（北宋发明的火药，让世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那是划时代的变革，后来南宋的虞允文，指挥的采石矶大捷，就使用了火炮），不在于粮草供应不足不够吃，不在于边关城池缺少守卫，而是在于军队中缺乏将帅人物。一支军队，无将帅人才，只能是群龙无首的散兵游勇，当然不可能有威武之气势，而没有气势的军队，当然不堪一击。

不是天下无人，而是朝廷求才之法不当，苏东坡的批评，总是一针见血，不给皇帝和朝廷留一点面子。苏东坡以前朝之事实为教训，在西夏来犯之前，朝廷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没有招揽人才并加以选择，以备一时之用，所以当西夏来犯时候，上下都四顾惶然而不知所措。苏东坡的意思很明确，只有养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苏东坡的批评，让我们自然地想起一句很老的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设武举、求方略、试才干，苏东坡主张这样来选用将帅人才。苏东坡尤其看重试才干，设武举，可以选到勇猛之人，但不一定是将帅之才；求方略，可以选拔到熟读兵法的人，但也不一定是将帅人才。文人不是不能成为杰出将帅，尤其现代世界，

没有文化的军队，简直就是瞎子；没有文化的将帅，那简直就是猪头。

毛泽东批阅历史，对一个人物作过极高评价：

“伟哉虞公，千古一人。”虞公者，虞允文也，我们眉山的乡亲先贤，一个文官，却是采石矶大捷——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指挥官。说的是南宋，在金兵的追击下，宋军已然溃不成军，负责犒军的虞允文，临危受命，整顿人马，以区区三万人，击败十倍于宋军的金兵。但这毕竟属于另类，在弯弓刀剑时代，将帅既是指挥者，更要横刀跃马身先士卒。

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科举，其中有条理由，我以为就是看得远，他说，只考声律句读，是南方人的优势，而断了北方善战者的进仕之路。

苏东坡主张在实践中考察设武举、求方略选出的人才，他以吴王让孙武训练宫女为例，放手让这些人才，去大胆治理“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的新募之兵，“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

苏东坡对将帅的渴望和主张，我想其理论应该是很朴素的，所谓“将熊熊一窝，兵熊熊一个”，这样的道理，其实并不高深。

考查有宋历史我们发现，不管北宋南宋，将帅之才其实不乏。但是因为皇帝的软弱无骨，更因为自赵匡胤遗传下的害怕武将造反，即使再有将帅之才，也得不到重用，杨家将、岳家军的悲剧，必然要让历史流泪。

有了将帅，还需要精兵，所谓强将精兵。

苏东坡之练军实，即为精兵之道之法。

北宋之兵役，实行终身制，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民，仰食于官，而且妻子屋庐，全在军营之中。到苏东坡踏入政坛时候，北宋军队已达一百四十多万，数倍于北宋开国之时，却多是老弱之卒，真正的兵力，竟然不到过去的一半，而耗费竟是过去的百倍，这是北宋弱兵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有宋以来皇帝小心眼的必然结果。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宋徽宗与金国秘密结下海上之盟，意图对契丹南北夹击，金国在北方向契丹发起攻击时，北宋朝廷却在全力对付方腊起事。等到北宋军队终于赶到燕京战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凡金国与契丹交战，败者必定是契丹，凡宋与契丹交火，败者必定是宋。败者契丹，向西而蹿，败者北宋，向南溃退，金国

于是一路南下，横扫北宋，因为北宋在金国的心目中，已经是不讲信用的无赖。

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宁。这个理，今天的我们都懂。其实，在千年前的北宋，苏东坡就看得很透彻了。

苏东坡胆子很大，要向北宋祖宗以来的兵役政策开刀。

一是实行退役制度，允许五十岁以上的兵士，复员为民。二是今后募兵，只招收三十岁以下者，而且只服十年兵役。苏东坡的意思很明确，常年保持军队的数量，流动军队的组成。苏东坡要破除北宋“铁打的营盘老死的兵”之顽疾，让军队的机制回归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之发展规律上。苏东坡为此列举了很多好处。

现代的精兵之举，居然和苏东坡的精兵之道，一脉相承。我们不佩服苏东坡的高瞻远瞩都不行。

按苏东坡的设想，有了良将大帅，有了强兵勇士，然后要“倡勇敢”，即寻求将士勇于战斗之法，就是要致勇有术。倡者，气也。用现在的话说，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首先要振奋军队的士气，要让军队成为威武之师，拉上了战场，人人要敢于不怕牺牲，人人要敢于冲锋陷阵。为此，苏东坡要求皇帝要重用奖赏杰出的将帅，将帅要重用奖赏勇敢的士兵，而且重用奖赏要制度化。

苏东坡还主张严厉军纪、整肃军政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苏东坡的国防大政、军事思想，无不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意识。

但是，苏东坡忠心于大宋的长远，爱国于民族的昌盛，却没有搞懂皇帝的心思。苏东坡是理想的，但是皇帝是小心眼的，是软骨的。始于赵匡胤兵变起家的所谓大宋，为了预防赵家的天下被兵变了，从杯酒释兵权开始，从来所想的，是害怕将帅起事，是害怕军队造反，所以一直“弱兵”。而对西夏、契丹的侵略，只晓得拿钱买一时之安宁。狗是喂不饱的，而且很容易被娇惯，就像现在的宠物狗，有一天，你即使给了它吃的，但是不好吃，它就要咬人了。

虽是一介书生，但苏东坡的国防理念、治军方略，不输武帅将军。甚至，比那些军权在握的人，想得更远，更周全，更具有操作性。

苏东坡的文韬武略，曾经让金銮殿坐得最长的仁宗皇帝，以及短命的英宗皇帝，都被震动过，也

很赏识，不仅是他的军事构想，更是他全方位的富国裕民的大政方略。但是苏东坡却没有得到一试身手的机会。（未完待续）

（眉山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

（责任编辑：唐雅兰）

（上接第69页）

四 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与《四河入海》

《四河入海》的底本是《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此书的元刊本传到日本，在南北朝时候有此书的翻刻本。在镰仓、室町时代以五山的禅僧为中心出版了很多国内外的书，这些书叫做“五山版”。禅僧们为了做偈颂，学中国诗文。因此“五山版”当中有很多汉籍（大多是元版的翻刻本）。其中包括了不少集部的书，比如《寒山诗》、《杜工部文集》、《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山谷诗集注》等等。《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传本较多。川濑一马的《五山版的研究·解题汉籍之部》中有此书的介绍（页484）：“《(王状元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南北朝刊，宋苏轼撰，题王十朋、刘辰翁批。二十五卷，首一卷，二十五册。左右双边，有界，十一行十九字。匡郭内，纵六寸六分五厘，横四寸一分五厘。卷首有序、目。附上《姓氏》、《东坡纪年录》。版心（卷一至卷九）附刻自中国大陆来朝的刻工之名。（永、孟才、良、伯寿、寿、长有、彦明）。”此书传本较多，藏在宫内厅书陵部（林罗山旧藏本、长得院旧藏本、松平乐翁旧藏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盐田屯旧藏本）、成寅堂文库（龙泽手泽本）等地方。（未完待续）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唐雅兰）

利国文化复兴之路

孟昭全

利国，位于徐州北 37 公里，北与鲁南接壤，西濒微山湖，东近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沪铁路、104 国道。系我国低磷、低硫优质铁矿——利国铁矿的所在地，为徐州市的文化名镇。经国务院批准的《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已将利国定位为徐州市的城市外围组团（卫星城）。

一、利国文化

利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有铁矿文化、两汉文化、苏轼文化、宗教文化、洋务文化、抗战文化、微山湖文化等，其帝王及名人文化更具特色。

通常的说法利国采矿炼铁始于西汉，本人新的研究推断始于春秋。秦始皇二十二年（前 213 年）在利国设驿站。汉高祖刘邦封张良为留侯，当时利国为留城所辖。汉武帝刘彻采纳重臣桑弘羊的建议，在利国设铁官。相传魏武曹操在利国驻兵饮马。唐朝时在此置秋丘治，唐太宗李世民派大将尉迟恭到利国修建奉圣寺。北宋时设利国监（县级行政区划），朝廷派大将狄青到利国领导采矿炼铁制造盔甲兵器。苏轼知徐州时，高度重视利国的战略地位，为利国事“中夜以思”，对利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写下了有关利国流传千古的诗

《石炭并引》和《徐州上皇帝书》。明永乐十三年（1418），朝廷在此设驿站，并将其命名为“利国驿”，该名延用到解放后。清洋务运动时，1857 年，朝庭重臣曾国藩对利国的煤铁和微山湖进行了考察；1882 年，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 1 年 2 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开发利国煤铁之利，经光绪钦批成立了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务局，徐州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就诞生在利国；1888 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利国的发展问题作过批示，他主张在利国“添

设机器，制造军需”，对利国铁矿资源进行就地深加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其七弟袁世传到利国领导采矿。日本侵略中国时，对利国铁矿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残酷迫害中国劳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人坑”；我军民奋起反抗，曾创造出“奇袭利国驿”，全歼驻矿日军的战绩。有 16 位利国人的事迹，被载入《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二、复兴表现

利国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解放后，开采了大量的矿石，上交了大量的赋税，为支援全国解放及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徐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一个弹丸之地的利国，文化底蕴如此之深厚，能与这么多帝王将相及名人有渊源关系，在全国的乡镇中是罕见的。但是，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利国文化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与开发。

可喜的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利国文化建设。近几年来，出现了文化大复兴的势头。主要表现在：

创建利国苏轼文化名镇活动的开展，振奋了利国，感动了徐州，影响了苏学界，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对流传约 300 年的利国地方戏“叮叮腔”进行发掘整理，被列入徐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2009 年全省地方戏演出比赛中，获铜奖。

位于利国镇蔡山村的道观——泰山庙遗存被有关部门重视，拟在黄山岛重建泰山庙。徐州利国道教书画院将在近期挂牌成立。

去年9月30日，在利国举办了首届江苏铜山微山湖生态旅游文化节，效果很好。

104国道从利国街西移工程今年可完成，运铁河治理已展开，微山湖旅游区也在开发。这些，都为利国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利国文化建设的理念与思路已经形成。

三、复兴之路

利国文化建设复兴的理念：

利国有巨大的发展优势与潜力，但是，若要大发展，须以思想大解放为前提；而思想大解放，则要以文化大复兴为支撑；而文化大复兴，又要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载体。

利国文化建设复兴的思路：

一镇——创建利国文化名镇。分两步走，第一步，建成利国“中国苏轼文化名镇”，利用苏轼巨大的影响和魅力，把利国文化的地位、品牌、形象树起来；第二步，将利国建成“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二馆——建利国苏轼纪念馆（含苏轼文化公园）与中国铁矿博物馆。苏轼纪念馆和苏轼文化公园连在一起。

三庙——重建关帝庙（儒）、奉圣寺（释）、泰山庙（道）。

一带——建从东坡广场、白家桥，经运铁河到微山湖、龟山岛、黄山岛、石楼岛的旅游观光带。

一护——对利国“万人坑”文化进行保护。

我认为，把利国文化建设搞上去，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使有关方面对利国文化有深入了解并引起高度重视；二是如何统一市、县、镇的认识，并整合抓利国文化建设的力量；三是如何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抓好落实。为此，建议市领导组织市、县、镇、矿（徐州铁矿集团）等有关方面，并请科研院校参加，对利国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召开利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进而开展科学规划，制订相关政策、计划，以便全面推进或分步实施。除此，还要加大宣传，表明领导决心，展示群众信心，吸引社会关注，形成向利国文化大进军之势。

利国文化复兴的巨大力量潜藏在利国民众之中，每个利国人，都应有计献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利国的文化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几百年前，利国的富家白昆能出资修建白家桥。我相信，

当今的利国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也会慷慨解囊、尽心尽力的。比如利国人、利国旅游公司职工王振军，铁路退休职工、甲骨文书法家雷声，以及市文化局退休干部、“徐州女侠”、著名作家袁成兰等，已经为利国的文化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利国的文化复兴能否实现，关键在领导。近几年来，徐州市建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型文化工程，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充分展示了市领导抓文化建设的能力，百姓及游客无不交口称赞。目前，正宜腾出一定精力抓基层，特别是抓利国的文化建设。谁重视利国的文化建设，谁能领导利国人民实现利国的文化复兴，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谁就能成为利国人民心中的丰碑。苏轼不是徐州人，然而，当利国人知道苏轼对利国所作的贡献时，对其崇敬和爱戴之情，就是最好的说明。其中的奥秘，令人深思。

我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各级领导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长期没解决的利国文化建设滞后问题，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利国成为与其徐州城市外围组团（卫星城）地位相称的徐州市及江苏省北部靓丽的门面。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山流水）



古今三手笔 天地一眉山（罗加强篆刻）

“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 征稿启事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决定今年8月18-19日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在东坡老家眉山市召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会暨‘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为此现面向全国征集论文。

一、征稿范围

全国从事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苏学研究爱好者。

二、征稿内容

对东坡文化包括苏轼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学术、教育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均可，以下研究专题仅供选题时参考：

1. 儒释道对苏轼文学创作的浸润
2. 苏轼的文化价值取向
3. 苏轼的文学特质
4. 东坡和陶诗创新管窥
5. 苏轼诗的新变
6. 苏轼词的因革
7. 苏轼文的“痛快”
8. 苏轼文学的议论
9. 苏轼文学创新方法初探
10. 苏轼书法的“以意为主”
11. 苏轼绘画的“人本”理念

12. 苏轼“野性”与创新
13. 苏轼创新精神原因简析
14. 东坡文化的生态意识
15. 东坡文化的现代意识
16. 东坡文化的“无为”
17. 苏轼的学术旨趣
18. 苏轼的政治创新刍议
19. 学会工作的创新
20. 研究方法的创新

三、征稿时间

自启事刊出日起至2010年8月10日截稿，请发电子文档到《苏轼研究》编辑部电子邮箱：sushiyanjiu@163.com 稿件要求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在稿件首页左上角注明“应征稿件”字样，在稿件末注明真实姓名、详细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四、征稿说明

我们将在会刊《苏轼研究》选发并精选部分论文编辑成《“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部分入选作者将邀请参加此次研讨活动。

联系电话：028-38299092

《黄州寒食帖》让两岸文化牵手

本刊讯（易志超）5月15日，邮政局发行了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和苏轼《黄州寒食帖》各2枚连体邮票，《黄州寒食帖》让两岸文化牵手。1995年4月6日，台湾邮政发行了1套4枚的苏东坡《黄州寒食帖》邮票。这套邮票有一种4套1版连票组合的小版票，小版的外框，边纸有黄庭坚的题跋。1996年1月14日，黄州市中兴集团将黄州赤壁风景“前赤壁赋”中

的节选及台湾邮票“黄州寒食帖”搬上两枚“企业金卡”，并在东坡赤壁公园举行1996年贺年“金卡”首发式，是台湾、黄州两地的一次文化“牵手”。此次，邮政局发行的第4套书法（行书）邮票，时隔15载，两岸再牵手。（根据2010年5月12日《黄冈日报》改写）